中山大学毕业生2016届 惠赠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

—— 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An Abortive Chinese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lass Theory

林伟然 著
李玉华 译
刘玉宇
李公明 校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IES
中山大学

哲学博士论文

（历史）

威斯康星州大学 - 麦迪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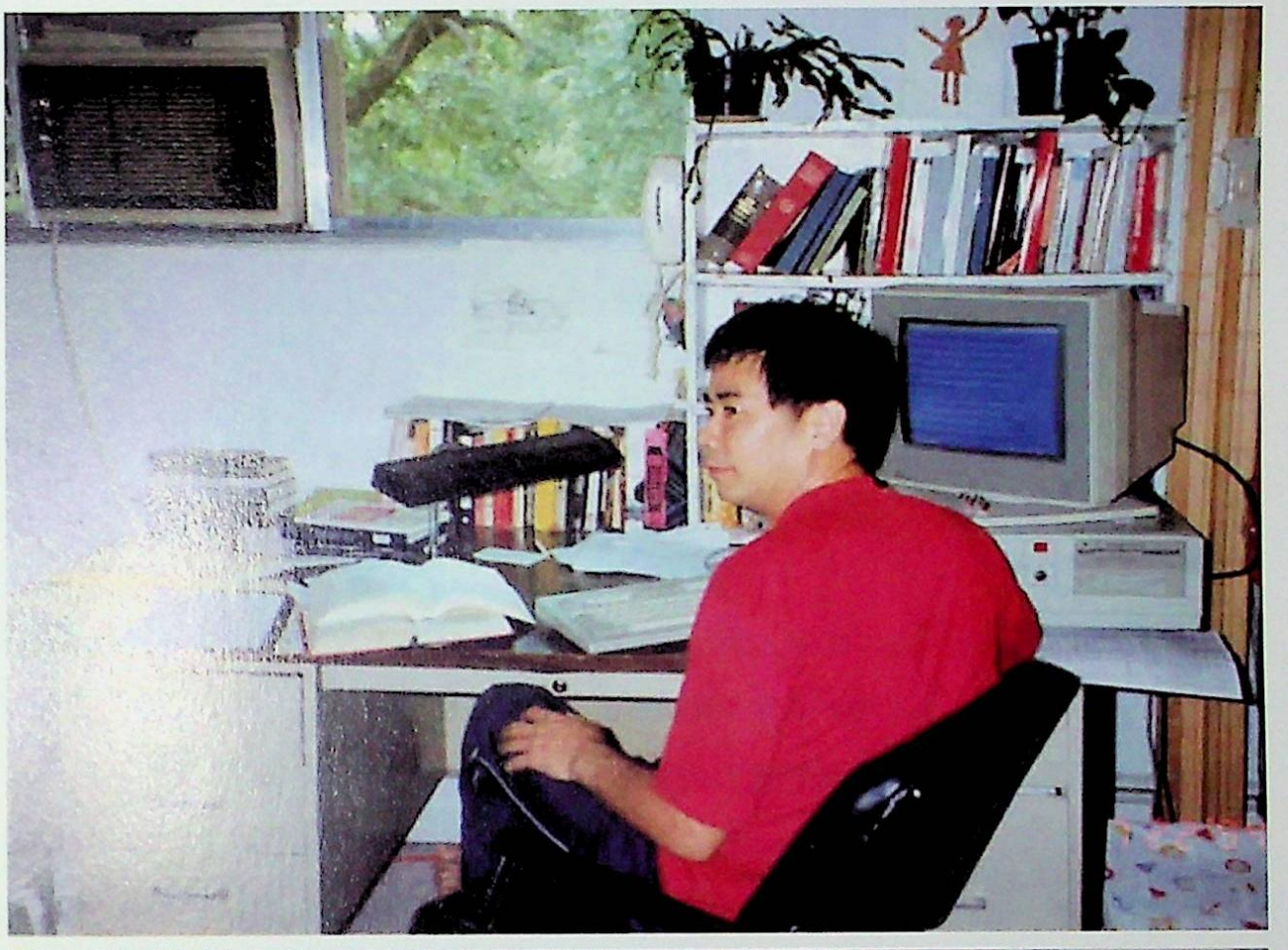
1996

Z0228417

献给我属于其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一代。

To the rebel 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which I belong

首都留影 1966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
----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编著：林伟然
翻译：李玉华
校对：刘玉宇
李公明

策划：李公明、陈少明、杨小辉

装帧设计：吴杨波、吕建军、郑宏彬

本论文的出版和管理机构是：

UMI Compan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300 North Zeeb Rd.

Ann Arbor, Michigan 48106

His sesserce account number is DAO 72699.

He had registation from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Registraion number is TX4-554-823

Register of Copyrights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01 Independence Ave. S.E

Washington, D.C. 20559-6000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介绍：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别角色.....5
第二章
背景介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阶级斗争理论.....24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早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意识形态再定位.....66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晚期对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解释的尝试.....94
第五章
为民主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后的阶级理论.....152
第六章
结论和思考：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流产的中国启蒙运动.....177

译后记.....208

本书缩略语表

DXKW	《大陆地下刊物汇编》
RGP	红卫兵出版物
RGPS	红卫兵出版物附录
WANSUI	《毛泽东思想万岁》
WGZL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WJHB	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

前　言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这一主题，是自从这场革命结束以来历史学者和学生们争论最多，最混乱的课题。在这众多的纷争和问题里，其中有三个方面我认为是所有这些争论的焦点。

首先，我们可以追朔到1966年，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和学生们从不同的战线上起来造党内外走资派和各级领导的反的那天起，这场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工矿企业和大中小学。伴随着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暴力随之也变成了这场运动的一部分。高级领导人以他们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把一批年轻学生鼓动起来，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发起了冲击。对于外部观察家们来说，这一现象是特别不可以理解和困惑的。最早对这一现象提出疑问的，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弗朗茨·舒曼（ Franz Schurmann），他在《文化大革命对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的冲击》一文中，对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现象提出，这“是否表明中国正在为一些不明确的原因在进行政治自杀”。更难于为人们理解的是，毛泽东与他的政治同僚居然可以在孤立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下，发起了这场相当规模的群众运动。总的来说，这些现象确实令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毛泽东与他的政治同僚是怎样发起这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的呢？为什么毛泽东所发起的造反运动能在全国范围内那么迅速地得到响应？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

其次，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所发生的事变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当中共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几乎与此同时，这场文化大革命就立即变成了中共各级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严厉批评的对象。一般人笼统地谴责文化大革命为“十年大动乱”。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对这场运动的这种明显的，上下一致的愤恨呢？而恰恰是这场运动，十年前曾经引起整个社会的激情，使大家都积极地参与和投入。

第三，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争论焦点。过去的十年，中国一下子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腾飞，而且还因为中国在其他各个领域里的出色贡献和表

现。比如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赢得的金牌；中国电影在众多的世界电影评奖中所获得的奖项；还有中国的民主运动；等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解释今天中国的巨变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为什么在舆论一致认为“十年大动乱”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情况下，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的大飞跃呢？是什么导致这样一场民族的大灾难演变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昌盛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些最基本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这场运动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在我的研究里，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成功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为自从1970年以来中国的开放改革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作为一场不成功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大革命，不管怎么样，它还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这种思想混乱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表现在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概念上的理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今天都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一致反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人们对那几年大动乱的批评，我们发现大部分人所谴责的并不是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本质，相反是这场运动的失败结局。在从对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表面上的一致谴责的背后，实际上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需要，以及与此相关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进行到底，另一种则反对这场运动所公开宣称的目的（以及恰好与这场运动所宣称的目的相违背的手段和方式）因而，他们都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场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民族大灾难。

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选择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我讨论的焦点，从而探讨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而确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性质。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阶级斗争理论毫无疑问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毛泽东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几乎就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现实写真了。在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旗帜下，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投身到这场空前的人民运动。

然而，通观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重要的阶段，阶级斗争理论的含义和应用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形成了两种最大的流派。一种是继续强调有产阶级，如地主、从旧社会留下来的

资产阶级等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另一种则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生的剥削分子（或指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我将第二种流派称为“新阶级斗争理论”，可以从两方面找到它的来源。一方面是强调构成阶级里面的新的成份，另一方面是这种新成份的历史性变化。我将第一种流派称为“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样也可以归纳为强调旧的阶级划分和这些阶级早期自身的发展两个方面。

大体上来讲，我的这篇论文的形成，主要是源自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表的与阶级斗争理论演变有关的文献资料。我认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察和反应，而不是个别领袖人物的判断和结论。由此，我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人民群众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方面，而不是这一理论本身的起源和含义。我的另一着重点，集中在这一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而不是某些学者或权威人物对这一理论研究的贡献和影响。

第一章里扼要地介绍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同时指出了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里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对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影响的不重视。然后，讨论了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最后介绍一些重要的专门名词、术语、有关资料和我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主要讨论文化大革命前占统治地位的旧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主要是被国家作为重要的理论工具来帮助巩固和完成自1949年以来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在这个基础上，我论证了旧阶级斗争理论的推行和贯彻，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是思想解放。这一现实的后果是：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了。形成这个新社会组织的要求，迫使现存的国家机器重新构筑现存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这一过程恰恰就是在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进行的。

第三和第四章通过史料记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的过程。第三章我对文化大革命早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思想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作了一个分析。在试图用这一理论去重新构筑当时的社会时，毛泽东主义者改变了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很多基本原则和原理，导致了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和发展。第四章综合记录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献资料里所记载的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不平等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的公开暴露为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新的依据。在这

一章里，我详述了有关新阶级斗争理论的著作，指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特权阶层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是这一理论的依据。对这一新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革命的理解。一些人因此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重新作出解释，同时要求社会做更彻底的改变，由此出现了他们所宣称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继续革命”等口号。

第五章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了评论。我在这一章里，论证了新阶级斗争理论以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不平等和腐败为基点，给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思想理论武器。

第六章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以及这场运动所持续的影响，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但是，思想意识形态革命的定义不是局限于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一范围之内，在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心目中，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根本改变的开始。如果没有思想意识形态的改变，中国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因为这场运动只走了一半就结束了，半途而废的结果使这场运动几乎没有达到什么积极的效果。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结果恰恰好就是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死结所在。这个死结就是——一方面社会依赖于国家机器来进行改革，而与此同时，国家机器却需要社会的力量来进行重新改造。这场运动半途而废的结果，既不可能产生前者，又失去了后者。由此我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夭折的后果构成了中国未来最大的社会危机。

在第六章的最后一段，我思考的是这一经验性研究的理论意义。在我的论文里，我所说的社会和国家是有双重意义的，它们既是理论标准，又是纯概念的定义。同时，我也论证了这组概念的实用性与局限性这两个方面。如此一来，我的研究对极权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因为这两者都是以传统的社会和国家模式为定义的，从非正统的角度来看，我特别强调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内部思想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意识形态是公共领域（或概念），而思想意识形态的变革却是现代中国巨变的原动力。

第一章

介绍：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特别角色

思想意识形态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深深根植于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种特别的国家和社会架构里。由于不能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特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在解释和说明这场运动时，往往忽略了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我首先简单地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然后，我将讨论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最后我会介绍我论文的研究方法。

文化大革命研究里的一些存在问题

据统计，西方社会出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研究书籍和文章比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著作都要多得多。毋容置疑，各种各样的翻译和解释也随之出现，在这众多的研究著作里，以下三种学派是其中最突出的。

第一种学派的代表是早期很流行的一篇论文。文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版本的苏联“大清洗“运动，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因而认为，权力之争是这场运动的起源和本质。[1] 这一观点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持此论者只是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少数的高层领导人物的思想动机上，而忽略了与此紧密相关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以巨大的热情自愿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这一学派还忽略了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大清洗”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基本上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工作，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场群众运动。当权的现任中共领导层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所犯的错误一说也是不值得作为根据，因为这种解释只是延续了有关“权力之争”的

---

1 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文化大革命对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的冲击》"*The Attac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见何平立和唐昼编辑的（*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转变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2: 526.

错误而已。

第二种早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强调这场运动的革命理想。这一学派当时紧紧追随中共官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统一口径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本质。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种解释强调了领导人物和人民群众两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动机，从而为他们对这场运动歌功颂德做一种装饰性的铺垫。不管怎么样，这种理论忽视了，或者是轻描淡写地试图解释另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史实——群众中的派性斗争。这种观点在大部分派性斗争的史实面前不能自圆其说。假如人民群众参与这场运动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为什么他们会在派性斗争中打得你死我活呢？再进一步来看看这一学派对派性斗争这一史实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个别党的领导人利用或者操纵了这些群众组织。但我认为，强调这些“走资派”的作用，很难解释为什么派性斗争会这么广泛，这些派性之间的争斗出现在街坊、邻里、学校、工厂，甚至在家庭成员之间。为什么派性斗争的程度这么激烈，甚至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由于革命理想这一论点不能提供有力的根据来解释这场运动的这一重要现实，所以这种解释亦是不适当的。

第三种学派（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学派）在文化大革命研究里着重于社会主义中国里的社会冲突。这一流派相对发展得比较晚，他们的著述也是典型的长期和系统研究的产物。这一学派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群众中的派性斗争，并且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关系，希望从中找到这场运动的起因。这一研究途径不仅对这场运动的性质有更深的见解，而且完全把研究的重点从个别领袖人物身上转移到人民群众身上。这是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飞跃，而我也准备在这里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这一学派的第一本重要著述，也是至今为止史料最丰富，最有深刻见解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论著，是熊永利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里的政治》[2]。熊永利充分意识到人民群众中的分歧的重要性，因而，他认为“派性斗争比任何其他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都要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史实，它提出一种假设，激进分子是由社会阶层里那些对现存制度心怀不满的人组成的，而保守派则代表文化大革命前那些有优越社会和政治地位

2 “关于共产党历史上的问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几个主要问题决议”（“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北京评论》*Beijing Review*, 27(July6,1981):30.

的阶层。换句话来说，前者热衷于激进的重新改组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后者则想维系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现状和阶层划分。由此一来，这一论述也成为解释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中派性斗争的关键。

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述里对熊永利的这种研究途径大为支持。史丹利•罗深（Stanley Rosen）在《广州的红卫兵派性斗争与文化大革命》一书里，陈述了文化大革命前旧的教育制度如何以家庭出身分化了学生，中学生中不同的家庭出身如何在他们形成对立两派组织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安妮达•陈（Anita Chan）在《毛泽东的孩子们》和约翰深•尤格（Jonathan Unger）在《毛泽东时期的教育制度》里都有很充实的历史论证支持这一观点。这种解释在理查得•考尔（Richard Kraus）《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一书中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王兆刚的博士论文《号召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叙述了中国一个重工业城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3] 他的论文用了很重的笔墨去论证了文化大革命首先是由于社会存在的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斗争。

林•怀特（Lynn T. White）的《混乱的政策：中国文化大革命出现暴力的组织因素（根据对上海工厂的研究）》一书，对这种紧张的社会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变得如此暴力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加深和加快了这种剧变。林竟（Jing Lin）的《红卫兵的暴力之路》一书也有相同的论述，但他的着眼点是在教育制度的政策上。

一位经验丰富的文化大革命参与者在他的独立研究里亦得出相似的结论。刘国凯在他的短评《文化大革命的简短分析》一文中也强调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存在的社会矛盾。他阐述的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们应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后，所能提出来的理论里最有见地的一种。

尽管各式各样的研究和争论都各持己见。但所有的研究都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矛盾，并把这种社会矛盾作为引起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群众分成不同的派性组织的主要因素。这一类的阐述，我称之为“社会冲突理论”，这一流派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研究里的主流学派。

然而，“社会冲突理论”已经历了学者们直接或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修改和挑

3 同上注

战。有些学者试图不再强调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相反强调减轻社会矛盾的各种不同的特点的重要性。例如，苏珊•舒勒（Susan Shirk）从史料中证实了，友谊的重要性及其在当时中学生中组成的“非正式社会圈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理查得•迈尔深（Richard Madsen）把他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农村里道德的重要性上。而安德鲁•瓦尔得（Andrew Walder）则揭示了产业工人中那种紧密的人际关系。

尽管如此，一些非“社会冲突理论”学者也力图用其他非社会因素去解释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的派性冲突。例如，克斯•弗斯尔特（Kerth Forster）就曾经公开批评“社会冲突理论是肤浅和不明确的”。基于他在浙江省所作的派性与造反的关系的调查研究，他认为“作为一种更实际的考虑，在决定效忠于哪一派时，阶级来源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发现在浙江省的两派群众组织中，他们之间的主要分界线是他们对他们所支持的领导干部所表现的革命性的不同评价。他解释说：

“在一些读者的眼里，那种认为年轻无知的学生和那些无情的工人为一件似乎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如此疏远的事件，也就是政治领导人对模糊不清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所表现的忠诚互相打斗，折磨，甚至相互残杀的观点，可能将政治斗争与其社会基础相剥离。然而，这种现象看来确是当时杭州造反派双方的真实行动。”

在一篇很有思想性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毛泽东与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的评论里，戈曼杨（Graham Young）直接地把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的分歧与模糊的革命指导理论联系起来。正如早就被学者们，如斯图亚特•史幻（Stuart Schram），约翰•史达（John Starr），葛顿•怀特（Gordon White），约瑟夫•伊斯韦克（Joseph Esherick），和理查得•考尔（Richard Kraus）所指出的一样“毛泽东有不止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杨（Young）认为，这种含糊不清的理论造成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的混乱。根据他的论述：

“这样，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是一场连贯的运动。实际上，这是几场不同的运动的相互对抗，相互汇合的产物，而这些不同的运动往往是不同的理论基础伴随着不同的政治运动的结果。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由于混乱造成的，而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要政治冲突，特别是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的主力，这些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

杨（Young）还建议，最明显的例子恐怕就是关于阶级划分的冲突，特别是在学生

红卫兵当中，这种冲突尤为显著。这类冲突大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出身好”的人应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而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应该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另一方面，认为谁是革命的主力，谁是革命的对象的标准应该看他们的政治表现，因为当时革命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从而，运用不同的理论观点，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向的概念和主张。”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斗争，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归结为是因为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不成熟的结果。

从全面到个别现象来看，这些重要的研究工作改变了或者是建议了另一种对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就是对资料的曲解。很多统计资料是由社会冲突理论派的学者们收集，用来证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不同社会阶层（不管其定义是什么）是直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分别组成不同的派性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这些统计资料的学术解释却很有问题。这些学者们所引用的这些资料表明，一方面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出现不同的联盟，另一方面在单个社会阶层里也出现了分裂。非常不幸的事，大部分持社会冲突理论的学者简单地选择了忽略这一现象的第二方面。

例如，熊永利（Hong Yung Lee）曾引用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广州造反派发行的关于广州十大工厂企业中保守派和激进派工人的比例表格。在这个表格中，保守派和激进派工人的比例最高的为四比一，最低的比例是一比一，平均比例大概是三比一。Lee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些来自于大型国营企业的工人大部分会成为保守派。但从同一统计资料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那就是在同一社会阶层里，甚至在同一工厂企业里，工人也可以完全分裂为不同的两派。

林怀特（Lynn White）所给的另一个例子亦证明了这一结论。在六十年代早期，上海的一家玻璃机器厂，这家工厂里大概有200多个工人在压注车间，大概有300多工人在模具车间。他们的工作都非常辛苦，对体力的消耗亦非常大，而其工资很低，相比之下，工厂里的电工车间的30多个工人的工作就比压注车间和成型车间的工作轻松得多，而且工资也比他们高。由于这些“不同的分工，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极度分化。”根据White的记述，这家工厂成为当时上海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的工厂之一。“毫无疑问，工厂里

的政治派别是跟随着不同车间的不同工种而形成的，”怀特这样总结。

不管怎么样，怀特所提供的数字不仅仅指出了，不同车间之间的分派对立，而且提出了在同一车间里工人之间的分派对立。根据怀特的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分之一的技术工人与保守的“红卫兵”联合，而在模具车间里，五分之三的技术工人却与四分之三的铸造车间工人一起加入了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众中的分派，不仅出现在他们所属的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同时出现在同一社会地位和阶层里。

一份更详细的关于中学生里派性组织的组成和联合，与学生们不同的家庭背景之间关系的调查，也可以在史丹利•罗深（Stanley Rosen）的研究里找到。但他使用这些资料时也出现了与怀特同样的自相矛盾的结论。罗深认为中学生里出身好的学生，通常是政治上的保守派，而学生中出身不好的学生通常变成造反派。他用一个例子来试图说明这一规律。一般的军队干部子女里，只有百分之六参加了造反派，而百分之八十六的一般军队干部子女则加入了保守派学生组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出身于国民党官员家庭的学生中，百分之五十八站在造反派的一边，而仅仅百分之四是与保守派结成联盟的。

在这一特别的例子里，（毕竟学生里出身于军队干部或国民党官员家庭的学生不是大多数）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仍然存在于同一家庭出身的学生中，这一事实不应该被简单地忽略。当时的一个事实是，参加保守派组织的有好家庭出身的学生（相对于组织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成员）通常不允许（或者说至少不欢迎）那些不是来自于红色家庭背景的学生参加他们的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有国民党官员家庭背景的学生在保守派组织力所占的比例这么低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学生群体来分析，——如学生来自于工人和贫农家庭背景，他们对选择那一派组织有更大的自由度，他们中间的分别立派似乎对研究更有启示作用。根据罗深的调查，来自于工人家庭的学生中，百分之三十六站在造反派的一边，而百分之四十一站在保守派一边。来自于贫农家庭的学生中，百分之二十三站在造反派的一方，百分之三十六却站在保守派一方。尽管这些调查显示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背景人群联盟组合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在群众中的那种深层的分离。

我认为群众中的这种尖锐的派性对立，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这一特点恐怕可以作为一种有力的依据，这一依据是衡量文化大革命这场群众运动在不

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深度和广度的一个标据。在某些地区，群众中参与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比例很高，同时派性冲突也几乎在每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里发现。这类派性的分歧经常能在同一家庭里出现，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时期也可以看到。因为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运动发展的迂回曲折，他们甚至不止一次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态度。社会冲突学派的学者们由于错误地理解这些资料，结果导致了他们不能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冲突的实质，因而使他们的分析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社会冲突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是这种假设的社会冲突理论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根据相去甚远。可以说是完全不一致的。首先，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如社会冲突理论学派所认为的，——直接由社会的不安定引起的。因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与他亲近的同事们直接发起的。我将在第二章里详述这一事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如布兰特莱•伍迈克（Brantly Womachk）所冠名的“官方的革命”。

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1966年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黄金时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创造和巩固，伴随着国家从1959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的逐步恢复，共产党已经是在胜利的顶峰，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是那么真实，因为他们是与共和国同时成长的一代，而这一代人又是将要到来的这场运动的主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当时的群众中就不存在紧张的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冲突理论学者没有办法提供为什么紧张的社会关系会成为1966年公开冲突的历史依据。

其次，这场革命并没有如社会冲突理论学者提出的，呈现出“特权阶层”和“没有特权的阶层”的争论。关于造反派是社会中受压抑者，而保守派是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假说，这是在有限的范围里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假设放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里，这一简单的公式就变得非常可笑。从一个简单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局限。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是在社会的顶端。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民形成了最大的保守派阵营，而学生们则组成了造反派的中坚力量。这一简单的事实，刚刚好和社会冲突理论的假设相对立。

最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产生的分裂，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利益为分界线的，致使

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两大对立阵营，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首先是地理位置的多样性，出现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门立派里。造反派的势力在主要城市里显得非常强大，如北京、上海和天津，而保守派的势力在边远城市里则更占上风，如青海、新疆和广西。更进一步从一个地区来看，造反派势力在城市里显得更为强大，而附近的农村则是这一地区保守派势力的强大阵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保守派号召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便反映了这一政治形势。

第二个因素是明显的教育程度上的差别，出现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垒上。造反派的影响在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众中特别大，这样一来，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形成了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同时，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民，则形成了最大的保守派阵营。

第三个因素是明显的年龄不同，也出现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上。年轻人比较容易成为造反派，而年纪较大的人则倾向于成为保守派。这种不同可以在很多家庭里看到，保守派的父母与造反派的子女家庭在当时相当普遍，而相反情况的家庭则比较少见。

第四个因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个性差异，也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门户分立中可以找到。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人比较容易成为激进分子，而那些比较实际的人倾向于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这一区别可以部分地在安妮达•陈（Anita Chan）对四个红卫兵的不同个性分析一文中找到。刘国凯也曾经在他的研究里联系到这一因素，在他的工作单位里，好几个人选择站在保守派的一边，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个性里的实用主义的倾向。

第五个明显的因素，影响着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是群众中对文化大革命经历的差距。群众中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更多的是成为造反派。例如，学生中曾经参加过全国大串连的经常发现那些留在家里没有外出的学生太保守。事实上，所有激进组织的发展是与文化大革命的节奏一致的。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政治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也变得更激进和更强烈。

当然，所有这些观察资料都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同时属于不同的范畴和因素。总的来说，这些观察资料提供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派性斗争研究新的一面，因而引起了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怀疑和挑战。从这一新的研究角度，群众组织的联盟不再是一些模式一样的实体，而是不同成分的组合。群众中的两派分裂，不再是静态的分割，相反的是一种持续的不断改变的过程。由此，再一次看到社会冲突理

Z0228417

论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重要特点。

然而，对于本人来说，社会冲突理论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经常出现偏见。那就是说，这一思想学派的支持者往往忽略了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从而花了相对来说很少的时间来分析思想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这一批评引导出我的研究主题，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特别地位。

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们并不主张社会冲突是文化大革命的唯一原因或本质。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时都承认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起作用。例如，熊永利（Hong Yung Lee）就试图平衡文化大革命参与者们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王绍刚也努力去协调他所称之为“真正的信徒”与“理性主义者”之间的距离。然而，他们都没有把思想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考虑。例如，Lee 宣称：

> “群众组织几乎只关心自己组织有限的利益，特别是在对权力的关心上，对于他们来说，考虑思想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仅仅是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群众组织支持特定时期官方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方针，仅仅是如果这些理论和政策符合他们对权力的欲望。相反的话，他们就会反对这些理论和政策。”

他的这一观点在王绍刚的观察里也有反映，“考虑他们能得到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是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各派组织的最终目的。”对王绍刚来说，思想理论只是一个空壳，“接受这些思想理论的人对它的理解比理论本身更重要。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思想理论本身出发。”怀特则简单地指出“思想理论实际上忽略了基层里是谁转向暴力，和为什么转向暴力这一特点。”他多次重复了他的观点：

> “个人的和物质的动机，与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动机一样，也是文化大革命各派分裂的原因。”
>
> “这些报告着眼于文化大革命的理想，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但从引发事件本身的根本物质基础来看，则不是一回事了。”
>
> “这场革命花了一些时间才成熟，因为造就革命的不仅是思想理论，而且是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

由于不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社会冲突理论持有者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描述成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阶层出自于各自不同的利益所进行的一场争斗。这里我要辩论的是，这种解

释曲解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运动本身隐盖了他最重要的方面，思想理论的冲突和变化。而正是这种冲突和变化，为这场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走马灯似的变化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来，也是人们难于看到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

从对不同社会阶层在派性分立的过程中，如何站到不同的阵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冲突理论的弱点。更深入地分析则显示出一条分界线贯穿于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一系列的差异中，这条分界线就是思想理论上的差异。在这些比较当中，造反影响最深的，是在那些年轻的，充满幻想的，住在主要大城市的，受过比较好教育的，和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中间。这些人就是受当时权威思想理论影响最大的群体。相对来说，保守派的影响在那些年纪较大，更讲究实际，居住在边远地区，所受的教育水平比较低，和没有那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体中更大一些。这一群体受当时的权威思想理论的影响也比较小。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派别之间的分界，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在这里，我将引用罗深的资料来再次证实这一论题。

在罗深的调查材料里，学生们分成不同的类别，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就读的不同学校，这些不同的学校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较差的、一般的、好的和精英学校。由此，罗深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们的家庭出身与他们所组成的派性组织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成为保守派。然而，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资料，我们会发现另一层关系，来自于同样家庭背景的学生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比例，在较好学校里的比例要比在较差学校里高。

例如，在较差的、一般的、好的和精英学校里，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学生成为造反派的比例是：29：35：40：32；在那些出身于非知识分子，中等家庭的学生里，这一比例是：40：29：51：57；在那些出身于知识分子，中等家庭的学生里，这一比例是：51：58：68：60；在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里，这一比例是：26：30：47：48 。这些数字证实了，有比较好教育水平的群体（这里所指的教育水平是以就读于较好的学校）更倾向于成为造反派.

这些调查资料里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那些父母是“革命干部”的学生，这些学生

中，这一比例是：33：19：14：16，在较差的，一般的，好的，和精英学校里。这一例外所参杂的个人因素也很明显。例如，很多干部子女对造反派围攻他们的父母很不满意。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仔细深入到这些材料里，他们还是可以为我们的论题提供依据的。

根据罗深，在这些干部子女中间，那些父母是部队高级干部的学生，成为造反派的比例是百分之十；而在那些父母是部队低级干部的学生里这一比例仅仅是百分之六。在那些出身于高级和中级国家干部家庭的学生里，成为造反派的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二。在这部分学生当中，他们的父母在解放战争时代不是正规部队（和那些当时或大部分时间是地方干部的人）的学生，仅仅百分之十一成为造反派。这样，就很难用社会冲突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了，因为事实恰好是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学生（高干子女），比那些条件相对没有那么优越的学生（下层干部的子女）表现出更强烈的成为造反派的倾向。这一观念变得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假设高干子女比其他干部子女更为容易获得共产党的内部文件，因而他们对权威的思想理论也比这些同类学生更为敏感。然而，在讨论完这些问题之后，阶级划分（社会地位或者是家庭出身）仍然存在，如前文所引用的资料表明，这一标志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条清楚的分界线。

我的论题将如何解释这一史实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出了我论文的主要观点，——权威的思想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根本的转变。这些转变在群众中引起了严重的冲突。群众里受文化大革命前盛行的强调阶级划分思想理论影响最深的人，比较难于接受这些思想理论的新转变，从而成为保守派。群众中对重新定义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平等思想理论感兴趣的人，形成了当时的造反派。这样一来，在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形成的阶级阵线，也可以在不同偏向的思想理论里表现出来。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很明显地不是社会冲突，而是思想理论上的冲突。但是，思想理论上的冲突远比人们观念上的不同要深刻。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点，很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一下思想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特别角色。

占中国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两重性

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以毛泽东为新皇帝的传统的中国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而且是错误的陈词滥调。否定这一点并不是说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就不存在某些连续性。这些连续性的一个形式，明显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上。不容置疑的，儒教从基本上是与毛泽东思想不一样的，但这两种思想在国家和社会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非常相似。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以前，中国是由儒家的思想意识形态所统治，而在中国共产党时期的中国这种相似的统治角色则由毛泽东思想所代替了。

共产党时期中国的这一特征被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 ）在他不朽的著作《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了。作为一种回顾，这本书一方面非常敏锐，可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他是不正确的。之所以说他非常的敏锐是因为舒曼抓住了共产党时期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如同书的标题所提出的。他的错误之处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理解共产党时期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本质。

在舒曼的研究中，第一个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如何使他的观点适用于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本身，因为当时的组织形式正受到思想意识形态的冲击。舒曼没有清楚地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在他所定义的理论体系里，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他所定义的这种组织形式是"一种具有思想特征和风格的组织形式"因为他不可能看到在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之间本质上的内部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在他的书里，舒曼力图寻找一种外部因素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从而他发现越南战争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起因。他的这一结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同了。从这一错误的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他概念上的错误从而导致他的研究进入了误区。

舒曼对共产党时期中国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之间潜在的冲突的忽略已被历史学家谭畴（Tang Tsou）所注意到了。他指出：

"舒曼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完成他的研究，他自然看不到毛泽东思想可以被作为冲击组织形式的工具。作为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我和他一样认为意识形态有着它自身的能量，个人的思想和组织形式固然也会在不同的方面起作用。由一个领

导者发展或指定的意识形态和他所领导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

对于我来说，舒曼观点所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一点。他对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的研究是以他著名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为理论框架的。根据他的论述，革命推毁了旧的国家和社会，而以组织机构取而代之。与社会体制不一样，组织机构需要专门的努力才可以生存，而思想意识形态则提供了这种精神上的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时期中国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是那么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思想意识形态处于第二位重要，因为它仅仅是组织形式的附属。更为重要的事，意识形态被认为仅仅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且是被国家所控制的。这就是他概念上的致命错误。因为他不明白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共产党时期的中国。

很多人都意识到，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机器都尽力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当时的社会，对它的重要性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进一步讨论了。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点恐怕就是国家机器运用意识形态来统治这个国家。而从历史方面来看，在支持和维系国家机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方面，还没有那种思想意识流派可以与历史上的儒教和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相比美。

然而，很少人意识到，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对这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意识形态是社会对国家机器施加影响的最重要方式。可以这样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属于国家机器，同时也是属于当时的社会。认识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不仅仅帮助我们理解意识形态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同时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中的一个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部联系。

当西方学者们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时，他们都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这种国家及其所具有的非凡的权力，以及对使用这种权力的正式约束的缺乏。以至于我们不难在他们的研究里发现“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当他们论及当代中国以前的国家，而今天“极权主义”通常就是指这种无限制的国家权力。在最近这些年来，不管怎么样，这种过于简单化和不全面的关于中国的国家机器的观点已受到质疑。有些学者发现，中

国的国家机器权力固然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无限制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葛尔勒（Jacques Gernet）指出的：

在中国，国家机器实质上完全控制了人民，军队，经济，还控制了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所有这些，在欧洲的古代君主政权是没有办法可以得到的。可是路易十四与中国清朝皇帝康熙则大不一样了。虽然康熙（清朝皇帝）因为他所持有的中央集权和辽阔的国土，而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但他并不象路易十四那样可以随心所欲。而恰恰相反，即使路易十四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权力， 他却能令举国上下都听从他的号令。

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皇帝被要求遵守加在他身上的规范和形式，同时还附带上传统的习惯，不容置疑的，这样所形成的一种有效适中的力量比宪法所提供的力量更为有效。”

与这一点相呼应，一位德国的中国法律学者卡尔•波尔根（Karl Burgen）指出：

“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但他有“天命”，也即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秩序的准则，往往是与宇宙的秩序相符，通常包括基本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用传统的文字形式记载下来，通常称为‘礼书’。这些规范和原则被皇帝当作统治的训诫，限制了他做政治决策的自由度。”

美国的政治学家布兰特莱•伍迈克（Brantly Womack）是这样指出的：“国家（在中国）并没有外在的约束，也没有原始的，自治的公民社会。”它受社会内部原则的约束：

“一个西方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制度。因为他没有像在西方社会的那种限制滥用特权的制度。当然，滥用权力总会发生（如同也发生在西方社会一样），但在专制社会里这种制度上的约束是与西方社会不相同的，代替西方这种外部约束的是一种界限，这一界限决定了统治者的公正范围，君主所拥有的权力范围，中国的皇帝和他的官吏则被意识形态，礼教，和传统所限制。特别是儒教，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成为招募官员的主要标准。这是传统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宗教的伦理标准—道德文明金字塔的核心。皇帝和官吏们的职责是根据他们所担任职务的道德来处事做人。所以皇室的强权已被一张柔软而坚韧的伦理之网所

制约。”[4]

所有这些都是些很深刻的观察。这些学者们不但注意到了中国国家机器的局限性，同时也注意到了内部压力对他的影响。在这里我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些内部压力的背后是一个行使这种约制权力的社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学者们力图从某些制度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上去找根据。因而，葛尔勒（Gernet）提出他的异议，认为皇帝之所以被迫遵守强加于他的标准和规范是因为“他总是被他必须从中获得支持的行政机构所严密监督。”

波尔根（Bunger）宣称：

> “限制中国皇帝行为举止的指导方针，不仅仅用史书的形式记载下来；他们还在国家的政治机构形式中使之成为专门的制度沿袭下来。这样，我们发现有像“太师”这样的特别顾问，和“劝谏”制度。后来这些都属于一般的检察机关。他们的职责就是常常劝谏和警告皇帝，当他违反了传统规范。”[5]

很显然的，这里所提及的制度上的手段，只限制于国家机器还是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而这最后的一点也是基于国家机器的自我制约上，而通常这种约束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正好是伍迈克（Womack）所认为的中国政治制度之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之处。这亦是中国社会制度之所以失败于想以制度本身的努力去维系合理范围内的国家权力；这些内部的制约并不能由制度上的手段所保障，因而亦不能被广泛地运用。结果，这些学者们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内部制约的效果。这样的分析结论不仅与他们的研究资料不相符，同时也与中国历史的现实相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着皇朝的颠覆与更替，而以儒教为基础的那些标准规范则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他们的统治地位。

使问题变得复杂的一点是这些内部的制约不仅仅被国家所接受，而且得到国家的支持。当所有这些制约的内容由国家以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来具体化时，这就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史实，而同时，这一意识形态的真实性质亦被掩盖了。而事实上，在中国占统治

---

4 例如，弗朗茨·米歇尔斯（Franz Michael），“权力斗争”"The Struggle for Power,"《共产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16：3（May-June 1967），12-21；罗德里克·麦法克夏（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1,《人民内部矛盾》*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Vol. 2,《大跃进，1958-1960》*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83）；安德路·何·温得尔门（Andrew Hall Wedeman），《东风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中国的外交政策》*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ashington, D. 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1987）.

5 例如，理查得·波佛尔（Richard Pfeffer），“纯粹的追求：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The Pursuit of Purity: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共产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 18:6（November-December 1969）；威廉·丘尔顿（William Hinton），《中国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篇文章》*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简·多比尔（Jean Daubier），《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 理查得·斯韦尔（Richard Seaver）（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卡罗尔（K. S. Karol），《第二次中国革命》*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tran. M. Jon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同时附属于国家和社会。国家依赖这一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而社会则依赖于这一意识形态来与国家抗衡。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动力的秘密所在。

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双重性质是深深根植于它漫长的历史过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统一，制度完整，“有序的，亲和的，政治的，精神的，宗教的”[6] 社会。国家与社会没有明显的区别。国家仅仅是家庭的直接延伸。家庭关系则是国家形象的代表。社会的标准规范形式由国家的基本法则所制定。这一历史的事实已由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所有属性所证实。正如儒教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它集哲学，宗教，历史，道德，礼教和社会标准规范形式于一体。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意识形态的这种两重性，在贵族绅士阶层中有他自己的社会代表。正如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的，这一阶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牢固地联系。”[7] 另一方面，这一贵族阶层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官员的来源，而且是国家政权在农村里的实际代表。另一方面，这一阶层同时也是批评国家政权的主要来源，被作为社会的良知。这一阶层的成员不仅仅是在国家政权内执行内部制约的人，他们亦经常会成为反对国家政权的农民起义的领袖。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贵族绅士阶层的这种两面性是与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双重性直接相连的。这一阶层属于国家政权和社会双方，因为意识形态也是支持和维系国家和社会双方的。从儒教本身也同样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的支柱，同时也是批评国家政权和反抗国家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来源。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的灵魂，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政权是以它来制定法律和规章制度（这取决于他们之间是如何把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理解转换成他们的思想和付诸于行动）而社会亦以这一主导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审判国家政权，并以此来对法律和规章制度做出反应。因为中国社会是高度整合和全方位的社会，在这背后的意识形态不是与他一样的观念体制，而是与政治、经济、社会高度融为一体的文化体制。

这就是为什么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在当代历

---

6 同上注 2

7 安妮达·陈（Anita-Chan），《毛泽东的孩子们》*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史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区有过像儒教这样的学派，能够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这么长时间，这么全面地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地，在当代历史上还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像毛泽东思想在1949年以后戏剧性地、迅速地、全面地改变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生活。这几乎不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在这些历史现实的背后，是思想意识形态在中国起了特殊的作用：思想意识形态是中国形成高度统一、制度化社会的关键。

研究方法摘要

在我的研究里，我界定意识形态为一种有相当影响的、系统的、完整的思想。这一整套思想，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和基本道德标准。根据这一界定，我着重于全面的、理论的完整性和大众所接受的思想。这一意识形态与其他大多数理论不同之处是它有很全面的专题，这些专题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一般的社会需要。意识形态与零碎的思想和不成体系的观点之不同，主要是它可以通过内部的力量来完成自身的综合与完善。意识形态与个人的思想和官方的宣传之不同，亦表现在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个人的思想不管有多么系统，假如他不能为相当部分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亦不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官方的宣传，假如它不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就更像是一纸空文，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强调了这一点之后，“主导意识形态，或者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是指由统治政权和人民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和赞同的意识形态。这样就改变了对这一种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定义的理解。

在我的论文里，我注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中期到1969年早期。这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划分，同时也是为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关于这一划分法的最关键一点，是由于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一场群众运动。关于这一研究的主要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官方的文件、报纸杂志、大字报、传单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定期的刊物。这些都是那一时期的公开材料。使用这些材料来作为研究资料的最大优越性，是因为这些材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不可能被伪造和改

变。这一点，对研究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因为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三十年以来，中国人民已经历了许许多多根本的重大转变，其中也包括精神和心理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失实，不光是由西方学者在国外对流亡海外的红卫兵所作的采访常有失实的问题，甚至回忆录和文化大革命直接参加者所写的论文集也同样存在失实的问题。我希望通过使用这些通俗的原始资料，来揭示现在流行学者们在研究共产党时期的中国上的偏见，这些偏见就是，要么忽略了这些原始资料，要么歪曲了这些原始资料的原意。

我的这一论文是要介绍一种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观点，这不是对那混乱的、疯狂时期的一般的历史性综述和概括。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对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新解释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一研究的主题是这场运动的灵魂，而不是记载这场运动的实际经过。这一研究的线索，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顺序和主要的事件为主线，为了避免表面性和重复性，这一研究所概括的历史事件都经过精挑细选，只有那些关键的，与主题有关的问题和事件，才会在本文中讨论。为了避免过多的旁论和注解，一些一般的术语在文中直接使用而没有进一步的修改。

这一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历史的研究方法。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被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背景里严格地检查和分析。我着重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因为从总体上来说，这场运动的历史性是文化大革命研究里的主要问题和空白之处。今天，关于这一研究题目的主要论著大部分都是由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学者们所完成。他们的分析主要是横线式的，而不是纵线式的，因而他们的判断通常都带有某些局限，或者是不完整。在中国，这种现象甚至更严重，正如卡罗尔（K. S. Karol）曾经抱怨的，“从来没有过一场革命能由创造这场革命的人，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沉默”[8] 从中国来的少数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书籍里，能够算得上是学术专著的就更少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更是一个“禁区”[9]，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心这样的研究会引起不安定，而且他们也不能给这些事件提供基本一致的口径，因为这些历史研究与当代的政治问题实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

8 理查得·考尔（Richard•Curt•Kraus），《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9 同上注。

支持与赞同这场运动的理想和功绩，毛泽东主义者发现，他们很难把他们激进的言论与他们所要推行的行政措施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协调起来，因为这些行政措施恰恰是他们在运动当初，用于鼓动群众起来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同时又是在运动将要结束时，他们用来压制群众，恢复统治秩序的工具。在这些互相矛盾的现实背后所埋下的悲剧性事实注定了这场革命的失败，而这恰恰好是毛泽东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放弃与割断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和功绩，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迫承认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的“错误”。不管怎样，当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如何保证党的高层领导人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被提到了议事日程。邓小平主义者不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除非他们愿意接受当初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所要求的，根本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在这些矛盾的背后，存在着文化大革命所带给中国的潜在生机。面对着没有任何改革良策的前景，中国人民急需可供选择的方向。已经成为过去的这场运动的理想和激情，因而也变得非常的宝贵。这是我坚信或者希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还没有完成的革命，它的最后阶段还会到来。完成这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重新评价这场革命的历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我希望我的研究会对这一目标有所贡献。

第二章

背景介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阶级斗争理论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盛行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理论主要着眼于1949年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如我在第一章里已经讨论过的，我称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诠述为“旧阶级斗争理论”，从而把它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而日趋显要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区分开来。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在公开宣传里消失的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在1957年下半年，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卷土重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紧随着1956年到1957年六月，中国人民被允许短暂的自由言论机会后开始的。1962年以后，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诠释在官方宣传里占了统治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理论的影响达到了它的全盛期。

在这一章里，我要讨论阶级斗争理论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从1957年到1965年期间，这种传播在中国社会里起了什么作用。我将讨论，阶级斗争理论如何被灌输到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这一历史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形成他们的政治行为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通过政治上支持和道德上认同两者的相结合，其影响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同时也是当时努力重整中国社会的前奏。与此同时，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也是他们思想意识形态解放的一种形式。灌输到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革命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动力。

在我的讨论里，我主要选用1956年到1966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我调查文化大革命以前阶级斗争理论传播的资料来源。这一讨论最关键的一点是如何评价这些被选出来的材料。因为《中国青年》并不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主办的正式官方刊物。1967年詹姆士•汤姆斯（James Townsend）发表了他研究这本杂志的成果。他视这本杂志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的代言人，” 汤姆斯（Townsend）的结论是这本杂志的调子非常接近党的当时路线。因而，他不主张《中国青年》的内容代表中国青年的意愿。实际上，他很清楚地区分了什么是党的教导，什么是中国青年一

代对这些教育的反应，因为这里面没有根本的矛盾。最后，他谨慎地把他的思路集中在“这些信息或许对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行为理由和价值观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上。[1]

Townsend的谨慎看来被证明是很有远见的。党的宣传教育和中国人对这些教育的反映之间的差距，已经被某些学者的研究所证明，如苏珊·舒勒（Susan Shirk），安德鲁·瓦尔克（Andrew Walder），林·怀特（Lynn White）等等。这些学者们发现，真正的中国社会与官方媒体所介绍的中国存在着很大的不一致。这一判断的基础，可以由《中国青年》来代表所有的官方宣传。这本杂志的内容主要是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所服务，因而对它报道的准确性最好多提几个疑问。

对《中国青年》杂志的这种评价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党的宣传教育和年轻一代所作的反映之间确实有差距。更不用说在不同的人身上，对党的宣传教育的反应就更是不同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恐怕得承认，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着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社会。

尽管如此，我将以那一时期的基本理解为标准来为这一杂志所提供资料的准确性作辨护。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一般中国人的政治态度是希望观点一致而不是意见分歧，在年轻人中间这种态度更为突出。当时的中国年轻人把党的教导和指示作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并且努力遵循这些指南。党的宣传教育和年轻一代所作的反映之间的差距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差距。因此，像上文那样认为《中国青年》资料的不可靠而否定我们以此对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解释显然是不明智的。假如这些争论导致了我们否认了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要影响，那将是对历史的歪曲。用它来完全否定官方宣传机器的准确性也是一种误导。

很多有力的证据证明，那一时期党的重要指示基本上被中国人民正确地接受了。最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是出人意料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如何为这一事实提供证据的呢？当群众开始从党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下一章我将详述），他们并不是要求改变党的早期政策，相反是要这些政策走到它的极端。这一现象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里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举个例子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里，曾经出现过一种所谓的“奴隶主义”现象，通常这是指1949年以后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党的教导和指示不加怀疑就接受的态度。

---

1 新阶级斗争理论主要针对社会中的不平等，而并不过分强调家庭出身和背景。

被六十年代中期席卷中国大地的空前的政治风暴所唤醒，很多造反派对过去“缺乏独立思考”感到自责，在一些中国最有独立思考头脑的人群里，这种懊悔是因为他们以前不加疑问的态度，这种现象很清楚表明了，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被大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

另一个有关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很有启迪性的事实是，尽管当时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完全的大混乱，大部分的政府机构都关门了，一般的生产停止了，武装暴力猖獗，但文化大革命以前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还保持没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晚期，才有比较可靠的事实表明造反派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论。但一直到1970年代的民主运动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前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些关键概念仍然被认同，关于这一要点，我将在第六章里再详述。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这种持续性，展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里的那种广泛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一结论被最近很多文化大革命参与者的论文集所进一步证实。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理想，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会想起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如何地（在他们的回忆里，如何愚昧）相信和忠诚于党的思想意识形态。

这些例子不仅表明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如何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民的头脑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积极反应，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反应，这种反映导致了当时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需要紧记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式与非正式社会之间的斗争，也不是支持与反对毛泽东集团之间的派系斗争。毕竟，所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与者都声称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理解而已。

在这一章里，我将把我的讨论集中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的积极影响，因为这是当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特点，并且与文化大革命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我的讨论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教育的全面综述，很多相关的外部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我这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在形成那些最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体个人思想中所起的作用。

因为这个关系，《中国青年》是一种理想的资料来源，因为它大量的报道和讨论都是

围绕着当时的中国青年对官方正式教育的反应。尽管年轻人在杂志上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的程度，不可怀疑地有夸张的成分，但在编辑和作家们的描述里，他们对党的教导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毋庸置疑地把一些特别的案例引用在杂志里作为证明是很少见的（后者是虚构的），但在试图把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矛盾在当时很普遍。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在一开始就怀疑这些资料的可靠性，除非我们可以证明当时的年轻人有普遍的逆反政治态度。实际上，我将在下文里证明，只要仔细地、有分析地去读这些材料，我们会在《中国青年》里发现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报道和讨论成为当时的典范和指南，实际上为年轻的中国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这些报道和讨论被承认是理解和运用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实践，同样的，这些报道和讨论的含义也远离了它创作的原意。实际上，这些原始材料是用来鉴定官方思想教育的效果的根据，因为这表现了一种被年轻的中国人真诚地、狂热地去仿效的模式。恰好因为《中国青年》是党的宣传机构的代言人，他的内容可以被认为是在官方宣传的主流之内。因而，我相信我在这些研究里的发现是官方思想教育的典型，是当时大众对这种教育的通俗反映，也是我在其他章节里得出结论的有力证据。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点像地质学上的探孔观察，目的是要以点见面，而不需要去发掘整个矿场。

在下文里，我将讨论在巩固共产党的社会地位，继续已经进行中的社会改革，加速经济的发展，和即将到来的意识形态的改革的过程里，阶级斗争理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公众的心理与学者圈子里都认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新抬头是和毛泽东与他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有紧密联系。不管怎么样，这是一般的正确印象，但从历史上来说是不精确的。因为毛泽东是最早争论党的主要工作方针应该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转变的党的领导人之一。因而，在“群众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贯穿革命

始终”的情况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被群众认为是政治理论的准则。简而言之，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新抬头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必然的、逻辑上的后果，但在当时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事实上，1956年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阶级斗争的结束，早就被预料到了。几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天起，那种理想的，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民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阶级斗争在中国的结束在当时被作为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之一来欢庆。只是当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面临着另一场严重的挑战时，阶级斗争理论才又被重新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著名讲话和1957年上半年党内开始动员整风前，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挑战就已经开始集聚起来了。1957年上半年爆发的这场政治风暴其实在1956年就已经有所预示，从《中国青年》杂志改变腔调这一点上也可以见其端倪。正如汤姆斯（Townsend）所指出的，在他的研究里，1956年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比其他年份出版的“更有意思和更有刺激性”，同时也是“最混乱和最难总结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与当时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消失的观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种政治气氛的改变可以在1956年第一期《中国青年》的一封读者来信中看到。这封信是河南省的李楠枫寄来的。李楠枫的异议认为，年轻人以农村落后条件为借口而不满意在农村工作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力，在这一前提底下的有关“历史事实”，“身体状况”，“天生的人性”，和“存在的目的”等等讨论与政治“观点”或者“人生观”是没有关系的.

李楠枫的信触动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通过强调这一问题的“目的”，他很明显地抛开了通常的政治方法。通过强调“历史事实”，他含蓄地反对了革命的原则。通过强调“身体状况”，事实上他公开支持所谓的“科学”方法。在他“天生的人性”信念里，也显然地放弃了阶级分析。所有这些论调集中含沙射影地对共产党在社会制度里占优势地位所起的作用提出了怀疑。假如当时社会的“主要任务”本质上不再带有政治色彩，那么共产党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那一个阶层的人，共产党可以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优秀分子呢？

当然，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被这么尖锐和明确地在《中国青年》上提出来过。事实上由李楠枫的信引起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的语调比李楠枫的观点更为消极。但是其意义在于尽管这些问题是含糊的，和有所保留的，但它还是被公开地提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这封信作为新倾向开始出现的信号，被当年《中国青年》的其他期刊所证明。最显而易见的是，事实上当年的每一期都充满了抱怨共产党干部的牢骚和怨言。这样的结果使共产党的优势地位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

最严重的抱怨或许是有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一位读者说，他和他的妻子结婚以后的四年，一直分居两地相距300公里之遥，每年的三个假日是他们唯一的见面机会。尽管如此，在这些少有的机会里，他的妻子还经常被安排上班，在他假期结束离开之前，他只能在他妻子工作的医院门外和她讲话。[2]

“没有人性”被作为一个名词，由一个读者用来批评他的领导不闻不问他要照顾他的妻子与她的新生儿的需要，还故意阻拦他。在另一封信里，一位母亲抱怨说，自从她被派到一个新的办公室，她再也没有时间照看她的孩子。她非常生气，因为他们不让她在中国新年放假，尽管工作上并不需要她留在那里。当她对领导提出意见后，她被指责为“个人主义”，因为她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等等。[3] 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不下六百多封信寄到编辑的手上参加这些讨论。[4]

工作分配是另一个常见的抱怨被发现在《中国青年》杂志里。一个音乐系的优秀学生被分配当一名会计，她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学算盘。这些绝对不是个别的例子。在教育汇报讨论会上，“电子工程系的学生被分配当机械工程师，机械工程系的学生被派去管仓库，主修物理学的被派去搞化学，兽医被派去教体育，园林设计专业的找不到工作，被要求去学茶叶生产。”

一个很有启发的例子是，两个历史系和中文系毕业生的命运。他们被同时分到同一个城市，但是历史系的被要求去教中文，而中文系的却要教历史。他们两人被同一个省教

---

2 詹姆士·汤姆斯（James R. Townsend），《革命的中国青年：对（中国青年）的研究》（*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Chinese Youth: A Study of Chung-Kuo Ch'ing-nien*）（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7）.

3 同上注，58。

4 苏珊·舒勒（Susan L. Shirk），《同志间的竞争：在中国的学生策略和职业动机》（*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安德鲁·瓦尔克（Andrew G. Walder），《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中国工业里的工作与权威》（*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1986）；林·怀特（Lynn T White III），《政策危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有组织地引起的暴力》（*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育局所分配！令他们更为懊恼的是，当他们提出调换工作时，居然被上级拒绝了。

假如说房子分配和工作安排上的问题是由于具体的需要和正在进行中的新中国建设的现实条件（假如保守一些）所造成的话，那么那些卑鄙的、利用党的权力干涉群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就很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了。如一个例子，一位年轻妇女抱怨说，她的党支部书记批评她“生活作风不好”是因为她与其他年轻人开玩笑。她还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她烫头发，又是睡觉睡得晚，喜欢穿高质量的衣服。另一个例子是，两位学生受到批评仅仅是因为他们送了一个洋娃娃给一位当妈妈的同学，而这个礼物“缺乏思想性”。

很多人特别对被强迫参加集体活动表示非常愤怒。一位丈夫抱怨说，他的学生妻子被要求参加很多“课外活动”，根本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这些做法非常普遍，以致一位读者提问，是否允许有个人的业余爱好。他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在他的自由时间喜欢看书，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多次批评为“脱离群众”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另一位读者陈述了一个春假被完全破坏掉了，就是因为过分强调了“集体行动”。

很多这些令人讨厌的行为实际上是共产党共通的、长期固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开始的时候可以适合当时的社会条件，而正如多数来信的作者所感到的是这种社会条件已经在中国不存在了。换一句话来讲，在他们抱怨的背后是对旧时期已经过去的承认。正如李楠枫的信指出的，“今天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把今天与革命时期来比较是不对的”。简单来说，对于李楠枫和杂志上提到的其他人来说，随着时间的过去共产党的很多旧的方法已经是没有必要了。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实，因为这样一来就开了怀疑共产党自称在社会领导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先河。

这种对共产党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的可能威胁（无意中地）被共产党自己在它宣扬中国现在面临着新的“主要任务”运动中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必须完成的。这场运动随着五十年代中期号称“向科学进军”达到了顶峰。正如汤姆斯（Townsend）曾经指出的，这场运动对1956年《中国青年》杂志的内容有很重大的影响。“大量赞颂科学和寻求知识的文章几乎出现在每一期杂志上，”同时大量的素材也是与“学习”有关，在其他时期这些通常都是由政治学习和自我修养所占据，杂志“呈现出更多的学术色彩”。中心任务向科学技术专业的转移，好

像与政治和思想理论对立起来了，假如可能的话，遵循它的逻辑结论，这种转移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力不仅是无关重要的，而且是对中国人民努力创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国家的一个负担。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旧的方法，已不再适合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样我们发现了一篇在“向科学进军”开始以后发表的文章，文中承认这种“进军”将要求完全不同的专业技术，这些技能与共产党在中国长期内战中所采用的军事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一位投稿给《中国青年》杂志的读者这样评论，“采用像‘突然袭击’，‘闪电战’这样的策略已经是毫无用处了”，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重点已经转移了。这些不同寻常的预告毫无疑问是指那些共产党的老干部，他们通常经历过战争的锻炼。一些共产党的干部接受了这样的评判，在“进军”中自动让位。包括数量不少的共青团干部拒绝参与到运动中，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资格为这场运动作贡献。

与此同时，年轻人被建议去努力学习真心诚意地去继承那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长期的劳作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由著名科学家，像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教育学家周培源写的文章都出现在杂志上。[5] 同时还建议中国的年轻人“虚心地向老教授请教”，包括那些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老专家。这些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不再自动地被认为是老朽、腐蚀社会，而可能是对新中国有用的智力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于被宣布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的地位逐步提高，但其代价是共产党的威信却下降了。现在的年轻人被说成是在“老知识分子的关怀下成长”而不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了。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著名学者的介绍取代了革命英雄的故事。更严重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共产党甚至变成了“前进”的障碍。

有很多抱怨是关于党组织如何妨碍学生的学习。认真努力学习的学生，努力掌握他们的所学专业，往往受到党的行政干部的攻击，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个人主义”，“学习目的不明确”，或者是“对本职工作不满意”。有关这些例子的情形可以在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印制的连环画上看到。其中的一个例子，画面上是一个年轻人正在书桌前学习，但被干部拉向另一个方向，要求他参加“集体活动”。在另一幅上，有这样的对

5 例如：高原（Gao Yuan），《自来红》*Born Red*（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张钧（Chang Jung），《野天鹅》*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话："你是不是在写你的学术论文呢？""不是，我正在写关于'写学术论文是个人主义的表现'的检讨"。

另一位读者来信抱怨，他的朋友被指责为"只关心个人的成功"，因为他在星期天上了半天的图书馆。一个护士在学习，准备将来当医生，但是被她的领导指责是"往上爬"，"目的不纯"、和"个人主义"。一个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被拒于共青团的大门之外，因为他想当一个"科学家"和学"理论物理"。[6] 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里，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共青团员因为他们希望做他们自己的研究，而被批评是"反党小集团"。

以上的抱怨和讨论不仅仅是承认国家从旧时期向新时期过渡转变的后果，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状况。强调"革命时期"的结束，这些人在暗中鼓吹个人幸福和物质享受。支持学习科学，他们实际上追求精神上的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才是1956年版的《中国青年》鼓吹和煽动性内容背后的真正变化。

这些新精神没有出现在真空里，而是在一种特别的政治环境里，正是这样的过渡环境提供了加速度。简而言之，从1956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现的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强调政治的新要求，引起了对共产党过去的做法一片反对。他们代表了与中国共产党基本原则的本质分离。有关这方面更多的例子和证据可以在《中国青年》不断出现的新主题里发现。

这些新主题里的其中一个是有关人性的讨论。这一讨论在一篇标题为"人应该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文章里得到很广泛地概括。这篇文章广泛地揭露了很多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当权者，好像老师和干部，非法设立公堂审讯被怀疑的人。不管怎么样，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这篇文章是用人道主义的口吻来写的。在谴责它所揭露的虐待和犯罪行为的同时，作者公开颂扬欧洲十六和十七世纪思想家们的人道主义。通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好像"人性的觉醒"，"人性的发现"，"人性的尊严"，"尊重人格"，"尊重人权"等等这样的用词。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里面没有出现过阶级的概念。

这样的新主题，尽管不是一种波澜壮阔的趋势，仍然可以在那一年的其他好几期杂志上看到。例如，评价人的个性现在更多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年轻人的生理特征[7]与他们身体的健康状况被受到同样的重视。有关性的问题以一种纯医学的术语来讨

6 例如，《中国青年》第206期，1957年5月1日，25－30；第207期，1957年5月16日，30-32
7 汤姆斯（Townsend），41.

论。[8] 传统的中国绘画由于它的自然美和它的特别技法被人们所欣赏。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价值被得到承认。甚至传统的道德标准“忠孝”也得到强烈的保护。对个人之间友情的需要被认为与同志之间的革命友情一样的重要。

《中国青年》1956年的期刊里的另一个新的主题，是强调以民主政治和必要的法律制度来防止和控制滥用权力。自由讨论受到鼓励。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也变了调子，现在允许接踵而至的不同意见出现在它的版面上。这其中甚至有人建议搞一份“自由墙杂志”，在那上面人民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与此同时，不少非民主的行为受到批评。这其中还包括缺少言论自由，非民主的方法被用于挑选共青团候选人，和其他很多相类似的事情上。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的干部滥用权力和违法乱纪被提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在那篇揭露非法刑讯的文章里，那位作者控诉说，这些做法“践踏了人权，违反了国家法律和党的原则。公开蔑视、违背了由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国家宪法。”[9] 根据基本的国家宪法，共产党组织的很多行为和做法受到了批评。如一个例子，检查一般人的私人来往信件的行为被指控为“违反了宪法和人的基本权力”。[10] 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同时被宣布“批准结婚的权力应该属于政府部门，而不应该是党组织或共青团。”[11]

所有这些投诉和讨论，且不说其目的是什么，也不管是不是系统的或者是有根据的，但很明显地是一种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挑战。这些汹涌而至的不满的背后是相信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国家发展的重点也应该转移，这样就使共产党一直推行使用的旧方法和实践都显得不适应了。但是这仅仅是全盘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适当性的一个开端。假如理性的推断和科学的计算才是重要的，那么共产党到底有什么作用？

通过这些观察和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李楠枫的那些要求所隐含意味的严重性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即“政治立场”和“生命的哲学”的观点应该被抛弃了。通过把这些问题与政治讨论分开来，他实际上否认了共产党在中国社会里的基石地位。对于他来讲，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比他们的下属在工作上和学习上都落伍了。”在这里，尽管他的表达形式显然与他的内容相去甚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阶级斗争理论在这里所

8 《中国青年》第176期1956年1月1日：16-18.
9 同上注，184（5月1日，1956年）：39-40.
10 同上注，190（8月1日，1956年）：38-39.
11 同上注，190（8月1日，1956年）：8-9.

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假如阶级斗争不再是一切的中心，那么自然而然地国家的日常事务就会变得与政治无关了，那么共产党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将会失去它的意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物。

这种感情很明显地表明，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形态教育的深深的仇恨。在《中国青年》杂志的篇章里，我们发现很多有关这一类的政治学习是如何的不必要和令人厌烦的描述。在一幅漫画上，一位年轻的干部的脸画得像一个老学究，正在进行一场马拉松讲授如何以正确的道德标准去玩游戏。在一幅讽刺漫画上，参加一个重要整个代表团都迟到了，因为临出发前共青团书记给他们作了一个又长、又重复的讲话。[12]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随意滥用思想意识形态的权力，以此来获得他们政治上的或者是个人的利益，或者以此保护他们不受任何攻击的现象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样，我们发现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强迫一位妇女和他结婚，并告诉她，只有与他结婚才可以证明她已经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幅漫画描写了一位干部在制造一大堆的政治“帽子”给一个人，这个人刚刚给报社寄去了对那位干部的批评信。[13]

共产党的地位已经无足轻重的这种情绪生动地表现在一本苏联小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上。这本小说详细地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农学家如何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旧的党的官僚主义者斗争的艰苦过程。与这本小说形成对照的是：年轻的与老的，科学与习惯，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

从1957年二月到六月的百花齐放运动使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挑战变成了对共产党的攻击。以上我想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党进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由以前日渐增加的不满所造成的。更进一步来说，这些对现状不满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党的挑战与相信阶级与阶级斗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有着紧密地联系。这一结论的根据是人民共和国对“百花齐放”所作的反应——反右运动，反右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反右运动一开始就马上抬头了。实际上，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被用于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已经在一些文章上出现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第一期

12 同上注。191(8月16日,1956年):40.
13 同上注。190(8月1日,1956年):8.

《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载了一篇文章为在中国社会里运用阶级概念作辩护。文章说由于阶级存在的延续性，减少或削弱党的领导不是近期可以发生的事。在紧接着的另一期上有一篇文章则反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在中国存在，只不过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而已。“[阶级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而现在“主要是以思想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表现。”[14] 当然，最有力的证据是现在有右派分子发起的向共产党进攻被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重新兴起为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延续使共产党的领导变得绝对的需要，政治标准重新获得它的重要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和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就会使人民群众在前进的道路上失去坚强的核心。”[15] 阶级斗争的经验又一次被认为是很重要的。由于阶级斗争将要继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就没有理由要求那些“有丰富阶级斗争经验”的老资格共产党干部让位了。出于同一个原因，政治标准应该作为选拔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16] 这样一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政治特权公开地被得到承认。[17]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复苏还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为日后评定“右派分子”反党的程度定下了依据。从民主主义方面来讲，共产党现在很乐意承认当时的政治制度里存在非民主的方面，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器必须对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人实行专政。”“对于那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民主和自由可言。对于那些阶级敌人，如右派分子，我们决不应该手软。”当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性被提出来时，这样的主张和要求在另一个角度被进一步证明。“共产主义境界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是“无产阶级精神的精髓”，共产党是由社会的最优秀分子所组成。[18] 这样就没有理由发扬其他道德精神原则而不先考虑共产党的精神原则。同样，要求精神上的完美和升华是错的，那些要求精神独立和造反精神的是“反动分子里的顽固派”。

此外，共产党的干部也利用阶级斗争理论的复兴来推卸共产党造成中国社会里的很多不公正的责任，而这些不公正曾经是百花齐放运动之前和运动期间大量痛苦的上诉和不

14 同上注，9.
15 同上注，9.
16 同上注，186（6月1日，1956年）：39-40.
17 同上注，8-9.
18 同上注，185（5月16日，1956年）：5-6.

满的主要来源。例如，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官僚主义”，“党派之争”，和“主观主义”的罪恶来源被认为是对社会最严重的损害，它的源头没有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现，相反可以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度里发现。这是因为旧的制度没有彻底根除，才使以上那三种“主义”得以幸存。相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公有制度，这是与私有制度性质相反的，所以也就与那三种“主义”的出现没有任何的联系。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产生“特权阶层”，如右派分子所指责的，因为这些特权是不能由这种制度来保证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复兴就这样非常稳固地加强了共产党的权力。在反右运动期间，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机构是运动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被摆在非常明确的位置。[19] 同样地，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变成了他们基本的政治标准，而那些反对共产党在中国社会里至高无上地位的人，自然地被当作反动分子了。此外，还有一种争论，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建立在所有的领域，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自然科学发展而来的科学。[20] 简而言之，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如右派分子鲁莽建议的减少共产党在中国社会里的作用。相反，党的作用应该被加强，最大限度地加强它在社会里的作用。这些作用的范围不仅仅限制于政治的领导，同时还应该包括组织上的领导。加强共产党领导的这些努力走到了非常极端，以至于反对共产党干部的行为扩展到一般群众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被认为是“反党行为”。

其他社会团体的陈述也帮助加强了共产党的神圣地位。知识分子，最近才被认为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又一次被归类为资产阶级。年轻学生们大部分是由“来自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组成，因而被要求思想改造。甚至“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也被认为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根据当时的一篇评论：

> 国内剥削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习惯还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上存留着，人们对社会主义还有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就十分确定不移地显现出共产党的任务；它必须作率领全体人民，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绝对领导者。

---

19 同上注，39.
20 同上注，187(6月15日，1956年)：30.

这种争论置共产党的地位远远高于社会之上。作为“绝对的领导”共产党现在公开地宣称它管理和支配所有事务的权力。正如《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投稿者自豪地宣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可以这样完全和广泛地管理国家的。”

少数关于前途讨论的观察报告可归纳如下。首先，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复兴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原始计划。毕竟，在1956年共产党的八届中共中央全会上，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宣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结束，因此鼓励了新的意识形态倾向于不再强调这些阶级概念，这种趋势我们已经从那一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观察到了。毛泽东的著名讲话被公认是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标志。只是因为当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右派分子”狂热的攻击，共产党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那里寻求庇护。1957年晚期阶级斗争理论的火药味到了1958年就几乎完全没有了。这很明显表明共产党重新抬出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迫于无奈和毫无准备的。在1959年重新慢慢出现的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才又把毛泽东的著名讲话重新翻译成强调在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管怎么样，直到1962年阶级斗争的理论才全面铺开。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使1956年的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所宣布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束的理论受到正式的批判。

第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1957年的重新出现，是我所要说的旧阶级斗争的理论。在那一时期《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几乎主要集中在旧的有产阶级和他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那一时期《中国青年》杂志上所登载的所有真实的或者是虚构的故事里，阶级敌人要不是从前的有产阶级，就是旧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是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残渣余孽。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没有彻底完成，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也主要是在这种前提下来理解的。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新兴起不仅仅为巩固和进一步树立共产党的权威领导地位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工具，同时也非常有力地加强了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反右运动过后，共产党的威信短期内提高了很多。这一事

实还可以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对共产党干部武断专横和残暴行为的指控里得到证明。这些痛苦的控诉暴露了紧随着百花齐放运动之后，共产党的干部是如何运用他们的权力控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控制又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第四，这一点的分量并不次于第三点，共产党政治权力的膨胀主要通过强调和推行阶级斗争理论才得以实行。事实是，1957年以后共产党权力的全面增强并没有基于任何坚实的宪法基础或者制度上的改变。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全面教化由真正的政治权力全盘恢复了。但是这种政治权力的增强主要还是通过动员和说服人民支持共产党来完成的。人民对共产党的真心实意地服从是共产党的这种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来源。

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因而被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共产党和人民双方都必须遵循的，它保证了官方的思想理论能够被切实地得以贯彻。在这样一种关系底下，思想意识形态的讨论就变得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了，同时政治行动则由思想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标准来裁决。思想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政策之间的分界线，道德准则与宪法章程之间的分界线就很难变得泾渭分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表现了以共产党的官方思想意识形态来重新改造中国社会的全面尝试。

下面我将讨论这种全面教育在改造社会、经济发展和最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发生在1957年反右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场革命所起的作用。这些论述将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根据1956年《中国青年》杂志所表明的，当时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已经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继续社会改造

文化大革命以前阶级斗争理论的全面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以一种非革命的形式在中国社会继续转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可以从以前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提高得到证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阶级斗争理论灌输到社会的各阶层或许从1950年到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时期进行的社会改革就开始了。

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方针下，有一条共产党应该执行的“阶级阵线”，这条阶级阵线的关键或中心思想就是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同时还有“阶级政策”为这一阶级阵线服务。例如，对一个年轻人的政审里关于阶级政策的就有三个方面：（1）看成份；（2）不唯成份；（3）重在政治表现而不是家庭出身。

不用多说，这一阶级阵线和与相关的政策并不带有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常见的平等思想一样的概念。相反，社会被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待遇。然而，正如葛顿·怀特（Gordon White）所建议的这是一种“革命的平等主义概念”，这是用来重新分配社会、经济和政治机会，以便为那些历史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提供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从前那些社会上层阶级所享有的特权和地位现在被限制和取消了。从政策方面来讲，这意味着社会优先权现在给予那些出身于历史上贫穷的、势弱的阶层。这些社会优先权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包括：发展党团员、征兵、升学机会和工作分配。例如，在招收新生时，来自于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孩子受到优先照顾。一个共青团支部因为在发展新团员时没有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提供优先照顾而受到批评。《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到，在选拔共青团干部时应该贯彻阶级路线。编辑对他的观点大为支持。

阶级斗争理论的全面深入推广，阶级路线和与其有关政策的运用和贯彻当然没有给过去的下层阶层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对于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生活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当时的社会还是相当的贫困。然而，这在当时却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从前处于社会底层的整个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人们现在为他们的赤贫家庭出身而自豪，就犹如以前的贵族和社会上层人物以他们高贵的血统为荣一样。另一方面，来自于有产阶级家庭背景的人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所给与他们承受的社会负罪。

这种倾向被概括为所谓的“阶级教育”，这种现象在1956年非常流行。工人和贫下中农被邀请到机关企业、学校做忆苦思甜报告。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推理，解放前受苦最深的人，现在是最革命的人，至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出身贫穷就这样变成了一种莫大的光荣。这种新的社会潮流代表了社会从传统里分裂出来的一种剧变。

事实上，阶级斗争理论的深入人心对传统的文化和风俗习惯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阶

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旧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不仅仅被认为是过时了，更为明显的是这些东西都被冠上了旧的“剥削阶级”的头衔。这表明了当时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了旧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同时也给了文化和风俗问题一种新的政治含义。社会下层阶级社会地位提高，和他们对有产阶级的批评所产生的政治动力导致了对旧文化的全面攻击和批判。对旧文化的这种围剿起源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大威力。尽管这些社会裂变趋势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演变为暴力行动，但其巨大的威力在1960年早期就已经被强烈地感觉到了。

当时的两个例子很好地描绘了阶级斗争理论的特别威力是如何对旧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提出怀疑和挑战。第一个例子涉及一处水库的修建，这个水库要淹掉一座土地庙，当地人说这是块“龙背”，[21] 许多老年人都强烈反对使用这块祖传的圣地，但是他们的反对者抬出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认为希望保留这块祖传的圣地不被动用是“地主和富农”的阴谋诡计，他们是用“封建迷信”来对抗“社会主义建设”。党支部因而“联合”贫下中农说服了那些“被迷惑的阶级兄弟”，那些反对派几乎立即就土崩瓦解了。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一位年轻人的报告，在他的报告里，他说他和其他的同志用晚上的粪便来浇庄稼，但他们的做法是被当地的传统观念所禁止的，由此一来，他们的做法受到他们村子里一些人的批评。《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对他的报告给予大力的支持：

> 你做了一件完全正确的事。在农村里，尽管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由反动阶级所沿袭的封建迷信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特别是现在，所有的反动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妖魔鬼怪都想用阴谋诡计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不同的封建迷信思想来迷惑那些落后的群众，为他们的翻天作准备。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向旧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进攻的过程里，阶级斗争理论可以成为一把绝对危险的双刃宝剑，不管你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对于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在新社会里的地位已经是非常不稳定，当他们参与诸如宗教等活动，这样的事情就更加重了他们的危险性，因为很显然的，他们将会面对很严肃的政治处理。

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理论也给了出身于“好”的家庭背景的那部分人很大的政治压力，因为他们必须遵循流行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也必须是适当的社会行为。正如阶

---

21 汤姆斯（Townsend），43.

级斗争理论的教育运动所解释的，假如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没有表现出对共产党足够的感恩戴德，那么他或她很可能就欠了共产党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情，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被认为有“背叛”的嫌疑，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人们经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坚持旧的信仰和习惯。例如，甚至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假如他们去寺庙求神拜佛，参与祈求福气和运气这样的“封建迷信”活动的话，那就表明了他“缺少阶级斗争的觉悟”。

传统中国人的观念是以家庭为中心，而这也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在阶级斗争理论全面占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对传统文化的一般攻击时，这一传统也受到巨大的震撼。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旗帜下，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了。“阶级的爱”超出了宗族纽带，或者家乡关系，就是最著名的一种说法。这样，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一位读者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来自于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和组织的人如何同心协力抢救了六十一位食物中毒的一般民工，因为这些民工是他们的“阶级兄弟”。

另一方面，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被告诫应该与他们的家庭划清界线。这样一来，如一个例子所显示的，有一位战士在他探亲期间没有去探望他那“成份不好”的舅舅。一位年轻人拒绝和他的富农舅舅一起吃饭。另一位青年人不愿意参加他那地主爷爷的葬礼。同样地，一位青年人因为对他的地主资本家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而被批评。[22] 孝顺父母的传统和家庭宗族关系被指责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精神，”这是阶级敌人用来“混淆阶级阵线，欺骗人民群众，以掩盖他们反革命的罪恶阴谋。”

在阶级斗争理论教育运动过程中，“阶级友爱”得到发扬光大。当然，这种爱不是一般的爱。很显然的，这是从传统家庭关系那种狭隘的血缘联系分离开来的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理论教育的全面推广极大地破坏了传统家庭的那种上下、老幼、年长年轻之间的关系。现在是谁的思想观念正确，谁就有发言权，而不再是论资排辈了。正如在《中国青年》里看到的，中国的年青人被鼓励去批评他们的长辈，去帮助他们的父母提高“政治觉悟”。[23]

正如我们以上所讨论的，由阶级斗争理论鼓动起来的抨击旧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得到

22 同上注，188(7月1日，1956年)：14.
23 同上注，180(3月1日，1956年)：22-23.

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妇女地位的根本改变。妇女的解放被认为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同样的，这一过程是有政治权力直接支持的。例如，一位年青妇女坚持要求参加一个文化俱乐部和其他男成员一起工作，她把由此而引起的流言蜚语置之度外，因为她相信她的行动是响应“党的号召”。[24] 另一位住在边远山区的年青妇女不仅打破了当地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唱歌的传统习惯，她还与当地的专业民歌手一起参加了公开比赛。通过唱“革命歌曲”战胜了那些男歌手，因为他们所唱的歌据说是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情调”。[25]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性别观念被阶级观念取代了，妇女应该与男人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现在妇女不仅参加一般的工作，她们还下地耕田，饲养家畜，[26] 甚至参加探矿队。简而言之，妇女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因为反传统的斗争现在被作为严峻的阶级斗争，所以这样的斗争不分巨细都是很重要的，对旧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进攻也就来得非常的全面和深入彻底。我们可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现大量的有关包办婚姻、结婚仪式的专题讨论[27]，什么是新婚夫妇的正当举止行为，[28] 对公众舆论的正确态度，[29] 有关丧葬仪式等等都讨论到了。综合起来，这些讨论组成了对传统的标准行为规范的全方位的进攻。

伴随着对旧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全面进攻是推广普及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阶级斗争理论在这里所起的特别作用是它强调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服务，而贫下中农受教育的水平通常是最低的。在这里阶级阵线实际上成为了保证普及教育的基本原则。因此，最高荣誉被授予那些自愿到最贫穷落后地区工作的人。

一位有代表性的这一类模范教育工作者是一位叫薛安福的年轻人。薛安福本人只有初等中学文化，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残疾人，双腿瘫痪。虽然如此，他还自愿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之一，苗族聚居的偏远山区去工作。

这一地区的苗族居民，就像中国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历史上就一直是中国最穷的人，他们所受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熏染非常有限。例如，很多人甚至没有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大部分人都是文盲。作为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在

---

24 同上注，177(1月16日，1956年)：5.
25 同上注，177(1月16日，1956年)：6-7，8-10；179(2月16日，1956年)：17-19.
26 同上注，179(2月16日，1956年)：21-22.
27 同上注，178(2月1日，1956年)：5.
28 同上注，179(2月16日，1956年)：19-22.
29 同上注，189(7月16日，1956年)：26-29；190(8月1日，1956年)：21-23；192(9月1日，1956年)：34-36；193(9月16日，1956年)：34-36；194(10月1日，1956年)：22-24；196(11月1日，1956年)：19-22；197(12月16日，1956年)：20-23.

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重建社会主义祖国运动的一部分，共产党已经在当地组织了农村合作社。但是当地的苗族居民不知道怎样记账，他们用玉米粒来算工分，当一些母鸡不小心吃掉了他们的工分时，这种算工分的办法会演变成为一场悲剧。

正是在这种贫穷落后的艰难条件底下，薛安福在那里开办了第一所学校，教这些苗族人如何使用算盘，和基本的书写技能。十一年以后，他教过的学生几乎遍及当地四十个部落的每一个家庭，他所教过的学生里有足够的人可以熟练地使用算盘，因而当地人所依赖的用玉米粒来算工分的方法最终被淘汰了。

另一位被高度赞扬的年青人是因为他自愿到一个只有十三户贫穷人家的一个很小的村子里工作。因为同样的事例，一位年轻妇女因为在一个很小的火车站主办一所学校受到高度表扬。

一个最大的成功就是让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够上学。一位姓郭的乡村女教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0] 郭老师挨家挨户地探访有适龄儿童的家庭，动员和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为了帮助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郭老师不仅仅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她还亲自带领学生从垃圾堆里拣破烂，回收能够拿去卖的东西赚钱帮助穷学生。她甚至手抄课本发给那些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课本的学生。为了争取使每个学生都能上学，郭老师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帮助有特别需要的学生。例如，她上门教一个九岁先天智力发展比较迟钝的男孩，这个男孩自从他妈妈死了之后，他必须留在家里做家务和照顾他的兄妹。这个男孩不但智力上迟钝，他身体上还有缺陷。他经常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郭老师帮他洗换裤子还帮他做家务。当她观察到这个男孩会唱摇篮曲给他的弟弟和妹妹，郭老师把课文编写成随口溜来教他，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学会了四十多个汉字了。为了帮助一个瘫痪的女孩子上学，郭老师一边给她上课，一边替她按摩。为了争取一个女孩子上学，郭老师带着一组学生到她家门外做游戏。她还跟着一个调皮的男孩子到树林里，争取和说服他到学校上学。她甚至还专门学了一种方言，以便帮助一位转学的学生。通过这些努力，郭老师成功地动员了当地所有的适龄儿童到学校学习。在她所有的学生里“百分之九十四是贫下中农的孩子。”

阶级阵线决定了普及教育的性质，而普及教育的性质反过来又决定了这种教育的形

---

30 同上注。178(2月1日,1956年):27.

式。为了适合普及教育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学校，多种形式的教育方法和灵活的时间都用上了。因而半工半读学校，夜校，技校和文化中心都得到全面地发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得到大力宣扬。例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例子就是最好的实例，郭老师不仅仅在学校里提供正式的教学，她还在农忙季节到农田里教那些必须回家帮忙做农活的学生。她还在学校里安排特别的班级给那些要照顾弟弟妹妹的学生。她同时还为学生提供家庭教学。相似的方法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有很多文章和报道都有专门的记载。例如一位教师把新字和新词写在大牌子上，挂在磨房里、池塘边、墙上、公共厕所和路边的树上来帮助他的学生学习。[31]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的全民普及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帮助学生掌握有实用的和有意思的知识这种普通目的。实际上，整个教育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它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从而帮助中国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一努力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普及性。在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口号下，这一时期的全民普及教育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触及到几乎每一个人。同样地，这也变成了一场特殊形式的社会总动员。事实上，这种形式我们可以在共产党政府努力沿着新的，（显然是社会主义的）路线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里随处可见。正是这种社会总动员给这一时期的社会改革创立了它最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就是阶级斗争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社会总动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广泛和深入。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社会动员的广泛程度远远超于社会的自发形式。通过声称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把整个社会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阶级斗争理论的应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人们服从党的要求。在很多事例中，共产党的干部通常是简单地强迫人们对他们的要求作响应。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种社会动员的强迫性在当时的公众里是众所周知的（今天也同样是众所周知），因而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详细多说。

然而，少数人意识到在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动员全社会的努力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到个人的需要。仍然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是直接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关联。这一时期的

31　同上注，16

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总动员有两个基本的关键要素。第一，社会动员的主要目标很清楚地被定义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这场革命要改造的对象。第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潜在的，假如不是实际上的）社会里最主要的革命基础，也是革命要依靠的对象。

这两个基本要素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形成了一种严重的挑战。一方面，他们要求这场社会动员全方位开展，因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占据了当时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此外，作为历史上最受压迫和最贫穷的群体，他们自然地成为这场社会动员的对象。没有一个人会被忽略因为他们都是革命的主力。另一方面，强迫措施只能作为最后的办法来使用，因为这一部分人不仅仅是“阶级兄弟和阶级姐妹”，同时还是真正的革命中坚力量。对这一矛盾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耐心，关心和辛勤的工作。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充满了这一类的文章和报道。

一篇题为《发动一个贫农女社员给我的教育》就很有代表性。[32] 文章的作者，一位姓王的女干部，负责组织和领导在她所在的公社里妇女们的工作。这位王姓干部搬进村子之后，她遇到一位叫桂珍的寡妇，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桂珍辛勤工作同时为人忠诚老实。但是她对集体活动和公社的事情不感兴趣。因为桂珍属于贫农阶级，王干部觉得她有责任动员她去参加集体和公社的活动。

可是，桂珍对王干部的热情一点都不关心。王干部一点都不气馁，她想尽办法去动员她，她开始帮桂珍做家务去关心她。最后桂珍同意让王干部搬进她家住，帮助她做日常家务事。在她的汇报文章里，她说她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她对桂珍的信心，因为桂珍是一位贫农所以她一定有参加革命工作的愿望。怀着这样一种信念，王干部想尽办法帮助桂珍。她坚持与她一起下地干活，回家帮她一起做家务。慢慢地，桂珍开始和她说心里话。原来自从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总感觉她自己带着晦气不吉利。王干部没有直接批评她的迷信和宿命论。相反，她建议桂珍去思考为什么自从1949年共产党来了之后，她的命运发生的根本转变。王干部还带她参加了几次学习讨论会。从那以后桂珍开始主动参加集体活动了。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一天，桂珍突然变得像以前一样非常的被动。经过反复多

32 同上注. 187(6月15日,1956年):31.

次谈心，桂珍终于承认是因为她变成寡妇之后，曾经被一些男人侮辱和诽谤中伤。王干部因而在精神上给她支持，还帮她与那些侮辱中伤她的人作斗争。从那以后，桂珍象换了一个人一样，她变得对村子里集体的事情非常热心，成为了一个积极分子。同时，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两个儿子也成为积极分子。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斗争理论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阶级斗争理论引导着王干部去接近桂珍。阶级斗争理论帮助了王干部发现桂珍身上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积极分子的潜在因素。最后还是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使王干部感到责任重大因而她必须想办法克服她和桂珍之间沟通的障碍。

另一篇题为《我如何动员了两个人》的报道，讲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贫农张大伯很少对集体活动和事务有兴趣，最近他甚至不干活了。他的老婆是村子里众所周知的“愚妇”。她曾经被地主强奸，在她与贫农张大伯结婚之前，她曾经和几个男人有过性关系。经历了过去的苦难和创伤，同时也由于她不光彩的历史所蒙受的耻辱，她一直呆在家里近20年，从来都没有工作。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个女人对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成为一个完全的“愚妇”。所以当她参加集体劳动，大家都觉得是村子里的一个大奇迹。她的丈夫也成为一个公社的好社员。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是这位作者的英雄事迹，包括他帮他们做家务，和这对夫妻数不清的谈心和动员，解释参加集体工作的目的。作者相信“阶级感情”是动员这对夫妻的关键钥匙。

正如以上故事所表明的，共产党在动员一般老百姓的努力上，重点放在对人民的真诚的关心。共产党干部和共青团员被要求“表示你对其他年轻人的关心，接近他们，发现他们的想法和需要，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33] 正如一位大学生在总结她的经验时发现的，关心人、爱护人是取得他们信任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由于这个原因，她坚持与一个老寡妇睡在同一张床上，尽管她的床上有虱子。她认为她要“永远是贫下中农的好女儿”，这正是她文章的标题。

对人民群众的真正关心，要求干部和积极分子帮助他们的日常生活。小的事情，如解决农民需要背带背孩子的需要，或者是紧急情况，像严重疾病，都会引起大众的关心和注意。一幅由《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画的图画上，共青团员认为照顾鳏寡、老人、病人

33 同上注（12月1日，1964年）：6-8.

和残疾人是他们的义务。更进一步的是，共青团明确规定团干部应该“关心年青人各方面的成长。”

来自大庆的张洪池被《中国青年》作为一个榜样来宣传，共青团鼓励所有的共青团员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34] 张洪池被分配到厨房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厨房里的工人都表现不好，工作也没有做好。张洪池通过帮助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唤起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例如，他把他自己的胶鞋送给一位老厨工，这位老厨工因为没有合适的鞋子脚总是湿。张洪池还把他的毯子送给了他的同事，因为他的同事毯子被烧了。当他知道一个工人因为长期病休没有钱理发，张洪池马上去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上门为这位工人全家义务理发。张洪池还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在厨房里给大家娱乐。厨房工友们都被他的真诚关心所感动，也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态度。例如，那位长期病假的工友在张洪池上门探访之后开始回来上班了。

伴随着强调对人民的“真诚的关心”是对共产党干部发扬自我献身精神的要求；正是这种精神在动员全社会投身到转变中国社会关系的长期努力过程中起着原动力的作用。在上面的例子里，张洪池把自己的毯子送给别人之后，他自己只能睡在厨房里取暖。为了买那台收音机给大家，他不仅仅花完了所有的积蓄，他还向别人借了钱。另一个相当特别的例子讲的是一位年轻医生从自己身上割下皮肤，为一位皮肤严重感染的藏族妇女做皮肤移植手术。这位妇女的丈夫被年轻医生的高尚行为所深深感动，后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平息反对中国政府的暴乱时，他替解放军带路当向导。由于他帮助解放军的行动，他被西藏叛乱分子杀害了。但是他的妻子却成了“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分子”。[35]

另一个在社会总动员里强调的主题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适合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目的。例如，一个年青人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他所有的时间都沉迷于古代英雄大侠小说里，他日夜梦想仿效这些传奇故事中的武林大侠的威力。共青团的批评和他父亲的责骂、鞭打都无济于事。团组织决定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帮助他，一位共青团干部发现这位年轻人喜欢看书，他开始送给他革命的文学作品让他去读，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之下，这个年轻人开始转变，开始参加集体活动了。

---

34 同上注。(7月16日,1964年):17.
35 同上注。(11月16日,1964年):7-9.

在另一个例子里，一个共青团支部采用了六种不同的方法去帮助六个“落后”青年。[36] 当时最流行的方法用来接近年青人叫“谈心”，这种方法强调一对一的思想交流。干部和“先进”分子应该帮助“落后群众”采用这种经常性的谈心活动。[37]

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是全面动员所有的新中国的年青人。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要求共青团的任务是“组织青年人中的先进分子，通过他们去团结和教育中间和落后的青年人，”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联合与组织所有的年青人。”[38] 要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对不同的需要必须给与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安排和不同的方法都应该使用。例如，为了动员结婚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和其他的集体活动，一个地方共青团支部经常组织年轻人帮助她们做家务，以便这些妇女可以被安排参加适合的工作。此外，某些表现突出的妇女被选为“模范妻子”，以她们的榜样来影响其他人。为了方便这些妇女，这个共青团支部经常在那些模范妻子家里开会，因为各种原因假如其他妇女不能参加，他们就派共青团员到这些妇女的家里，讨论共产党的指示，明确这些指示的意义。当一个新婚妇女搬到这个村子，当地的共青团支部就会马上与她联系。他们还与嫁到其他地方，已经搬走的妇女保持联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还有关于特别关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的讨论，关于没有文化的妇女的讨论，关于“落后青年”的讨论，关于“有问题”的年青人的讨论。

总而言之，在当时讨论得最多的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如何“联合”家庭出身不好的年青人。例如，在1965年那一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就有至少13篇有关这一专题的文章和报道。所有的这些讨论都很明确地指出，虽然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家庭出身，但是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这一信念反映在共产党再三重复声明的政策里，这一政策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被充分体现在重在政治表现这一首要标准上。出身不好的年青人因而也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39] 有关这一类年青人的模范人物被挑选出来以鼓励其他的年青人。模范团支部同时也被选出来。有关这一类的讨论包括：如何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阶级界限，[40] 是否应该和出身不好的年轻人结婚。[41]

---

36 同上注。(3月2日,1964年):13;(1月1日,1965年):28-29.
37 同上注。(7月16日,1964年):17.
38 同上注。(11月1日,1964年):18-22.
39 同上注。274(1月16日,1960年):25-30.
40 同上注。(5月1日,1966年): 14.
41 同上注。(9月16日,1965年): 8-9.

通过政治上的行政命令和一大批人的忘我工作，这场以阶级斗争理论所驱动，又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总动员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假如我们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国家政权的权力首先进入到农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通过使阶级斗争深入人心的教育运动，国家的权力已经直接深入到每个家庭，甚至触及到每一个人了。人民不仅仅从外部形式上被组织起来，同时他们的内部世界也被调动起来了。当鼓励新的工作态度和思想意识形态革命同时出现，横扫中国大地时，这一转变的明显效应也表现出来了。

加速经济的发展

阶级斗争理论在加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力资源，同时尽量减少材料的消耗。这主要是通过宣扬新的职业道德来实现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在支持公私合营政策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还在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的职业道德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关键。由于很多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中国在1950年到1960年期间及缺乏原材料又缺乏外国投资基金。正如很多经济学家都同意的，当时最丰富的、可利用的资源就是劳动力。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要使中国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中国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958年以后，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完全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的国家。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事实上已经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除了老弱病残之外。工作已经成为每个成年人的常规生活习惯了。当时的状况可以从这条流行的标语口号得到很好地反映："以劳动为荣，不劳动为耻"。

然而，恰好是因为全面动员所有的劳动力才使新的职业道德变得至关重要。对于一场全面动员所有劳动力的运动，同时也意味着竭尽了主要的可利用资源。中国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可能利用的劳动力还可以被动用了。简而言之，常规的动员劳动力的方法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要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动力。要使中国最丰富的

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能量，中国不仅需要动员所有的劳动力，而且需要补充更多的劳动力，同时需要这些劳动力发挥他们最大的能量。这就是当时号召新的职业道德背后的经济因素。

这种要求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反复出现。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和他们的潜能，”[42]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认为，“为祖国持续跃进英勇奋斗是青年共产主义觉悟的最高表现”。他继续说：

> 当广大青年用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而不去斤斤计较个人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推动他们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正如我们可以看见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直接与新的职业道德有关联的。需要指出的是，新的职业道德大体上证明了当时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支持和赞同追求个人幸福和物质享受的观点在1957年重提阶级斗争理论之后被完全否定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中国青年》上可以发现，当它在提倡和发扬新的职业道德时，同时也在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新的职业道德被认为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阶级本性。对劳动的不同态度被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重提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变成了对新的职业道德的有利号召。

新职业道德的要点是提倡热爱艰苦劳动，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美德。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有许多报告关于提倡艰苦劳动的精神。有一篇文章详细记载了一支“青年垦荒队”的事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支垦荒队是由城市青年组成的，他们都是自愿到这个物质条件非常差的边远山区工作。开始时，他们只能住在牛棚里，当他们的供应被洪水泛滥中断了之后，他们甚至靠吃野菜生存。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对当地生产的漆树过敏。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利条件，这些年轻人仍然保持着高涨的热情。他们的工作时间特别长，有时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在冬天还坚持工作，有些人生了病或者是受伤还坚持劳动。为了克服对漆树过敏，有些队员还特意接触漆树，试图培养自己身体里对这种物质的抵抗力。

当人们被要求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他们同时也被要求不计报酬。提倡艰苦劳动的精神

---

42 同上注.（3月2日，1964年）：13.

的同时也是鼓励自我牺牲的精神的时刻。动员新的职业道德的这两个要素，就这样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劳动力资源，同时也降低了它的代价。《中国青年》用了很大的力气和篇幅帮助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在杂志的篇章里对这些号召的反应有很多关注。例如，在反右运动前就已开始有关于削减国家干部工资待遇的讨论。[43] 一个上海工人被发现，他修改自己的工卡以便少拿工资。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医生，他用他自己的皮肤为病人做植皮手术，还把自己的血输给病人，救活了那位伤寒病人。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农民以牺牲自己亲生儿子的需要为代价，要求他的妻子给公社的羊羔喂奶。

新的职业道德带来了出色的工作和优秀的服务。上面提到的模范工人张洪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4] 作为一个厨师，他很注意员工的特别需要。当他发现一位女工不吃肉，每次饭堂吃肉时，他就专门准备炸豆腐给她。他还为两位孕妇准备不同的菜色，直到她们满意为止。

一位山区邮递员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两年的时间内，送信的同时他还给不识字的人读和写了1180多封信，投递了300多个包裹，送了14,400元到那些有困难去邮局取钱的人家里。他甚至在他投递范围内的106个生产队组织了读报小组。一个农场的厨房工人不但为大家准备好可口的饭菜，他还做很多份外的事情，他为厨房养猪，养鸡，为别人洗衣服，缝补衣服，搞卫生，照顾生病的人。[45] 一个商店的女售货员不仅教顾客怎样烹调，还给老人、病人、有婴儿的家庭和住得离商店很远的人家送货上门。[46]

由阶级斗争理论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把职业道德，原先基本上是精神上的问题，变成了政治上的问题。因此，一个人怎样对待工作，现在与严肃的政治态度挂上了钩。一个人可以因为他是否努力工作受到惩罚或者是奖励。阶级斗争理论因而把这一问题带回到精神道德问题上来，但添加了更强烈的色彩。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新的职业道德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把工作做好就完事了，相反，现在做好工作被视为锻炼一个人的革命意志的重要方法。作为一个精神道德上的问题，新的职业道德进行得很单一。这样就使这一过程变得非常激进，因为现在有价值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革命的原则了。在这些原则的影响下，一位名叫向秀丽的女工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扑灭了一场工厂

---

43 同上注.（7月16日,1964年):17.
44 同上注.（9月16日,1964年):31.
45 同上注.（5月16日,1965年):19.
46 同上注.（6月16日,1965年):10;（7月1日,1965年):2.

里的火灾，最后光荣地牺牲了。[47] 同样的，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刘文学，因为发现村里的地主偷公社的庄稼，他挺身而出与地主作斗争被杀害了。[48]

在怎样向这些英雄学习的讨论中，在党的利益面前，人们“无条件”的自我牺牲是需要的。只有在精神道德的范围内，以上提到的英雄行为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评价。否则，正如一篇文章争论的，向秀丽的自我牺牲不应该被颂扬，因为她可以生产比她抢救出来更多的东西，这是在她作为一种物质财富，没有牺牲的情况下来说的。[49] 同样地，在这样一种推论下，一位干部因为抢救一条船被淹死的行为，应该被批评而不是赞扬了。[50] 但是这样的推论没有说到点子上。讨论在进行，什么应该是衡量他们行动的价值，明显的不是物质财富，正如一篇文章为刘文学的行动辩护所指出的。[51] 这个被地主杀害的小男孩不是保护几个青椒，而是保护“人民公社”和“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允许任何的软弱和妥协。[52] 这是为什么他不像一些人所建议的，先放地主走，过后才向领导报告地主的偷窃行为。在阶级敌人面前，软弱和妥协，哪怕是暂时的，等于是向他们投降。这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所不能接受的。

当然，像这样的例子是非常罕见的。然而，他们的影响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打下烙印。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是“假如英雄可以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在这样的原则下，个人利益应该置之度外。年青人被要求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就走到哪，随时听从党召唤。他们相信只有这样做，他们才可以实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一本当年红卫兵所写的论文集生动地描写了这种精神道德上的追求如何直接与阶级斗争理论教育联系起来，如何被一步步的强化。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假如一个学生在他的作业里发现了错误并作了修改，这就可以被认为是他发现了阶级敌人并且消灭了他们。拔了一根草也可以被认为是消灭了一个阶级敌人。就像是一种潮流，损害了一棵秧苗好像等于伤害了同一战壕的战友。一位作者这样写：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到农村帮助农民劳动。一个近视的女同学锄错了几棵

---

47 同上注，（2月16日，1965年）：15.
48 例如，同上注，（7月16日，1965年）：26-27.
49 同上注，（9月16日，1965年）：2-5.
50 同上注，（9月1日，1964年）：18-21.
51 例如，同上注，（11月1日，1964年）：24-26，27；（8月16日，1965年）：18，19-21.
52 同上注，（5月16日，1965年）：9-10.

秧苗。同学们对她开了批判会。在批判会上，她小声地试图解释："我并不是有意的。我只是一下子不小心而已....."其他一些同学一下子被激怒了，反驳她说"你为什么不注意呢？你杀了一排同一战壕的战友！"有人说"你犯了罪！你的锄头沾满了我们战友的鲜血！"等等，等等，这位女同学难过得两天吃不下饭，对着那些已经干枯的秧苗痛哭流涕反复地说："我并不是有意的，请原谅我。我并不是有意的，请原谅我..."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事实上，阶级斗争理论的扩大化和绝对化在当时的晚些时候被共产党批评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误。[53] 当时所有的生产品被称为"斗争产品"。这样，加上了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就被称为"三大革命活动"的成果。这样的直接后果是，阶级斗争理论强化的同时变成了对生产发展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也是科学实验的一种真正的促进。

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强化，为引用和应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所有反对新技术的人都将面对严重的政治责任，他们可能被指责为反对"革命活动"。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强化的同时，促进和提高了熟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很明显的，长期以来科学技术领域是由资产阶级所占领。[54] 因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成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了对革命青年的要求。1965年共青团中央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所有的共青团支部组织或成立科学实验小组。由于这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因而像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大量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正如《中国青年》杂志上大量报道的有关这一类的实验报告所表明的一样。

阶级斗争理论在加强集体经济和支持独立经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需要在这作更详细的讨论。在加强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集体经济完全不可能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分离开来了。任何对集体经济认识上的怀疑和攻击都会被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要使独立自主的政策成功，有效地动员所有的劳动力是关键，这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人民则将在这场世界革命中担负着先驱的任务。一方面由"修正主义"(苏联和其他追随苏联的国家)所包围，另一方面则有

53 同上注。(10月16日,1965年):18-19.
54 同上注。(5月1日,1965年):26.

“帝国主义”（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以她的独立的革命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相当惊人。在1950年到1977年之间，工业生产总产值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13.5，这比在那一阶段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的年增长都高，它的速度比任何国家，在任何可以相比拟的工业化的速度都要快得多。

然而，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的，这些非凡的经济成就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创造，几乎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应该被特别注意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教育，在中国能取得这些辉煌成就，使理想变为现实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系通常带有一种“计划经济”的特色。当然，在集体经济水平上所作的中央规划，是当时这种经济秩序最明显的特点。但中国内部的这种经济动力不是从计划而来的，而是由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理想所提供的动力而来。在那一阶段被强调得最多的不是完成硬性的计划，而是如何激发群众的主动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这种经济为“精神激励”经济。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要说明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起一场思想意识形态革命

到了这里，我已经确定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在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继续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加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都主要是通过思想意识形态的透视来认识的。在这一章里，我最后要讨论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教育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它为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觉悟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的公开讨论中有着与众不同的位置。因为，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主要战场。然而，实际上，集中点几乎全都聚集在意识形态所涉及的方面，因为政治斗争的结果已经被认为是不可动摇了。毕竟，在新近对“右派分子”的进

攻所取得的胜利中，共产党是否仍然对国家持牢固的控制呢？假如国家不是由“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领导，那么谁可以获得这种政治信任呢？无论如何，阶级斗争不是暂时的、现在才被冠上“政治外衣”的。相反，这早已在人们的思想中斗争了很久，特别是在那些年青人的脑子里。

这一时期，共产党意识形态活动的目的是要根本地改变整个民族的基本思想心理状况。这一切努力中最成功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对生命的看法，或者是所谓的“生活的哲学”的出现。一个直接与这一主题有关的问题是所谓的“幸福的标准”，这一问题在当时成了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在这些讨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意义的探讨。因而这场讨论触及到了几乎所有最基本的有关人类生活的问题。

在《中国青年》上对这些有关问题的讨论常用的一种方法是邀请读者对有编辑选出来的问题作评论。一旦最初的评论来稿刊登出来之后，杂志会从那些对此反馈的评论文章中挑选出有针对性地发表，然后，在后来的期刊上再发表针对这些评论所发表的评论。以这种办法，一种连续性的讨论得到鼓励和扶持。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充满了杂志的每一版。随着时间的过去，有关这些讨论的调子变得前所未有的非常激进。在这一戏剧性变化背后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与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和教育分不开的。

1959年《中国青年》讨论的问题是：人生活中最幸福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是由我们上面提到的对向秀丽的英雄事迹的讨论引起的。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曾经有人说生活的意义是为人民服务。因而，“生活中最幸福的事情”可以从使别人幸福的行动中找到。

一位姓王的读者对这种看法提出异议。他争论说，假如一个人想帮助别人，那么他自己就会有诸多不便。这并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自我牺牲。他同时怀疑是否值得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或是减少它们的财产损失，因为属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这位姓王的读者的观点很明显反映了很多人心里的共同情感。在他争论的背后是一种希望寻找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在人生中的位置的尝试。这或许是一般人对生活的最基本的态度。与这两个人性的基本原则相反，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随着改变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的全面进行，人民力图忘却他们的基本要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像这一类关键性的讨论已经由阶级斗争理论提出来了。

姓王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的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编辑收到不下六千多封的读者来信。登载在《中国青年》上的大部分反映文章，对王的观点持相反意见。很多全国著名的英雄人物也参加到这场讨论中，他们介绍他们自己是如何忘我献身给集体利益。一个名叫徐学惠的银行出纳员在与抢劫银行的匪徒的搏斗中失去了双手。一个军用工厂的工人在试制部队急需的炸弹时失去了他的手、脚和眼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狼牙山五壮士为了不被日本军队活捉，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据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应该是“无条件的”。

尽管这些反映信件五花八门，通过细心阅读，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占上风的讨论实际上还是共同利益的原则。这些讨论的中心围绕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在这里，集体利益的定义是个人利益的组合：“集体利益最集中代表了个人利益，”和“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是这一主题里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换一句话来讲，为集体利益所作的努力从长远来说对个人利益也有好处。例如，假如一个人因为帮助病人而得了病的话，那么他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55] 这样，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基本原则也没有被违反。

尽管共同利益的原则从来都没有完全消失，但与此有关的来信来稿的调子已经开始改变了。在1960年《中国青年》杂志上有两个问题被提了出来进行讨论。第一个是关于理想生活的本质，这是由一个女干部提出来的，她表达了她希望有一种平和的家庭生活。第二个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艰苦工作的精神。一位读者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这么伟大的成就，人们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再提艰苦工作的精神。

正如预料的，这些观点受到读者们广泛的批评。但是，所有这些批评的出发点却各有所异。更多的分量现在是放在高尚的革命理想，而不是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上强化个人利益。尽管这一变化还不是很清晰，因为这种革命理想最终还是被解释为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在最后的分析里，同时还包括个人利益，虽然如此，这样的变化还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共同利益的原则正在悄悄地被革命的原则所取代。

应该被更进一步注意的是这一改变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强化有着非常紧密地联

55 同上注，269(11月1日,1959年):2-4.

系。现在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再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本身，这个问题现在被认为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假如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这就简单意味着他侵犯了别人的利益，这同时也是这个人反对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号。以个人利益为标准的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56] 抛弃艰苦朴素的精神将会导致失去很不容易才赢得的革命成果。通过提倡和发扬革命理想的原则，阶级斗争理论根本地改变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这一变化在1963年，当什么是幸福的标准在“学雷锋”运动中被重新提出来进行讨论时发展得更远了，当时的这一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讨论主要集中在“吃得好，穿得好和住得好”是否就是幸福。在这个问题里关键需要解决的是：谁是这“三种需要”的对象？假如这个对象是个人，那么这样的理解就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命哲学。”另一方面，假如这“三种需要”的对象是占多数的人民群众，那么这就反映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什么是幸福的意义的理解。“我们的幸福属于成千上万的人民的幸福”，正如一位《中国青年》的投稿者所提出的。这一讨论的关键集中在个人利益不再由追求集体目标得到升华，实际上，已经有其他人的利益或者说是公众利益所取代了。简而言之，个人利益的原则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另一种新的原则出现了。这就是追求道德上的纯洁，或者是追求一种“革命的意志”。在这一原则影响下，特定范围内的自我牺牲，被证明不仅仅可以为别人带来物质享受，但同时也对自己有好处。因为锻炼一个人的革命意志，是继续和深入进行由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的一个关键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阶级斗争理论在思想意识形态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思想意识形态里的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把意识形态问题推到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上来。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因而变成了这一问题的性质。遵循精神道德原则不是因为这一原则能产生的好处，而是为了精神道德自身的圆满。这一重心转移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有关的讨论。幸福的标准现在被解释为奋斗过程本身。正是这种奋斗过程，而不仅是奋斗带来的成就，成为了幸福的来源。“为革命而吃苦”，这是当时一条非常流行的口号，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感觉。由此而带来的，是对物质享受

56 同上注。280(4月16日,1960年):13.

原则的否定。

这种新的趋势在1964年《中国青年》杂志上大量的关于如何评价青年人的理想和贡献的讨论篇章中可以看到。在这一讨论过程中，青年人被规劝放弃所有的个人利益、愿望、甚至要求，去迎合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动机变成了唯一的标准，这一标准是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和品格的标尺。这种观点为什么会形成，以及如何形成，是1965年《中国青年》期刊上的这一讨论的主题。

两位读者对以革命为中心提出了异议，他们提出，一个人假如为了生计而努力工作与其他人为革命而努力工作是没有两样的，因为这两者都要求他去做同样的工作和获得同样的报酬。由此引起的反映认为，这里面有真正的不同，只有为革命奋斗到底而工作，这个人才可以把工作真正做好。更为重要的是，做好工作的意义超出了由那些工作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和那些工作所能提供的服务。不管一个人的工作是如何的平凡或琐碎，假如他能正确地完成，这就是革命的一部分。此外，这不仅与“整个生产队，整个公社和整个中国[57]”有关，同时还与“世界上三分之二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有关。当时的一个口号对此反映得很清楚，“多生产一粒粮食，就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多提供一颗子弹”。革命原则得到了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可以从一系列包括“为革命而工作，以革命的精神来工作”为题的讨论中得到证明。

这一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一种勇敢的尝试，它打破了在人类社会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的最基本的对生活的态度。尽管这一尝试的影响也许是有限的（我确信这是真实的），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却是最基本的。尽管在这一讨论中很多争论可能听起来怪异和牵强附会，但他们向传统思想的挑战确实很真实。这种尝试或许没有在本质上改变人们的思想，但它确实激励了人们去思考他们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革命的原则或许没有革他们的精神思想的命，但是无庸置疑地扩展了他们的思想范围。这场讨论也许没有对生活的意义提供满意的答案，但他们明显地发起了一场新的寻找这些答案的探索。这里的历史意义是，作为由政府发起的这样一场极为重要的尝试，得到了一般人民的积极反应，改变人民对生活基本态度的尝试发出了第一道震撼成千上万人精神思想的冲击波，特别是他们中间最活跃的那一部分人。正是在这一上下求索的过程中，而不是在要寻找

57 同上注，（3月16日，1965年）：4-7.

的答案里，革命的含义被发现了。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进行思考有关这一类基本问题。巨人的步伐就这样在这一转变中迈出去了。

伴随着这场重要的尝试并把它推到更高的层次的是一场称为“掌握辩证法”的特别号召。这是在当时思想意识形态转化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努力。这一努力的目的是要改变人们思考的基本方式。在这一动员号召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要求。

“掌握辩证法”的号召长期以来是更为普遍的对理论学习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它在1964年批判号称“合二为一”的辩论中获得首席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反的观点，所谓“一分为二”的观点，当时被认为是“革命的辩证法”的要点。1965年随着毛泽东关于认真总结经验的重要性的最新指示的发表，和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所作的演讲被全国性地推广，这一概念获得了全国范围的重视。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有关这一主题的一系列文章在“掌握辩证法”的红字标题下，全面覆盖了杂志的主要篇幅。

在《中国青年》那些期刊上，关于辩证法的讨论是相当简单，在这些讨论中应用的有关例子也相当幼稚。关键的概念“一分为二”，来自于黑格尔对立统一法则，用一种最简单和单纯的形式来解释。几个观点都是起源于这一最基本的概念。

首先，事物和事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这是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从自身分解成它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又可以再分解，这些分解可以不断地分解下去。这样的分解可以无穷尽地分解下去，对事物的这一特性缺乏足够的重视被认为是严重的错误。

例如，一位部队的政委表扬一个老战士的同时忽视了一个新兵。他赞扬的行为根据是这两个人在射击的各自不同技术。然而，这个政委没有重视战士的政治动机，因而他受到了严重的批评。这样，尽管这位老战士在射击训练中取得最高的得分，但他的动机被认为是有问题。相比之下，这个新战士在射击训练中的成绩却很不好，但是他们发现他非常执著要求自己有“正确的思想”而且他的射击训练成绩正在进步。因而只表扬这位老战士而没有提这个新战士，这位部队政委犯了一个“片面性”的错误。

第二，事物和事件都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由不同的要素和成份组成的。因而全面地、彻底地观察问题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例如，在一家商店里，一位很优

秀的女售货员受到一位顾客的批评。她的同事们心存芥蒂地怀疑，到底是什么人会对她的服务不满意。通过长期的观察，一个干部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原来这位女售货员在很多人排队等候的时候会变得不够耐心和有些简单，因为她担心她在一个顾客的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其他的客人了。[58] 在另一个例子里，一位环卫工人把他刚刚学到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理论应用到他的工作实践中，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环卫工作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他的发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功。[59]

第三，事物和事件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这是毛泽东关于认真总结经验指示的主要观点。毛泽东认为人类和自然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总是停留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因此，人们也必须不断地总结他们的经验，努力去发明和创造，才可以不断地进步和发展。[60]

第四，既然事物和事件是复杂的，又是有联系的和不断地在变化和发展的，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意识到坏事也有它好的一方面，同样好事也有它不足的一方面。例如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一方面，一个农村共青团支部在比其他团支部都缺乏经验、缺乏骨干的情况下仍然把团支部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另一方面，另一个曾经因为他们出色的团支部工作获得高度的赞扬，并被树立为全国的榜样的团支部，却不能在问题发生之前就预见到问题发生的可能性。[61] 这两个不同的团支部的成功经验反映了他们对“辩证法”的不同的理解。

第五，虽然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有这么多因素参杂互相联系在一起，找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用“矛盾的原理”来解决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这被认为是基本的工作方法。一个高效率的列车乘务员服务小组声称他们的成功是由于应用了这一思想观念。[62]

最后，力量放得最多、最强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主动性。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意味着可以通过革命斗争的手段来加速事物和事件的转化。这正是掌握辩证法的最终目的。这一类的行动可以有多种形式，正如《中国青年》杂志上所报道的。例如，河

---

58 同上注。219(11月16日，19日，1965年):11-13.
59 同上注。215(4月1日,1959年):35-39.
60 同上注。274(1月16日,19日，1965年):30.
61 同上注。(11月1日,1964年):22.
62 同上注。(10月16日,1965年):10-13.

南省一个村子里的群众采用了很多种不同的办法来挽救因为坏天气遭到损害的庄稼，他们声称是因为他们运用了辩证法才使他们的努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作为改变人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的努力，号召人们去掌握辩证法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显示了他们在方法使用上的聪明才智，或是他们理论上的诡辩才能。明显的，方法的介绍很简单，对他们的运用也接近原始。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革命的变化是将“辩证的方法”运用到他们的生活里，很多人都努力在他们行动之前进行认真地思考。这意味着他们不再简单地随大流像他们的祖先一贯所遵循的，或模仿当时现有的形式和方法。他们希望先以一种新的体系来调查和考察，这种愿望反映人们思考行动方式的一种重大的改变。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在决定行动的过程中都努力用“理性”来思考而不是仅仅依赖传统和习惯。被共产党大力推崇的“推理论证”，及一般人对它的广泛运用显然对旧的思维方式有一个很大的改进，至于这一推理与哲学家对“辩证法”的哲学理解之间有多大联系，在这里只能放在第二位了。在“掌握辩证法”的名义之下，一般的中国人开始努力根据“合理的”原则来生活。这场运动的重要性决不低于一场革命。

从这一曙光中我们终于可以发现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真正意义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历史作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是伴随着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运动一起而来。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在这里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要改变群众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使他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不思考的状况），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作为一个像上帝或者是像皇帝一样的化身，毛泽东的偶像完全符合这样一种需要。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被学毛著运动推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渐高涨，阶级斗争的教化也达到了顶峰。在这里，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者可以说是互相推波逐涛，相互起作用。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对精神支持提出了一种急迫需要，而对毛泽东的神化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力的支持。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被非常强调的两个要点，在推广和加强对毛泽东神化的效果起了重要作用。第一点是宣称“阶级性质”的根据。毛泽东的著作被认为是为“被奴役和被剥削的阶级”所写，这一阶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群。此外，因为这一部分人属于革命的阶级，他们代表着社会中最有活力和最先进的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著作对阶级

性质的强调给予了这一部分人极大的荣誉。他们的特殊地位随着毛泽东被进一步神化而持续上涨，最后达到这样一个地位，他们是一类“被特别挑选的人”注定要到共产主义的天堂。

作为被特别挑选的人，这种感觉对数以万计曾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提供了一种很重要的精神来源。这极大地激励了这一大群人的自信心和集体雄心。这一切不仅因为他们特别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还因为这是毛主席所说。因此，毛泽东的偶像化直接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自信心联系起来。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他们自己的自信心的强化。

但是作为被特别挑选的人的这种感觉不仅仅提供了荣誉。它同时改善了社会对这一阶层的期待和要求。作为“革命阶级”的一分子，这一部分人被期待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假如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被认为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配。因为他们相信毛选是为他们而写的，因而他们有义务认真学习毛选。既然毛主席的教导代表了他们最大的利益，因而他们注定要遵循他的指示了。这就变成了对任何一个要求成为革命者的人的一条最基本的要求。这一观点在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几乎随处可见。

另一点在群众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中被高度强调的是活学活用。用另一句话来说，毛泽东的著作已经被看作是超出了一般的纯学术范围著述。实际上，它最伟大的意义是提出了如何把他们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一重点有双重重要含义。首先，通过把理论变为实践，为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教育程度的高低，都打开了学习的大门。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直接行动，而不是那种故弄玄虚的讨论，因而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更进一步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模范人物都是普通人，而不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中有一些还是文盲。当时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来鼓励和帮助这些人参加学习。

第二，通过强调实践的最后结果，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群众运动同时成为了一场范围广泛的革命运动。这是因为到最后，所学的东西必须由行动和实践来检验。这必须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中有所体验。简单来说，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群众运动，体现了通过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和强化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这一宏伟计划发展到了顶峰。

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样极大程度地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任何更强大的力量，可以与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与毛泽东的神圣地位相比，因为共产党的绝对正确领导由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提供了全面的保证。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因而也变成了共产党的权威。事实上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期间，共产党的绝对权威没有被触动过。

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还对社会的改革起了广泛的作用。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毫无疑问地用来反对旧的宗教信仰、旧的文化和旧的习惯势力。普及教育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名义下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据报道在1960年有不下三千五百万年青人参加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在一个村子里，除了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之外，全村155个年轻人都被组织起来参加了学习小组。这些数字同时也显露了社会动员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努力之下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是“四个第一”。这些所谓的“四个第一”的要旨是从个人为基础开始社会的总动员。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这场运动无疑是对新的职业道德的最大的支持。正如一位年轻妇女谈到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63] 例如，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之后，一个共青团支部的年青人打破了传统的习俗，在严寒冬天里也工作。他们成功地制成了泥砖，还收集了2.1万斤肥料。[64] 这场运动确实也同样巨大地鼓励了群众性的创造热情。例如，在一家工厂里的一群年轻人，在既缺少材料，又缺少设计蓝图的条件下，在短短八天的时间内成功地造出了一台拖拉机。[65]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动了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到了它的顶峰。随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逐步升级，追求精神上的纯洁披上了一层宗教色彩的外衣。最典型的一种方式是自我检查。真心实意地承认一个人的错误和它的来源，被认为是这个人完成头脑里的思想革命的第一步。人们被鼓励公开承认或坦白他们潜藏深处的思想和想法。当时大家都相信，只有通过揭露个人的“坏思想”，他或她才可以摆脱或去掉这些坏思想。人们不仅被要求或怂恿坦白他们有意识的想法，同时他们还应该检讨他们下意识的

---

63 同上注。(2月1日,1965年):31-32.
64 同上注。(1月16日,1965年):12-13.
65 同上注。277(3月1日,1960年):22-29.

念头和感觉，这被称之为“狠斗私心一闪念”。正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说的，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在每个人的灵魂里进行一场革命”。

在西方，毛泽东时期中国的那种“洗脑”导致了最普遍最严厉的谴责。我不反对把“洗脑”这一名词用于干预政府部门，动员人们参加通过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改变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过程中某些强迫性的学习方面。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绝对不是无代价的、自由的智力冒险。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这一章里要讨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正如我反复指出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特别的功能是聚集起政治力量，从而把他运用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使得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特别的有效。贯穿这一章，我所支持和赞成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力量本身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过程中得到大大地增强。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政治权力里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高压政治和谎言（如很多人都相信的）仅仅是这种强化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而不是这场运动的本质。方法和手段不能用来作为评价历史事件的主要标准。正如没有人会批评一个牙科医生使用力量还是使用麻醉剂来给一个孩子拔牙一样，尽管这孩子老大的不愿意。正如我们对其他所有的历史事件的评价一样，对这场运动的最后评价必须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我认为这里主要牵涉到的是人们想要努力摆脱和去掉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和他们渴望的思想精神改变是什么样的一种趋势。正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我要论证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对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因为这使他们从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而中国的传统势力是众所周知的非常根深蒂固。这一思想解放在推动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去除了很多旧的风俗习惯。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过程经常是从完全不思考到认真思考的飞跃，从迷信到理性的飞跃，或者更简单的从文盲到有文化的飞跃。当然，这都反映了他们个人思想的伟大解放。

到了这里，有一点很明显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只是对一部分人而言。它特别解放了那一部分曾经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那部分在旧社会的阴影笼罩下的人，和那些没有或者是教育程度很低的人。这同时也意味着对那些有个人思想、独立精神和那些久经世故头脑的压抑。正如我们在《中国青年》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的，这

一部分人的观点和思想受到严肃批评和政治迫害的制约。这一点或许在反右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很多诚实正直的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被残酷地镇压。

但这也同样是事实，思想意识形态的教化运动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精神祝福。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们不再为自己卑贱的家庭背景而难为情。相反，他们可以因为属于“最先进的社会力量”而感到骄傲。很多人相信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他们甚至着魔似的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人民因而肩负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人类”的神圣使命。

当然，所有这些口号和标志，事实上都只有很小的意义。这里只有很小一点可靠的基础，可以给这一阶层的成员提供他们是“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的根据；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国家的主人”；把他们作为世界革命的传播者，也只不过是一些花言巧语。除此之外，相信他们自己，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因为他们的信仰和情感都是真实的。正好是这种事实和信仰的不一致，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强大的动力。因为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强化教育所造成的特别深远的意义。这一影响是这么的巨大，以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在那混乱的年代里得到拥护和支持的东西都被重新审判，其中阶级斗争理论的很多方面仍然继续被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得以重提。

然而，这种强化教育很明显的存在，形式与它所宣称的思想解放功能的不相符。这不仅仅是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没有讨论自由，同时毛泽东的话变成了人们寻找真理的结果。人民是不同层次的共产党组织严格控制的对象，这样使得他们假定的思想解放者实际上是他们的压迫者。所有这些都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需要改变和造反的对象。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早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意识形态再定位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像摩尼教的教义一样，在好和坏，美德和邪恶之间划一道清楚的界限。一方面是由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出身“好”的人，紧紧跟随党的方针路线的政治积极分子，和不问报酬努力工作的人。这些人支持社会主义，他们所支持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结合。他们相信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是非常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残留下来的旧的有产阶级，显示异端政治思想的人，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这些人被认为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所支持的资本主义主要是由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组成的制度。他们同时也被认为是反对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在流行的思潮里，阶级的概念与一种有形属性的综合物联系起来了。

在这些有形属性里最重要的标准是共产党，党被认为是社会中最先进的成分，道德规范和真理的政治化身。因而，最简单和最可靠地获得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实用指南是遵循或执行共产党的指示。一句忠告人们的流行口号叫“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党指到哪就到哪”。因此，精神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被大力提倡，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人们超越他们的自私自利，在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党和各个不同层次的共产党干部面前，人们变得更加谦虚和卑下。

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这是不可能有任何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产生的，更不用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规模地攻击共产党干部的群众运动了。打开这一死结的唯一办法是来自于人民所服从的权威人士的号召，号召人们起来造权威的反。有讽刺性的是，这恰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所出现的现象。在那一阶段，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人民批评党组织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正是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炮打司令部”。这是最权威的官方思想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号召人民独立思

考。正是这一系列的行动，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们，把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地分化了。正是这一系列的行动，他们开始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再定位。

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在文化大革命最初阶段思想意识形态再定位的过程。我将记载一场学术讨论变成一场政治辩论的过程。当毛泽东主义者把阶级斗争理论带进这场讨论，这场讨论如何变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当官方宣传机构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权威和他的思想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区别时，这场运动又是如何引起革命的剧变；当旧的群众路线在党的新文件上被重新定义时，这场革命是如何演变成一种民主的进程；共产党把革命从文化圈子扩大到社会的其他部门的决定是如何为一般人参与政治打开大门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再定位把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推到它的顶峰的同时也把它推向了瓦解。

从一场学术讨论到一场政治辩论

官方与非官方的说法，都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5年十一月，以上海的一位文学艺术批评家——姚文元所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为标志。无论他的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姚文元的文章确实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同时还标志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解释。

正如我在上一章里已经讨论过的，文化大革命以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在中国年青人中间急需的所谓“阶级斗争教育”。这是在假设国家仍然处于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革命事业还相当安全的前提底下。危险将来自于那些后辈们，他们或许受旧社会残余的影响，受帝国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者”的毒害。因而，这就变得非常重要，把阶级斗争引向一个新的方向——思想意识形态的前线，以此来减少和消除所有这一类的不良影响，把中国的年青一代培养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一方面，姚文元的文章继续了这种努力。文化大革命之前曾经有过一场范围很广的关于历史、哲学、道德规范、经济学、文学和艺术的严肃讨论。在这些讨论中的一个普遍主题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概念，

应用到不同的理论学科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讨论实际上受到重视和被公开提倡。它的目的是要改变过去遗留下来的旧思想。因而这些讨论的焦点还是在理论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讨论被认为是学术性的。姚文元的文章是这些学术讨论中的一部分。他文章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集中在批评吴晗的“阶级调和理论”，这是自1962年以来一直很热门的争论主题。

然而，另一方面，姚文元的文章打开了在这些讨论中的一个新的领域。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关于这一剧作的“现实主义含义”。通过提出这个问题，作者把真正的政治引进到了学术讨论中。这一历史剧就这样承受了当时事件的责任，戏剧人物代表了当代社会里的真实人物。这一变化根本性地改变了整个讨论的性质。作者是这样表述的：

> 大家知道，1961 年正是我们的国家因为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正是这一类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这些辩论中，阶级斗争不仅仅以思想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同时还以政治的形态正式出现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以思想意识形态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它的意识形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介入了当时的政治。学术讨论因而变成了政治运动。

姚文元的文章所打开的这一片新的天地在当时已经被广泛注意和讨论，但它所能从其中得到的最大支持和发展的恐怕只有两篇在1966年4月发表的重要文章，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与林杰写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些文章坚决否认了当时的讨论是纯粹的

学术讨论。正如戚本禹质疑的：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京剧《海瑞罢官》采用了“以古非今”和“指桑骂槐”的手法，难道这是学术问题吗？这株大毒草以仅有的一点历史事实，创造的舞台人物和台词都是根据真正的人物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形象造出来的，这怎么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看待呢？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1]

因而，戚本禹把“罢官”作为吴晗的剧作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要点，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正好也是关锋与林杰在他们的文章反复强调的。他们指出把政治问题变成学术问题正是作者隐藏他对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的本质的一种手法。作者争辩说，事实上，吴晗以他的戏剧艺术所表现的内涵，已经超出了集中在历史理论的错误上，他并不是要写历史，他要写的是当时的政治。关锋与林杰也提出：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际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当人民日报评论员以“什么是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为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之后，围绕着吴晗的作品所影射的政治问题就很清晰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2]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北京的一份主要报纸，《北京日报》，被谴责试图掩盖当时对吴晗

---

1 《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2 见默尔·高曼（Merle Goldman），“1961-62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特点”"The Uniqu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of 1961-62," 在约翰·威尔逊·路易斯（John Wilson Lewis），编，《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与革命的动力》*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68-303；同见，默尔·高曼（Merle Goldman），“1962-64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文化革命’”"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62-64"在朝马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编，《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在当代中国》*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219-254.

和他同伙的批判讨论，或者说是对“三家村”的批判。《北京日报》被指责玩弄手段，“批评为名，保护为实”，“试图把这场辩论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题下，《解放军报》加版的副刊上，很明确地指出了“当前以文化和学术讨论形式出现的辩论不仅仅是关于几篇文章，戏剧和电影，或者是学术问题，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随着对《北京日报》的批评和指责，以及“三家村”的公开曝光，对公众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因为被攻击的人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反，他们都是在党内主管思想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场新的对党进攻里，吴晗只是一个从属的人物。反党集团的头目是邓拓，前《人民日报》的主编和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另一个是廖沫沙，他负责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的文化工作。在这以前，这些人都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的左派反对右派；但现在他们自己反而成为了斗争的对象。

更为重要的是，大概一个月之后这种形式的讨论被写进了党的文件，由姚文元的文章所开始的这一新的领域里的辩论，被确定为这将是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方向。这就是标题为“五•一六通知”的中央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把中共北京市长和党委书记彭真，作为搅乱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的样板揪了出来，同时否定了他的“二月提纲”。当时所罗列出来的对他的指责，主要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有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并试图把这些讨论限制在“不同的学术流派和理论问题”的范围内。这份文件还号召全党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抓住伸进文艺界的黑手。“五.一六通知”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全党必须在批判和声讨那些钻进了共产党里、政府机关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同时，要把他们清除出去或者把他们转移到别的位置。首先，我们不能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任交给这样的人。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把持着领导地位，而这是最危险的。[3]

“五•一六通知”晚些时候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文件”。它主要的贡献是开了把政治标准用到学术讨论里来的先河，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场运动的方向。尽管这份文件一年以后才发表，但它的精神已经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以“横扫一切牛鬼

3 《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蛇神”[4] 为标题的社论上显露无遗了。就这样，这场“文化”革命发展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它要反对的是那些“混进了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此之前的理论重心，如默尔·高曼（ Merle Goldman）描述的只有“一点点…….人身攻击”，而现在被政治上的指控所取代了，学术讨论被人身攻击代替了。例如，吴晗不仅仅因为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受到批判，同时还连带上了他所写的一些文章也受到了攻击。他被定性为反对人民共和国基础的反动分子。[5] 他的全家被公开攻击为反革命分子：他的祖父据说是十九世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他的父亲是一个反动的警察官员，他的母亲是一个仇恨共产党的地主婆。[6]

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从思想意识形态战线转移到政治战线是形成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第一步。人们不再认为阶级斗争如他们在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所认识的，主要是精神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相反，人民被要求以真正的政治观点去看待阶级斗争。因而，在人民的心目中阶级斗争从一种抽象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实体，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看不见到看得见。这种变化大大地强化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唤醒了人民对共产党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心。

当这些学术讨论的性质部分被否认的时候，新的政治上的上纲上线立即对过去所有的理论讨论作出了结论。例如，面对着严重的政治批评，吴晗立即公开检讨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理解上的错误，他说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通过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概念，如“道德继承的理论”或者“‘清官’的理论”。郭沫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要求烧掉所有他自己的作品，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且“有时候阶级斗争的观念很模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曾经对所谓的六大“黑色理论”宣判死刑，这六条“黑色理论”是“写实的理论”，“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理论”，“深化现实主义的理论”，“反对主观主义的理论”，“反对激进主义的理论”，和“与时代

4 从1966年不同的报刊杂志上精选了部分文章的标题，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辩论的新转折。例如：
“‘海瑞罢官’替谁唱赞歌？”《北京日报》1966年1月18日
“吴晗同志在替谁说话？”《辽宁日报》1966年3月10日
“‘海瑞罢官’真正在宣扬什么？”《云南日报》1966年2月22日
“为什么要赞扬‘海瑞骂皇帝’？”《北京日报》1966年1月11日
“是什么原因吴晗同志‘打开门跳出来’？”《光明日报》1966年1月19日
“不能用自我检讨来开脱政治责任”《光明日报》1966年1月13日
“不可隐瞒的反革命政治动机”《福建日报》1966年2 月27 日
“‘海瑞’是吴晗同志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光明日报》1966年1月29日
“‘海瑞罢官’散布反社会主义的毒素”《工人日报》1966年3月18日
“制造历史神话来反对当前的形势”《文艺？报》1966年 第一期
“难道这仅仅是学术讨论吗？”《文汇报》1966年3月1日。
5 《人民日报》，1966年4月2日.
6 同上注。1966年4月5日.

精神结合的理论”。她甚至利用这个机会大肆鼓吹她对发生在三十年代的关于“国防文学”和“革命文学”讨论的观点。

毛泽东逝世之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方向，被描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简单化”和“绝对化”。这种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适当的，因为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辩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然后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套这些已经简化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形成了对所有社会现象都从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种专有概念去透视的趋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简单化”和“绝对化”都是旧阶级斗争理论。新的辩论把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当作一种清晰的好和坏、黑和白这样的摩尼教概念，并且把这种理解推到了极端。由于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一种保守的指导思想，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中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它已经孕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它与真正的政治已经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同时它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所有中国人的头脑中，正如我在第二章里所记录的。在这一时期，旧阶级斗争理论被通译为这样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以至于党的领导干部中也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可以逃脱“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责难，更不用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因而，阶级斗争理论的“简单化”和“绝对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很快被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于攻击任何他们想要攻击的实质目标。

这一发展的直接后果是使学术讨论的大门现在向一般的普通人敞开了。有了这种简单化和抽象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就很清楚了。在当时要参加这样的辩论，他或她不需要一个复杂思辨的头脑，他只需要有强硬的政治立场。辩论被谴责和定罪所取代，理智被狂热所代替，理论被换上了口号。正如我们可以从官方宣传材料中看到的，大量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卷入了这些辩论中。当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注意力从思想意识形态的形式转变为政治的形式，这些学术讨论就演变成了发展成熟的政治运动。这标志着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全面胜利，但与此同时，这也是第一次由阶级斗争理论把阶级斗争带进了共产党内部，造成了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党组织的分离。

尽管这场运动的规模相当壮观，但这一阶段的运动还基本上是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在共产党各级领导的严密控制之下。在北京开始批判“三家村”之后，全国各地其他地方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揪出来进行

批判。很多电影，戏剧，书籍和文章都被宣布为“毒草”对这么多的共产党干部和文学作品的公开批判，无疑极大地加强了已经是非常浓烈的政治气氛。不过，当时的运动还是远离一般的人民群众，因为当时的斗争对象都是由中央政治局从不同等级，不同层次挑出来的。正如以前的政治运动，一般群众可以期盼，或者说希望做的只是表示他们对共产党所作决定的热情。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的运动都是由中央政权直接从上到下通过共产党的层层机构控制，或者用迟些时候人们描述的“由上到下”的政治运动。

这样的一种政治模式很快被毛泽东主义者的戏剧性行动所打破。这是由1966年6月1日晚上北京大学贴出来的一张大字报开始的，这张大字报是由聂元梓和其它六个北大学生写的。在这张大字报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师聂元梓，和她的同事与学生，公开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北京市党委主管教育的两个领导提出质疑和攻击。这三个人在这张大字报公开广播三天之后从他们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7]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开了群众从基层对不同等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发动攻击的先例。这一先例打破了共产党中国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政治模式。它的重要意义是，这一开历史先河的事件得到很多人的承认，因而很快变成了一种公认的真正群众运动的标准，这种群众运动必须是“从下到上”发动的。不然的话，就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仅仅是“利用群众的运动”了。

毛泽东主义者表示的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支持不仅仅是通过向全国广播，更为显著的，他们证明了这张大字报符合基本的政治原理，而这种基本原理是所有的革命者都能注意到的。要拥护和支持这种基本原理，他们必须公开地向旧的政治模式挑战。当时对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反击文章象冰雹一样铺天盖地。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一篇文章这样称赞北京大学的大字报：

>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共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的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要起来

7 同上注。1966年4月2日.

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声明。因为这不仅打破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同时极大地震动了共产党的那种神圣的、团结的、不可动摇的形象。虽然慎重地来看，以上的声明把单独的党组织机构和个别党员从共产党分离开来，把党支部从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分离开来，甚至含蓄地把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离开来。这些划分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党分成支离破碎的独立组织机构了。这一声明的作用还在于它使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机构丧失了共产党组织神圣和严密光环的保护。共产党的形象现在变成了由不同成员组成的机构，这些成员不再是与阶级斗争的对象无关的人物了。阶级敌人已经形成了“阴谋集团”和“阴谋组织”。这些人和他们的组织因而应该成为广大群众怀疑，批判，和攻击的对象。

这些暗示在两个月之后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里被重提，并且在编者按里重新加了一个关键的字和一整句话，使这些暗示进一步被强化和明朗化。新版的编者按里（新加的字和词用加底线的方式列出）：

>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u>正确</u>领导。所有危机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领导都应该被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8]

加上了“正确”这样的形容词在“党中央的领导”之前，新版的评论员文章暗示了领导阶层也可能是错误的。此外，新加的句子发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那就是人们可以反对“所有错误的领导”。这正是一些造反的学生从这一不寻常的改变中接收到的信息。例如，仅仅在这新版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几天之后，北京航空学院的一群学生写了一张强调这一变化的很有影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强调从这些变化里，人们可以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内部，从地方党组织到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大字报是这样说的：

> 我们相信，以上这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告诉我们，两条路线和两个领导阵营的斗争不仅仅长期存在于北京，存在于北京大学，存在于北京航空学院，同时还存在于……地方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可查阅《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一期社论）

---

8 关锋和林杰，《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红旗》1966年四月15日，2-10。

当然，像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学生这种迅速的，敏感的反应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它的作者使他们的组织——红旗战斗队成为了全国最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然而，北航学生的反应也表明了当时的学生们是如何仔细地研读党的宣传文件，是如何紧跟中央的调子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行动。

与共产党的旧的组织原则相反，《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它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最高指示”。在这里，“最高的”这样的形容词是谁都可以注意到的。毛泽东思想不仅被提到远高于其它不同理论学派之上，同时还高于国家的宪法和章程，政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方针，除此之外，它还高于某些特别的党纪和党的一般决策。就这样，这篇评论员文章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组织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分开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革命原则，毛泽东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是以共产党的权威作为代价而取得的。通过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地位，这一原则不仅实际上把人们从共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一张通行证去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在这里，最关键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本身，而是群众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所作出的判断。这样一来，只能由群众根据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对所有的人和事作出对或者是错的决定。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不仅以毛泽东思想为依据，同时也以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历对自己的思想重新定位。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北京大学大字报的革命含义可以被得到证实，不管它的事实是什么。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张大字报并不是如我们过去所相信的，由群众自发写成。事实上，这张大字报是直接由康生，当时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同事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策划促成的。北京市党委书记的命运在北京大学大字报发表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可是，一般人只能从这一事件里获得的信息，是他们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积极起来进行革命行动。在此之前，这可能只是要求人民服从和遵循共产党干部的指示。现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被用来检查国家和社会里的所有问题，包括共产党的干部和共产党组织。

这些信息和意图被当时的人很好地接收了。例如，北京大学大字报出现之后的两天之

内，在北京商学院，不下七百多张矛头对准当时学院党委的大字报出现在校园之内。相同的事件也发生在北京水利电力学院。在武汉，有一句口号在中南科技学院被广为传播的是："在北京大学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在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些事情也是不能公开的"。一张批评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六月二日出现在武汉地质学院。6月9日，武汉市第二中学出现了一张以"炮轰党支部[学校的党支部]"为醒目标题的大字报。在哈尔滨，学生们公开宣称，"我们实在不能信任学校的领导．．．我们只能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广州，发生了"北京来信事件"。6月24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刊登了他收到的一封北京来信和他自己写的一封"给学院所有党员学生的一封信"，他的信主张，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有的党组织都可以成为怀疑的对象。事实上6月1日以后，很多学校，特别是在大城市里的学校，正常的秩序已经被完全打乱了。管理学校的行政领导们抱怨说，学生们全都不服管，乱套了。[9] 毛泽东晚些时候声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激起了全国的反应"。[10]

正是因为这些一连串事件，以致很多人认为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出现标志着"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里"真正的"意味着这些学生、老师们感到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而且这场运动的发展将由他们来决定了。现在他们要审核他们学校的政治状况，选择他们的斗争对象。最经常出现的是，当学生和老师中出现不同观点时，他们必须决定要站到哪一边。现在他们争论和辩论的问题不再是遥远和抽象的了，这些主题都是与他们身边的人和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紧密相关。这些辩论通常是直接敌对，和令人心惊胆跳的政治上纲上线。很多人第一次感觉到他们真是要做严肃的政治决定。就这样，阶级斗争变得与很多普通人都切切相关了。

党组织与毛泽东思想的分离根本性地改变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从作为共产党改造社会的方法和手段移位到变成了人民监督和重建国家的工具。因而，毛泽东思想旗帜下阶级斗争的角色，也从由共产党动员的社会改造变成了一场政治革命，这场政治革命由一般群众在控制和掌握社会的重新改造。

因而，对那些愿意积极参加到这场运动中的人来说，毛泽东思想变成了最强大的精神

---

9 《人民日报》，1966年4月5日.
10 同上注，1966年4月8日.

资源。在那一阶段，有不少记载详细记录了人们如何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鼓舞下，敢于站出来反对他们的上级领导。[11] 在这里，意义最重大的不是人们如何运用了毛泽东思想，而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之下，普通人有足够的勇气批评整个现存的制度，并以他们所相信的正义和正确与非正义和非正确作斗争的事实。一种新的精神出现了。这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有些人就公开地提倡“怀疑一切”的口号。[12] 流行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口号现在被抛弃了。[13] 人民提出了一个强烈的要求，“打破精神枷锁”和“埋葬奴隶主义思想”。这种新的精神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动力。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适应并成为了最有效的精神工具，引导着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新解放。

学生们在排除了他们学校领导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之后，也把他们自己从共产党的约束之下解放出来，然而，“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标志，是旧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了它的最后成熟阶段。这恐怕是理解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要素的最重要的方面。这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与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最根本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恰好为很多观察家们所忽略。

尽管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以大规模的批评各阶层党组织和党干部开始，但是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他们批评的性质。与1957年的“右派”不同，当时的“右派”要求共产党下台，放松党的政治控制。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所攻击的各阶层党组织和党干部是因为他们没有竭尽全力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假如我们说：1957年的右派要求共产党转“右”的话，那么1966年的学生们则要求共产党转“左”。学生们攻击学校领导的一个主要题目，是这些领导们没有在学校里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学生们控诉学校领导没有遵循党的阶级路线和政策，没有全面推广党的阶级路线和政策。

关于这一问题对学校领导的共通谴责是，他们歧视出身于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和那些出身于“革命烈士、干部、部队干部”家庭的学生。这种歧视的形式表现在学校招生时强调学习成绩，对出身不好的学生给与特别照顾，甚至迫害出身好的学生。下面

---

11 《解放军报》，1966年5月8日.
12 《光明日报》，1966年5月8日.
13 《解放军报》，1966年5月4日.

摘录的是当时很典型的言论：

资产阶级先生们以一种“权威”的自蒙得意认为，他们的孩子象“完美的瓷器”，哪怕没有任何华丽的图案，看上去也是非常可爱。他们故意诅咒工人和农民的孩子是“粗糙的陶瓷器”，简单地说，他们是不能用任何着色和绘画来变得漂亮的……

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力图用入学考试这把无形的利剑，毫不手软地把劳动人民的子女通向科学文化象牙塔的道路斩断．．．他们已经做得很好地歧视和阻挠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战士的孩子成长。[14]

因而，这一时期学生们造反的主要目的，是把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推到它的极端。清华附中学生们写的三篇著名的文章标志着这种主要意识形态的突破。通过这些文章产生了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造反有理”。这是最早也是最突出的意识形态改变。与此同时，这些文章显示了第一次在全国亮相的“红卫兵”作品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使得这些文章这么著名呢？正是毛泽东对这些文章的个人认可，而他的批注就好像是上帝的祝福。成千上万的学生从这些文章里找到灵感，红卫兵运动因此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到整个中国。

然而，剔开他们好斗的花言巧语，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更合适地说是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趋势所进行的激进表达。这些文章要求学生起来造反的对象不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是应该如何坚持和加强这一意识形态。文章的作者对政府规章制度和共产党政策方针的“软弱”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意。他们提倡一种激进的方法来支持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这正是这三篇文章的实质内容。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不断重复强调的是抨击小心谨慎态度的重要性。第一篇文章说：

因为我们要造反，很多事情就无法控制了！我们要把空气搞得炸药味很浓。把手榴弹捆绑起来扔出去，开始一场大战斗，“同情心”，“全面性”通通让路！

你说我们太片面？你的全面性又是什么呢？你的全面性看来像是“合而为一”的折衷主义。你说我们太傲慢和强硬？我们就是“傲慢和强硬”……你说我们太粗鲁？我们是应该粗鲁。我们怎么可能软弱和依附于修正主义或者以中庸的态度参加这一大规模

14 《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见 *WGZL* 1:1-4.

的运动呢？对敌人的软弱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说我们走得太远？坦白地说，你所谓的“避免走得太远”实际上是改革主义；这是“和平过渡”。你是白日做梦！我们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5]

通过攻击“中庸”之道，这一阶段的造反要求以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更好斗和更具进攻性的形式来执行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这是为什么对党干部、党组织和已经崩溃的学校领导权威的攻击稍后并没有给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右派学生”带来解放，相反的是对他们随意的残酷迫害。

当这种趋势从学校流向社会，它变成了震惊世界的、声名狼藉的“破四旧”运动。道路和地方的名字被改换，抄家破四旧，寺庙和教堂被捣毁，书籍被焚烧，很多人遭毒打。然而，在这些表面上无法无天的行为背后，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趋势。事实上，红卫兵示范了一种特别的高尚道德。通过更进一步的观察，它可以显示破四旧运动其实只是旧阶级斗争理论的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而已。这场运动的先锋部队直接反对的是旧社会的影响和旧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直接的，但又是武力的，继续文化大革命以前共产党所推行的思想政策。

这一事实最明显的显示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它在一幅对联里表达得最清楚不过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上联：基本如此。

对这一理论的极端应用，可以从当时一份专人发送到北京输血中心的“紧急通知”这一事件里看到。这份通知不但禁止黑五类的人接受输血，还禁止他们输血给红五类的人，因为这样的血液交换被认为是“违反党的阶级路线”。

这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血统论”实际上不是血缘家谱理论，因为它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生理上的联系，而是政治上的标签。更好的表述或者是，人们生物学上的这种血缘联系被高度政治化了，通过强调这种血缘联系，实际上极大地加强了它的政治标志。在所有的例子里，鼓吹和推行“血统论”的背后，很明

15　根据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发行的报刊，1966年1月，彭真说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将不在当时的辩论中讨论政治问题。见《新闻战线》1967年6月10日，*RGP*6：1451；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也由于说过北京日报事件不是“政治问题”而受到批判。《红旗报》1967年10月24日，见*RGP*6：1711。

显的是旧阶级斗争理论。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破四旧运动的同时，也是反对贴有不良政治标签的旧文化，旧风俗习惯和人们广义范围内的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很快从批判斗争上升到抄家和流放，受害者被迫从城市里赶出来搬到农村。最后，这些行为导致了肉体上的折磨甚至集体屠杀。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六天之内，一共有325人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和一个只有三十八天大的婴儿。[16]

当“血统论”被用来促进保护共产党的干部时，它给予了这场运动一种精神，虽然很明显的这种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的政治趋势却更进一步显示无遗。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谭力夫讲话”。谭力夫是一个高干子弟，在他的讲话里，他不仅替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公开辩护，他还特别替那些当时受到冲击的共产党干部公开辩护。他争辩说，这些党的干部所犯的错误只不过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而已。以此为基础，他责问造反的学生，“你们为什么对共产党干部犯错误高兴呢？”然后他谴责学生们是“右派造反”。随着他的讲话的出笼，北京西郊新成立的“红纠察”宣布了一道命令“保护老资格革命干部的安全”。它禁止“对主管国家外交事务的党的干部抄家”“特别是截停和检查这些干部的汽车”。[17] 这些保护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条文是这么的详细，以至于连禁止抽烟喝酒都被仔细地列出来，它特别标明禁烟和禁酒对“那些老一辈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外，这道命令还警告说“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一例外给他们抹黑”。[18]

“血统论”的流行以及暴力破四旧运动所表明的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是多么的意义深远。当人们从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下自由解放出来之后，当他们在某些特定范围之内可以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时，他们没有提出新的政治原则，或者要求废除旧的官方意识形态。相反，他们本能地遵循着旧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大行其道，现在又被推到了它的极端。他们当时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而且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由此可见，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多么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头脑里。

---

16 同上注。
17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18 高曼（Goldman），(1973)，229.

群众专政与党的领导

假如以上所描述的情况曾经继续下去的话，文化大革命将只会是另一个更为残酷和恐怖的反右运动而已。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和他最接近的同僚又一次直接干预了这场运动。这次，毛泽东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原理。为了向共产党的领导权威挑战，他们支持了人民群众的权力。通过这一行动，他们为这场运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民主主义基础。因而，阶级斗争的意义被根本改变了：这场革命变成了一场原始的民主运动。

人民群众的权力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之下得到壮大。正如一些学者们所指出的，尽管群众路线没有被很好地说明和定义，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很好地解释。但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群众路线绝对与西方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19] 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后者运用民主来控制政治权力，而前者则用民主来为政治服务。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群众路线，本质上是共产党的装饰和工具。它鼓励共产党的干部与广大的群众保持紧密的，经常地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下，群众路线又被称为民主的方法，或民主的方式。虽然如此，这种民主从来都没有控制政治权力的意义，更不要说作为政治合理性的来源了。理解群众路线的关键是找出共产党在这里面的位置。因为共产党提出的群众路线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方针。群众路线的特点被毛泽东很形象地描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里缺少的是主语，谁从群众中来，谁再回到群众中去，毋庸置疑的他说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从群众中”收集资料和消息，以此来做决定，然后把这些决定传送到群众中去。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

然而，这种基本原则由于毛泽东主义者的另一个戏剧性的行动而改变了。工作队进驻学校是在七月份末期，这是在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工作队派驻学校是在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广播之后，党的权威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因而，把工作队从学校里撤出来就意味着中止了党在学校里的直接控制。当这

---

19 《人民日报》，1966 年4月17日，5月3日；《光明日报》，1966年4月18日

种不寻常的行动被解释为群众路线时，这条路线的意义就被根本改变了。

与以往不一样的是，毛泽东对派驻工作队的批评并不针对工作队是否执行了群众路线，而是派出工作队这件事本身。派驻工作队是共产党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改进党的领导地位和能力的一种常用方法。谴责这种实践违反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把这种行动放到了与共产党领导的对立面去了。因而，群众路线从共产党的工具变为一种与共产党没有联系的、独立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权威的来源。它成为了促进人民群众权力的政治原则。

为了辩护这种新的原则，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批评工作队的讲话中激进地把党与群众之间的领导地位反转过来。在他的谈话里，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高级领导干部，已经不再是社会的领导力量。他们被批评为没有任何能力去处理任何事情，[20] 因为他们被学生运动“吓破了胆”[21]，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能力”，因为他们的“官僚政治”和“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毛泽东警告这些干部他们有可能会变成革命的对象；否则的话，他们将要靠边站。[22] 关于那些革命的老前辈，毛泽东说“十年前进行的革命只使他们越来越麻木”。另一方面，毛泽东赞扬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中国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并说“我们写不出这样的大字报”。他还声明“年青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23] 毛泽东做出结论说“过去，是妈妈教儿子，现在是儿子教妈妈。”

尽管毛泽东长期以来对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持有相似的看法，但他在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使他有所保留。共产党是可以成为群众的“老师”的，假如他们遵循群众路线，和首先甘于做群众的“学生”。但现在，当毛泽东向党的干部提出挑战时，他事实上已经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 你不了解情况[这里指学校的情况]。假如你去两个月你还是不了解情况，去半年，或者去一年。例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可以读吗？你可以批评他们吗？．．．你可以和他辩论吗？我不能。所有的省委领导也不能。[24]

通过命令撤回工作队，毛泽东事实上把共产党的领导从这场运动中移开了。而且，长毛泽东指控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他这样说，

---

20 《浙江日报》1966年5月18
21 《北京日报》1966年4月16日；《解放军报》，1966年5月8日；《光明日报》1966年5月8日
22 《人民日报》1965年12月30日
23 同上注。1965年5月5日长
24 解放军报社论，1966年4月18日。这很明显是与江青著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相映成趣。

"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害怕学生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声称遵循群众路线和天天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他们追随资产阶级路线和为资产阶级服务。"

根据这些指责，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从以前的为共产党服务的运作方法或风格改变成为鉴定共产党干部的政治评判标准。沿着这条路线，毛泽东认为新的北京市党委可能站到对立面去了，因为它镇压学生运动。在他自己的大字报上，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从中央党委到地方党委的一些党的干部"通过"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来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人民群众的权力被搬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对立面。正是这种直接的对比使毛泽东这时的评论极端的激进。

人民群众的权力很快被写进了党的文件，"十六条"，它被奉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这份文件的要点是解除对人民群众的约束，鼓励人民群众主动自觉地参加到这场运动中。通过这些措施，这份文件引进了一些原始的民主思想和一系列的民主方法。例如，十六条要求共产党各基层组织"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并且要"让群众教育自己"，还主张"只有群众可以解放他们自己"。它还迫切要求"每个革命者都必须很好地独立思考，发扬无产阶级大胆想，大胆讲，和勇敢行动的革命精神。"它确认了群众自由表达他们看法和主张的权利：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为了鼓舞人民，十六条争论说"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因而，"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必须受到保护。"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十六条把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与民事犯罪区分开来，并给与前者一定的保护：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5]

学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于是被给予充分使用“大字报和大辩论”方式的权利。自由选举也得到提倡。在宣布了文革小组和文革中央委员会成立之后，十六条把它们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后来人称在十六条中所提倡的这种方法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广泛民主”。学生和老师甚至享受八月十八日以后成立独立组织的自由；因为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和检阅学生和老师的第一次。自此一场空前的群众运动爆发了。

群众的权力不仅仅被写进了正式的文件，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很快被应用到实践中。这主要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来完成。这场运动增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很快“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就在全国广为流行。对于很多人来说阶级斗争被两条路线斗争取代了。或者，更正确地说，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阶级斗争，被认为明显地主要集中于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的概念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理论再定位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路线斗争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但路线斗争这一新概念传达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含意。当阶级斗争可以以很多不同形式出现，可以发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时，路线斗争几乎特有地只表现在共产党的内部冲突。当主导阶级斗争的理论要点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着这么多不同的标志时，路线斗争的关键要点却只是新定义的群众路线。

根据王力的文章，毛泽东在九月份提议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在十月一日最后决定对错误路线冠以“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26] 并提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在继续的概念，由林彪在国庆节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来。在《红旗》杂志社论第十三期里，又给了更为详细地说明。[27] 他们都指出了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十六条的公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然而，社论是这样说的：

---

25 例如，《人民日报》，1966年4月14，16；五月3，4，6，8，9，12，13，15，17，19，27

26 例如，在广东省，两个被公开批判的作家是秦牧，和欧阳山，两个学者是容庚，和刘杰，两部电影是，《逆风千里》和《齐王求将》，一本书《三家巷》，黎雪才的绘画，公园建设的问题，等等。看海峰《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1971，1－42。

27 例如，在广东省，有一个所谓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有由广东省委挑选出被批判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的公开点名批判就是从这个提纲开始。看海峰《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35－7。

>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然后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批判。它指出：

>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通过正式的官方宣传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多次讲话，很明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分水岭是对待群众的态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罪行是镇压群众。通过强调这一标准，这一运动把一系列激进的行动带进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

这种标准实质上最后把共产党干部不受攻击的保护层完全去掉了。面对着来自群众的攻击，这些共产党干部要不就承认这些指控，要不就拒绝接受它。对于前者，他们因而被定罪。对于后者，他们被指责为“镇压群众”。

这就是为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标志着关于评判不同地方工作队和党委会的很多辩论的结束。运动之前对于不同的个别案例仍需要提供具体的分析材料。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的需要了。因为根据这场运动的逻辑推理，共产党的干部正处于受攻击的情况下，他们注定是这场运动的对象了。这种情况很快就变得很清楚，假如他们与群众的批判相对抗，甚至那些好干部也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用一位工人的话来说，陈伯达已经规定了真正革命的党委会是不需要保护的；只有反革命的党才需要保护。林彪因而主张“群众运动本质上都是正确的”。甚至最谨慎小心的人，像周恩来也赶紧追随大潮流，表示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建议地方党干部里害怕受攻击的人，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被证明他们是应该受冲击的。周恩来于是宣布不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队犯了“路线错误”，同时那些没有派工作队的党委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就这样，这场运动随后出现了攻击和反对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浪潮。当时的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被广为流传。主要大城市和省里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上瘫痪，或者是部分瘫痪了。[28]

---

28 《人民日报》，1966年六月二日。

然而，这场运动的目标并不限于共产党的干部。对工作队和学校党支部，党委会的攻击很快蔓延到几乎所有的权力机构，包括新的文革委员会或者是临时组织和临时委员会。他们被谴责继续“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路线”。随着对工作队的批判，那些以前紧跟工作队，坚决支持工作队的人也受到了批判。与运动的第一阶段群众中敢于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干部的人受到攻击不同的是，现在是那些站出来保护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干部的人成为批判的对象，并被冠以“保皇分子”。这些人通常是以前的政治积极分子，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属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好人”。就这样，开始了这场运动最显著的特点，群众中的大规模冲突。陈伯达由此说现在有“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陶禄家，甚至这样说：“党员和团员受保守落后思想的影响太深,…….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依靠他们。”干部子弟的问题第一次被公开地提了出来。陈伯达建议高级干部的子女最好不要占据领导这场运动的重要位置。他主张，“为什么这些人必须占据权力位置，仅仅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女？因为他们有高贵的血统？”[29]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说，这些孩子将来会像“封建的公子王孙”，他同意当时是一个“大分裂，大组合”的时期。

由这场运动导致的最激进的行动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由中共中央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个紧急通知下令被工作队和地方党委、党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反党集团”和“右派”的人应该得到平反；还有，所有以前收集的,影响他们的名誉的材料必须当众销毁。[30] 这些材料包括工作队的报告，公布的材料，会议记录，学生和老师的交代材料，甚至工作队成员的日记。这些东西都被称为“黑材料”。党的干部被要求向群众坦白，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很多人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为戏剧性的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默许，或者是鼓励群众去查封这些“黑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搜查，导致学生们对党组织办公室的洗劫，从那些学校党组办公室到地方市委办公室，和省级的，甚至中央级的政府办公室都不能幸免。例如，在吉林省，学生冲进了省党委办公室大楼，打开了档案办公室，拿走了278份绝密文件。在北京，600多个学生冲破了两道由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人墙封锁线，强行冲进了国防军委的大楼。

---

29 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红旗》1966年九月1日。
30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谈两条路线的斗争》见*RGPS*, 7:2263.10月6日康生赞扬了这篇文章，见*WGZL*, 5912.

学者们曾经追踪探索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到他革命生涯的早期阶段，他的那些民粹主义倾向显然与列宁主义的原则很不一致。然而，没有人会预料他的非正统倾向会导致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些戏剧性的运动。他的民粹主义倾向导致他不顾以牺牲共产党的领导为代价来提高和支持群众的权力。因而，旧的群众路线变成了理论前提，促进和发展了一系列的民主方法。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伟大的民主”还远离成熟阶段，还是“原始的”，但它却是非常革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民主是与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共同生存的。民主的方法通过“一个阶级必须推翻另一个阶级”来为革命服务。群众运动因而成为一场对国家组织的全面攻击。当毛泽东主义者们把运动中文化和教育的方面扩大和推广到其他社会方面时，这一事实就变得非常现实了。

从“文化革命”到“所向无敌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阶级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化范围内。甚至运动的政治色彩变得越来越浓时，阶级斗争仍然主要被限制在文化范围内。当很多地方的学生要冲击地方党组织，而工人和农民要保护党组织，双方发生冲突时，当时中央政府的决策，只是简单地要求工人和农民不要干涉和妨碍学生的运动，而学生则不要妨碍工厂和农村的正常生产秩序。工人和农民被要求“坚守工作岗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由工人和农民自发起来的造反行动被忽略了。[31] 一直晚到196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还清楚地在文化范围和其他社会范围之间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划了一条界线。[32] 社论里规定得很清楚，工人和农民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能用工作时间或者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他们“不应该离开他们的城镇进行革命串连”。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文化的范围内。

这条分界线在当年底最后被打破了。一如当时全国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对红卫兵的积极支持一样，把这场运动从只局限于文化和教育系统，向全国范围推广和发展的决定，完全是毛泽东的中央对当时运动过程中所出现的事件作出的反应。

---

31 “红反军”，1967年五月20日，见*RGP* 7:1781.
32 “水电红卫兵”，1967年六月1日，见*RGP* 11：3617.

这一转变的分水岭完全像是一个赌注性的事件。196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同一天，两千多上海工人冲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上海市党委的严重罪行”。[33] 当他们被阻截在一个叫安亭的小火车站时，这些工人卧轨把铁路线封锁了三天，由此向上海市党委提出了五个条件，作为他们返回上海的前提。

这一事件无疑给北京发出了一个警报。陈伯达发了一个电报要求工人们立即返回上海。他的电报这样说：

> 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必须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这里牵涉到两个原则，小原则必须服从大原则。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次要的。因而他们必须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在工作时间之外。他们必须立即回去。这是一个服不服从党的指示的严重问题。[34]

与此同时，陈伯达派张春桥到现场去解决问题。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与造反派工人们谈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一改初衷，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回到上海后，11 月13日，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心文化广场的集会上正式签署批准了工人们的五条要求。两天之后，王力打电话给上海市党委，通知他们，张春桥的行动是得到中央文革委员会支持的。第二天，毛泽东对张春桥的行动给予了他个人的批准。毛泽东说“[作为一般的特派员] 是可以先斩后奏的；因为总是事情先出现，然后才有观念的出现。”[35]

现在看来，安亭事件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使他把对学生的注意力转向了工人。[36] 毛泽东很快决定放开对工人和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限制。在12月9日，党中央发布了十条规则，正式宣布了在工厂企业里开始文化大革命。根据这些规则，除了要求他们必须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之外，工人们现在正式被给予了学生们已经享受了一阵子的所有自由。工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组织，文革委员会，或者文革代表大会来领导运动。工人们还可以派他们的代表访问更高一级的党委会，包括北京的文革中央委员会。工人中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可以得到平反。最重要的是，第九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中的大多数人有权组织他们的革命组织。”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在农村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规则也发布了。[37] 很快这

---

33 王绍光，190-194

34 “红一战报”1966 年11月28日，见*RGP*，7：1815。

35 “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见*RGP*，6：1705-7。同时可见海锋，《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出版社，30 - 33。

36 WANSUI, 667-8.

37 *WGZL* 1：182-3。

场运动横扫中国大地，触及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

毛泽东的激进决定被冠以“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标题，成为了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新年社论的主要调子。文化大革命因而仿效几乎所有真正的革命形式，这些形式超越了任何人可以大胆想象的范围。其中，由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央文革委员会所作的三个决定最为激进。

第一个激进的改革是号召夺权。又一次，号召夺权的决定完全是根据运动没有预想到的发展所促成的。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一个群众组织接管了报社，发表了一封致上海人民的公开信。他们的行动很快带动了另一家上海报社，《解放日报》第二天也发生了同样的行动。这两个事件被《人民日报》大力颂扬，报上说“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将对华东地区，全国各省市有巨大的影响。”1月9日，三十二个上海群众组织公布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停止所谓的“经济主义歪风”，恢复正常的生产次序。两天之后，这个紧急通知受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电报嘉奖。电报这样说：

>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上海事件很快被称为“一月革命”。他们的行动马上被其他地方的群众组织所仿效。就这样，夺权变成了当时运动的主要重心。

刚开始时，夺权只是指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主要关注的是使权力为当时的运动服务。这一原则很快就被抛弃了。这一变化被很清楚地提出：夺权不限于在那些被资本主义路线执行者控制的地方。如周恩来所说的，因为夺权只限于某些地方，“将影响整个夺权斗争”。因而，夺权变成了群众接管他们本单位领导权力的一种普遍形式。因而这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阶级斗争本质上是夺权斗争。[38] 因此，夺权斗争变成了重新建立政治权力的运动。新的权力机构被称为“革命委员会”。毛泽东的中央在当时为夺权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大联合”，那就是，

38 *WGZL* 1: 189-90.

群众组织必须联合起来才可以成功地接管权力。第二条是晚些时候被称为“三结合”的权力组合，那就是，新的革命委员会必须由群众组织的代表，共产党干部的代表和军队干部的代表所组成。第三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夺权“不应该是简单的解职[某些干部的职位]和重新组织[某些机构]，而应该是从下到上号召和支持毛主席的指示的群众运动”。[39] 这是马克思主义打碎国家机器的原则。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最好的典范。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的职务和公务员都由选举产生。

第二个激进的行动，是号召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1月23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布了一个文件，要求部队“支持左派”[40] 文件这样说：

> 最近毛主席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支持广大的左派群众。从现在起，假如真正的革命组织要求部队的支持，部队应该支持他们。那些所谓的“不介入”，全属一派胡言．．．[部队]已经卷入了。问题不是要不要介入，而是要站在哪一边。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或者是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当然应该支持革命的左派．．．这个命令应该逐字逐句，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
> 动员军队介入不仅使这场革命变得更为真实。同时，以一个特别的方式开始了军队里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事实已被当时的一些造反派所指出。1月10日，江青、王力和戚本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行动，他们提出了，“揪出军队中的一小撮”的口号。林彪随后也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问题。攻击部队领导首长和冲击地方军区几乎与军队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发生。冲击军队以武汉“七月二十日事件”，为标志达到了它的顶点，在这一事变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个成员被地方军区绑架了。这一事件被看成是由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指挥的一场军事政变。造反派发誓要和“带枪的刘、邓”斗争到底，声称“揪出军队中的一小撮是支持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甚至走得更远。在公开号召军队支持革命造反派之后的几个月，毛泽东做出结论说，百分之七十五的军队干部支持保守派。[41] 为了处理这样的局面，毛泽东提出武

39　根据王力，在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他邀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和姚文元到他家吃晚饭。在晚饭之前他谈了很长一阵。他谈话的主题是主张一场“全面的阶级斗争”，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这成为他的祝酒辞。王力，100-8。这些话后来被写进了《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新年社论。《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见*WGZL*，1：196-203

40　《人民日报》，1967年1月9日。见*WGZL*，1：239，这些话实际上是毛泽东说的。见*WANSUI*，662。

41　《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见*WGZL* 1:244-45。

装造反派，和实行“群众专政”。[42] 根据王力的回忆，7月18日，毛泽东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武装工人和学生？我想我们应该武装他们。”毛泽东甚至赞扬武汉造反派建造军事设施，还说要亲自视察他们。在一些地方，部队开始给群众发枪支武器，以便建立“第二武装”。跟随毛泽东的领导，江青提出了一个口号，“文攻武卫”。[43] 由此，武装冲突逐步升级，失去了控制。“群众专政”的观念由群众组织实施合法的起诉和审判得到了实践和应用。这样引起了另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大屠杀。阶级斗争从政治斗争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武装战争。

第三个激进的决定是发动另一场运动来反“回潮”。这场运动最先开始于1967年3月底的反“二月逆流”。第二场运动开始在大概一年之后的反对“为‘二月逆流’平反的右倾翻案风”。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替文化大革命辩护。正如江青所说，“二月逆流是要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彪为副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叶群、林彪的妻子，说“二月逆流是倒退行为，是要推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44]

这些运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直接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那些军队和地方军区里的高级干部，他们实际上是毛泽东号召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直接主持地方日常事务的高级干部。随着第一场运动的开展，中央政治局已经不工作了。除了毛泽东的几个亲信，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失宠了。地方军队干部要不是受到冲击，就是被迫公开向造反派道歉，承认他们的错误行为。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中央核心小组表示了对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以“端正对革命小将的态度”为标题指出：

> 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评价过去几个月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的问题，．．．否定革命小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小将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运动的顶峰，通过一系列的讲话和根据不同省市情况作的一系列决定，毛泽东主义者们宣布一些群众组织是造反的，另一些是保守的，并且表示了他们对造反派群众

---

42 《红旗》，3，1967年2月3日。
43 《红卫兵报》，1967年2月6日，见*RGP*，8：2327。
44 《人民日报》，1967年2月2日。

组织的有力支持。这些讲话和决定挽救了很多造反派群众组织，他们不是被二月逆流宣布为非法，就是已经被大大削弱了。这同时也是对保守派阵营的一个严重打击。

此外，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义者们把文化大革命以前批判“资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大地扩大化。江青著名的12月12日讲话要求把批判“资产阶级专政”，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五十天，延长到在这之前的十七年。她的口号是“砸烂公、检、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直接把斗争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了专政的核心。在学校里，流行的口号是“全面否定十七年”。

这也是非常真实，毛泽东主义者们非常小心地把批评十七年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后来改变了这一立场。当时受到一些造反派支持的“全面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因而遭到公开谴责。然而，这里的重要性，是毛泽东主义者毕竟把通向这一方向的门打开了。因而，一些造反派公开提出“重新评价十七年”。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运动中要反对的这种回潮，并不是要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而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制度。对很多造反派来说，回潮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制度就意味着反对文化大革命。因而，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就意味着从基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秩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概念出现了。

这是为什么，反回潮运动实际上，是造反派和保守派最后和永久的分界线。在随后的两年内，从反二月逆流运动的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最基本的问题，是后者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秩序，而前者则想要从根本上来改变它。

毛泽东号召“全面的阶级斗争”动员了各行各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都参加到这场运动中。作为一场这么广泛的群众运动，有着牵涉面这么广，角度不一，深度不同的争论问题，尽管这些革命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革命，但这场运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动员了大部分的人“公开地，全面地，从下到上地揭露了我们社会的黑暗面。”[45] 因而，这场运动成为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性、大范围的批评。

*　　*　　*

45　《红旗》3，1967年2月3日。见*WGZL*，1:270。

意识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的再定位，是开始这场运动的关键。没有激进的意识形态再定位，没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有力的政治支持，发展这样一场相对来说独立自主的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再定位引起了对旧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挑战。为了指导各基层党组织和不同阶层的党干部面对这些挑战，毛泽东和他的亲信不得不抛弃很多与旧阶级斗争有关的通常实践，改变了很多与此有关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都是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阶级斗争的重新思考。当时运动对新阶级斗争理论的需求是非常明显的，毛泽东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种需要。在1967年早期“一月风暴”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他要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编写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等文章。他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46] 然而，毛泽东和他的亲信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当他们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达到了它的极点时，他们实际上逃避了应用阶级分析去解答阻碍当时运动发展的很多问题。例如，什么是坚持资本主义路线分子的阶级本质？他们是否只是几个钻进了革命内部的个人，还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否简单地代表了旧的剥削阶级，还是他们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真正的阶级关系？谁剥削了谁，以什么形式？作为一场革命，文化大革命应该完成什么？因为毛泽东已经很清楚地界定了，革命意味着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那么到底是哪个阶级推翻哪个阶级呢？对于这些关键问题，毛泽东主义者从来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事实上，他们也不敢直接面对这些问题。这样的后果是，简单地，他们不可能提供一个适当的，一致的阶级斗争理论去满足这场运动的紧急需要。毛泽东主义者一方面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把阶级分析应用到当时那场运动的勉强，这里的理论差距被很多忠实地跟随毛泽东中央的造反派感觉到了。这些人开始发展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法。因而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6 《解放日报》，1967年2月7日。见*WGZL* 1:275。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晚期对阶级斗争理论重新解释的尝试

正如我在上一章里讨论过的，尽管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理论有这么多差异，但是，这两个不同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由官方宣传舆论机构定义和详细说明的。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映来理解阶级斗争理论。大量的官方宣传舆论的创造物，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阶级斗争。这类创造物的一个典型例子通常是，以前的地主或者是资本家是如何腐蚀了共产党的干部或某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这些被腐蚀的干部和个人成了旧剥削阶级的代言人，并且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甚至到了大部分群众自动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并开始进行“独立思考”阶段，他们还是停留在仔细审阅，研究官方文件去发现任何提示和线索来帮助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发现阶级斗争。换一句话来说，大部分的人从来都没有通过他们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感觉来看待社会现实。因此，他们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方式而不是实践式的，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非常重要的特点。

由毛泽东和他的亲信直接主导的、成熟的意识形态再定位，引起和带动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新的理解。当文化大革命从它开始时的纯学术讨论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阶级斗争”，包括像激进的夺权和武斗行动，对于很多人来说，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真实了。很多人开始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理解阶级斗争。他们所看到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些具体的事件；他们看到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经济方面；他们感到的阶级斗争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同时也是与他们有关的利益。用一句话来说，他们开始在现实社会中理解阶级斗争。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焦点也从思想意识形态问题转移到了社会问题上来了。我将称这样的一种理解阶级斗争理论的思想方法为现实主义方法，这是与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方法相反的。

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理解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主义中国里呈现了一幅全新的社会现实图画。基于这些新的社会现实画面，一些造反派开始形成和发展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并重新为当时运动的性质定性。他们很快得出了一个“特权社会”或“特权阶层”已经在中国形成的结论。这种共识建立了新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成为了造反派共通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这些造反派因而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支持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和“继续革命”这样的口号。

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解

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主义的新理解表现在由毛泽东号召“大批判”的名义之下，“大批判”是毛泽东当时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斗，批，改”的三大任务之一。尽管大量的这些追求现实主义的批判文章还是重复官方的宣传口径，但它们中不少的一部分，是由一般人有目的地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所产生的激进思想用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后写出来的。这些大批判文章，开始都是以指责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公正，然后很快扩大到对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里不平等的严厉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中国社会的政治秘密被曝光，普通人遭受的苦难和折磨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和公开讨论。这样的后果是，这些大批判文章帮助引导公众全面地重新估价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因而，为形成新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公正

名义上看，在很多实际方面，对1967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公正的谴责实际上是对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一章里讨论过了。但是在这些不同时期的批判里还是有它根本的不同。尽管早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反对当时的权力拥有者，晚些时候的批评在反对当权者的同时还替那些无辜的人伸冤喊屈。尽管早

期的批评试图原谅那些只是跟了“错误路线”人的罪行，但后期的批评则同时希望暴露那些最丑恶和最血腥罪行，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来指出这些人的错误。尽管早期的批评主要针对以前的错误，但后期的批判除了针对以前的错误之外，还联系到当时所犯的罪行。早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错误政治路线的批判，后期的批判则公开地向国家机器——警察机关和军队发出了挑战。对很多造反派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这些不公正是阶级斗争的新表现形式，这是与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描述的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同的。

肮脏的政治

对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公正的谴责，开始于指责“五十天”的行动，这是引用毛泽东著名大字报里的一个术语，象征性地指文化大革命早期在学校领导和工作队的控制下所发生的不公正事情。“五十天”期间被指责为一场“白色恐怖”。首先，这一期间发生的事件被毛泽东和他的亲信谴责为压制群众运动。1967年，新开始的大批判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攻，然而，重点从官方的宣传舆论转到对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批判。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很多学生对此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提供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材料。这些调查报告和材料所提供的幕后真实情况，令学生们和一般普通人非常震惊。这些材料公布了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操纵运动，无辜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自己本身是如何成为运动的替罪羊。

其中的一个报告是有关北京市五十五中学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工作队在1966年6月10日早晨三点钟来到学校，在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帮助下，把所有的教职员工在20天之内分成三部分。在所有的122人中，14人（百分之十二）被分在第一类，这一类被认为是工作队觉得可以信赖的人；31人（百分之二十五）属于第二类，被工作队认为是可以团结的人；77人（百分之六十三）被归为第三类，他们都是将要被隔离审查和斗争的对象。表面上看来是一场群众运动，但实际上是由工作队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一手控制的整人运动，他们在一开始就把谁是运动的对象，谁是运动的依靠力量都分好了。例

如，工作队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向其他学生表扬和推荐了一张大字报，因为这张大字报组织学生开会攻击一个工作队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预先选好的运动对象。在后来被指责为“八.三，八.四反革命事件”中，工作队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组织批判大会斗争两位教师，把他们定为第一和第二号“牛鬼蛇神”，原因是因为他们批评了工作队，工作队还安排学生再多挑出十个教师来进行批判。在工作队的这些鼓动下，其他学生开始对更多的教师进行残酷斗争和侮辱性的人身攻击。那些关于“还有牛鬼蛇神在数学组！”，“还有牛鬼蛇神在中文组！”，“还有牛鬼蛇神在历史和地理组！”的喊叫声弥漫在学校的空气里，根据报告文章的作者所描写的当时情形，“就像是一场突然的暴风雨横扫了整个校舍，房子都快要塌了”。简单地说，“整个五十五中学充满了白色恐怖”。

另一个报告调查了北京市六十七中学。与五十五中学不同的是，外来的工作队没有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合作，相反，在工作队6月8日进驻学校之后，工作队的头头宣布“工作队现在把六十七中学的领导权从以前的党支部手里接管过来了”。工作队声称学校所有的干部和教师都“腐化堕落”了，整个学校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堆”。因而，工作队指示，把所有学校教师和干部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他们被强迫在早上四点就起来，所有的犯人都强迫劳动几个小时。然后他们要不是被强迫互相批评，就是被送回学校接受学生们的批判斗争一直到深夜。工作队的一些成员甚至鼓动学生使用暴力对待他们的老师。工作队撤出学校之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一些学生变得更加暴力和残忍。在半个月之内，四名教职员工被严重致残，有五个人被剃了光头。劳改农场被重新改建，那里的待遇变得更加残酷和非人。

大范围的调查由来自北京市十一间学校的学生组成的小组进行，他们调查了西城区的五十多间中学，收集了大量有关三十六中学当时情况的材料。根据学生们的报告，265个干部“几乎百分之百”（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学校的教务主任，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人事处的干部，共青团的支部书记，等等）在工作队进驻学校之后被从领导位置上赶了下来。

在265个干部里，170个被揪了出来，（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被指控为反党分子，黑帮分子，以前运动中漏网的右派分子，黑帮分子的养子…等等），占了所有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140个肉体上受尽摧残折磨（他们被踢，被用皮带，木棍抽打，被

滥用私刑，私人审讯，长时间的罚跪，把砖头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强迫站在太阳底下暴晒长达一个多小时，强迫把铁水桶顶在头上，把脏水灌进他们的喉咙，强迫吃腐烂的蔬菜），占了百分之五十三。184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这部分人占了百分之六十九。在这些人中间，安德路中学的所有干部一直被关在劳改场，直到当年三月军训开始后才被放出来。

他们中有八十人是来自于36间学校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在这些领导干部里，59人受到公开批判斗争，占了他们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四；55人经历了武斗批判会，体罚和暴力审问，占了他们中的百分之六十九；66人被送进了劳改场，是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三。

大专院校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北京人民大学，工作队不仅宣布学院里的党组织是“修正主义的党”，还同时宣布“不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职员工都有问题。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作队还进一步公布，在经济商业系里的所有共产党干部都是“黑帮”分子。其间，学生干部甚至一般的学生都可以成为“斗争大会”的对象。例如，在哲学系300多个学生里，50多人成为斗争的对象。北京工业美术学院的工作队宣称“所有的党员都是保皇分子”。除了一个党员病休不在学校，所有其他11个在校党员都受到批判，占了所有党员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二。这些事件与北京铁路学院发生的事件几乎都是同步的。

这样的所作所为并不局限于学校。同样的事件也被报道曾经发生在工厂里。在上海第十五棉纺厂，工作队宣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六百多工人是牛鬼蛇神”，百分之八十三点三的工厂干部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在天津的一家工厂，共产党干部动员警察和红卫兵镇压工厂里的造反工人。

当高压政治作为一道命令下发给工作队时，他们要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来收集材料。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队成员除了采用暴力策略之外，还采用分发糖果的办法引诱小孩告发他们的家长作为一种补充手法。在北京科学院，工作队干脆地要求科学院里所有人都交出他们在运动期间所作的笔记和任何记录，甚至强迫一些人交出私人信件和日记。同样的，在湖南的一个农场，工作队收集所有个人日记来发现和暴露那些“不正常的人”。

那些不幸成为失去理性的攻击对象的人成了案板上的肉，经常受到非人的残酷折

磨。例行公事式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高压强迫他们做“坦白”，这一过程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非人的折磨形式。被强迫一遍又一遍地写他们的“罪行”，同时还要承受没完没了的虐待，被关进监狱的人有时要交待成百上千字的供认材料。体罚经常被用到他们身上.在北京航空学院，居然公开鼓吹“对待这些干部一定要残酷无情，对他们越残酷，越无情越好”。此外，还有故意侮辱那些被审查的对象。例如在西安交大，一个学生被关进一间屋子作为“动物展览”，给成千人参观。在全中国，当时有很多被揪斗，受迫害的人自杀的例子。

有些调查报告特别集中在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如何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压制和镇压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队进驻了50天，却花了整整40天的时间进行“反干扰”活动，反对和镇压那些敢于站出来批评党组织和党干部的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在唐山铁路学院，学院党委和地方党委联合，严密监视那些贴出批评党组织和党干部大字报的人，安排“搜出”那些“牛鬼蛇神”。这样的一个例子牵涉到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根据刘少奇女儿的详细供词，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通过他们的女儿攻击那些反对工作队的学生来操纵清华大学的运动，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队正是由刘少奇派遣并由王光美所领导。

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共产党的干部都是简单地跟着运动的大方向走，而经常正是这种简单的愚忠伤害了无辜的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派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工作队到达学校不到十个小时，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学校的共产党组织是一个“党的黑支部”。像这样的突然声明，对那些无辜被定罪和攻击的对象是一种真正的威慑，面对这样的攻击，他们实际上没有办法替他们自己辩护，这是当时这一类不公正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

很多像这样的例子，给我们对文革大批判运动中所产生的不公正所进行的想象一个基本概念。假如我们把学生们的这些报告汇集起来，我们会发现他们中有些矛盾。例如，有时候学校领导因为他们不允许学生斗争老师而受到攻击，有时候则因为他们允许学生这样做而受到攻击。工作队被指控，不仅仅因为他们支持学校的领导，同时也因为他们反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在大部分报告里，学校领导被指责为“打击一大片”的黑手，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自己同时也是这些“一大片”受害者中的一分子。

因此这些报告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分析，而在于提供了大量发生在那一时期学校里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一般普通人从这些报告和故事中了解到的是共产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如何玩弄和操纵这场运动。他们发现这场表面上看来是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实际上被当权者紧紧控制着。一般普通人不仅对共产党干部的这种两面派行为非常震惊，同时对他们这种不负责任地做政治决策，对这么多无辜的人所造成的伤害行为瞠目结舌。他们还发现，他们的领导只关心他们自己，他们要不是只听从他们上司的命令，就是打击那些与他们个人意见不合的人，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对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些感性认识，相当于一场启蒙，他们开始了解什么是“政治”。然而，这些发现却很难与阶级斗争理论的旧理解统一起来。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更像是一场个人的权术游戏，它比旧的阶级斗争所声称的，两个敌对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有说服力。阶级斗争不再是像以前所描写的那么简单、是一刀切的经纬分明的两个对立阵营的斗争了。他们看到的是那些干部们如何努力奋斗，但不是为了无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政治游戏中发现的分界线，并不是人们的阶级出身，更重要的是有权阶层与无权阶层之间；欺骗者和被欺骗的人之间；操纵这些政治把戏的人和那些在这些政治游戏中被利用的人之间的分界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由共产党干部扮演主角，把政治中的黑暗面暴露于众的过程，无疑刺激了人民从不同的方面来重新看待阶级斗争。

红卫兵的野蛮行为

随着共产党干部带头进行的这些肮脏政治被公诸于众，群众对他们和他们的同谋者所犯罪行提出了公诉。学校里的头号目标，是那些曾经积极地参加对无辜群众进行迫害的红卫兵。与以前那些年相类似的批判，不一样的是，前者是由毛泽东的中央所直接领导，而1967年的批判，更多的是由群众自发起来进行的。所以它显得更为普遍，得到来自一般普通人的自发支持。批判的重点和他们的内容也有所不同。然而，最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理论方面，1967年的批判则主要集中在运动中一些红卫兵的非人野蛮行

为方面。尽管早期的批评尽量把红卫兵的错误作为是枝节性的错误来对待，但后者的批判则把红卫兵的错误宣布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红卫兵在运动中的暴行故事，因为它的残暴和灭绝人性确实令人在感情上非常地反感和难以接受。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发生在红卫兵私设的公堂和监狱里的恐怖故事。北京市第六中学里的“劳改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份由“第六中学红色造反兵团”作的长篇报告就详细记录了“劳改场”里的活动。它以《一个严酷的事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罪行》为标题在1967年1月的《红旗报》上发表。

根据这个报告，这个“劳改场”设在校园里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劳改场带有像高度警戒监狱里的所有监视设备。这里面有高墙，守望楼带有探照灯，有哨兵的岗楼；监房装有监视孔和警报。看守24小时值班，所有的门窗都被封死。正如一条贴在一个大门入口的标语所明确表示的，“红色恐怖万岁！”，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对那些受害者造成一种心理上的胁迫和威慑。当然，在“劳改场”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正如报告的作者所写的：

> 这里的情况恐怕使我们想起小说《红岩》里所描写的白公馆和渣洞集中营里的情况。在第六中学的白公馆里，少数几个六中的红卫兵像流氓恶棍一样在里面施行空前未有的法西斯式的，无人性的野蛮残暴罪行。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杀害和摧残了很多革命群众。

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这些红卫兵如何摧残和折磨那些受害者。两个学生，王某某和成某某，因为他们的黑七类家庭出身，又没有经过那些红卫兵的批准而私自外出，他们还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在他们两个外出归来的当天，就被抓起来，投进了这个像监狱一样的“劳改场”。那些红卫兵首先强迫他们两个跪在地上，然后一群人冲上来用棍棒打他们的头，背和腹部。这样的拷打折磨重复了很多次，每次他们两人都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有一次，这些红卫兵用菜刀砍王某某和成某某的脸，当他们的牙齿被敲掉，脸上的伤口开始化脓腐烂时，这些红卫兵用一些碱性油剂涂进他们的伤口，当这些油剂抹进他们的伤口，他们不但痛得死去活来，油干了之后，他们的脸上留下了丑恶的伤疤。

更为恶劣的是，个别红卫兵把试验不同的摧残和折磨人的方法作为娱乐。他们的试验

包括把人吊起来，强迫当公磕头。假如受害者的供词稍微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就强暴地按着受害者的头往地上撞。劳改场里的那些红卫兵还把活人高高地扔到空中，然后任由他们掉到地上，用刀来切受害者的臀部，用火烧他们的头发，强迫他们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的语录，连续几个小时不许停顿，一旦他们背错了一点就受到惩罚。有一次，他们甚至想给王某某做开膛手术。报告中还控告了这些红卫兵如何用残酷的手段把受害者迫害致死。

死于这样残酷折磨的两个受害者，一个是叫徐沛田的76岁的学校退休看门人，他退休之后还留在学校里。1966年9月，因为那些红卫兵说他是个“老吸血鬼”，他被赶出他住的地方。徐沛田无家可归，被迫露宿街头好几天，然而警察却把他送回学校，他被迫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罪名“老坏蛋”。遇上管理劳改场的红卫兵不高兴，他们就把他扔进粪坑里。有一天，这些红卫兵把他带进厕所里，他们先用冰凉的水浇他，他实在受不了就大叫“冷！冷！”，这些红卫兵则用快开的开水浇在他身上，尽管他痛得撕心裂肺地大叫，但那些没有人性的红卫兵却继续把开水淋到他身上，直到他的皮肤全部变红，开始脱落。对徐沛田的折磨并没有在这里结束，管劳改场的红卫兵还强迫他唱歌，跳舞来给他们取乐。他们强迫他吃粪便，喝尿液。最后他们玩腻了就用一把旧的步枪枪托和一根绳子把他杀害了。

另一个受害者是19岁的王光华。根据调查报告，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积极，参加了“革命大串联”，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但是他没有经过六中红卫兵的批准就去了串联，当他返回北京就马上被这些红卫兵逮住并把他打得致死。[1]

另一个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北京第一中学里的一所监狱。这份报告是以这样的标题开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产物——‘北京第一中学’监狱记录”，他的作者像前面那些案例报告的作者一样，把北京一中的监狱比作国民党时期的监狱，称它为“六十年代的渣滓洞”。这所监狱是由一间学生宿舍和一个地下防空洞改成的，防空洞既是地下监狱又是停尸房。不下一百多个学生被塞进这个监狱的一间主要房间。大部分的学生是被他们称为“黑帮学生”的人。新关进来的“犯人”，要先在院子里被毒打一顿，到了里面之后再被放到乒乓球台上折磨一番。

1 “五十天”指从6月到7月初，当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领导运动期间。

监狱看守的一个特别娱乐，就是强迫他们的犯人互相决斗。目的是要犯人互相暴力残杀。任何假装或者不愿意打斗的人都会遭到看守者野蛮的毒打。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被记录在案：

> 在这个房间里，一把木头枪托一记打到一个年轻人的头上！碎裂的木头和尸体都散落在鲜血和脑浆溅满的地上。在这个房间里，他们还练习一种用门上的弹簧来折磨人的游戏。弹簧在空中呼啸，扭曲，就像是一条毒蛇，当弹簧碰到人的身体就会钩进人的肉里，这些看守就会用尽全力把弹簧抽回去，这时就会把犯人身上连皮带肉挖出一大块来，….这种二十世纪新发明的折磨人的方法，把一个外校的女学生的眼睛弄瞎了，因为弹簧钩进了她的眼睛，把她的眼珠钩了出来…[2]

第三个调查案例，由一个曾经被关进劳改集中营的老师编写，她以这样标题开始“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反动路线在北京女子第三中学的耸人听闻罪行”。与前面的两个调查案例相比，这些老师所受的折磨没有那么严重，他们的控诉也要稍微轻一些。尽管他们站出来控诉和揭露他们所受的折磨，但他们没有指明迫害他们的人。根据这份调查报告，这些一般的老师被关进劳动集中营四个月之久。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个人自由，包括决定什么时候喝水和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被迫从事每天11到12 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外，他们还经常遭受拷打折磨。不下四十多种肉体惩罚被用在这些犯人的身上，其中就有惩罚长时间的弯腰和下跪。第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受害者被强迫弯曲成一种痛苦的姿势长达6到7个小时；任何试图改变姿势的企图都会遭到皮带和枪托的殴打。第二例是受害者被迫长时间跪在石头和洗衣板上，以致他们的膝盖水肿和流血。这些迫害还包括强迫犯人互相殴打。他们还曾经被强迫刮死人的耳光。

很多这样的兽性行为是由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和当时在场的人施行。例如，一篇文章记载了在一所北京的小学里，一位教职员和他的妻子是如何被迫互相打耳光，互相剪头发，互相侮辱谩骂。在北京的一所幼儿园里，一个小姑娘被强迫去打她的妈妈。一个写了一份批评工厂里党员干部大字报的工人，遭到红卫兵和工厂里的另一些工人的毒打。[3] 六个曾经对领导造反的农民，遭受不下三十多种不同的折磨和迫害，其中包括被迫在寒冷的天气里，脱光衣服走到大街上，他们的家属也受到迫害。一个农民八十多岁的老母

2 《中学战线》，1967年7月12日。见*RGP*, 4：0759-61。
3 同上注。

亲也受到折磨，他的女儿被强奸。[4] 在一家由石油部主管的炼油厂里，造反派工人遭受不下八十多种不同形式的迫害。

所有这些报告和记载，都把红卫兵和那些施暴者描写成野兽都不如的动物。陈伯达在参观了一所这样的劳改集中营之后，曾说“这样的行为太残酷了，这样的事情是不允许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另一个高级干部，非常严肃地说“他们是学生吗？他们为什么这么野蛮？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跟强盗有什么区别！”[5] 这样的行为不仅公开违反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令五申的命令，同时也超越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最高限度。这些事实的公开曝光，使红卫兵的名誉受到致命的损害。他们现在被看作是流亡恶棍和暴徒凶手，而不再被珍视为“革命小将”了。通过这些恐怖的报道和记载，很多人觉得红卫兵是另类。这些年青人好像生长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好像与一般人有完全不同的特性。怎样依照阶级分析来把这些年青人归类，很明显地是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的疑团。他们很清楚是什么原因使这一部分年青人与他们的同时代人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名声最不好的红卫兵，他们大都是高干子弟。关于这些红卫兵的阶级属性的问题，因而变成了关于共产党干部的阶级属性问题了。

错误的结论和武装冲突

1967年早期，地方军队单位开始直接卷入文化大革命，新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开始力图控制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经常是双方敌对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已经在全国大范围内到处出现了，这些群众组织的敌对活动已经造成了全国动乱的局势。新的革命委员会对当时失控局面，所采用的恢复措施中的一个策略，就是简单地宣布一些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并命令他们解散。这一措施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地方权力组织与造反派之间的严重冲突。造反派要求全盘推翻这些他们概括为“错误结论”的决定。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公开向警察机构，地方军队，甚至新的革命委员会挑战。而当时的保守派群

4 《中学红卫兵》，1967年5月20日。见*RGP*, 4：0776。
5 《新四中》，1967年5月17日。见*RGP*, 6：1433。

众组织，则通常支持这些在位的权力机构。这样无疑大大加深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从1967年夏天开始，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公开的武装冲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阶级斗争这时变成了真正的战争。伴随着这种情况出现的是大量的煽动性的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和号召武力复仇的大字报的出现。冲突的双方都用尽所有的办法来获得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舆论宣传上的斗争绝不比武斗现场的斗争少一些弹药硝烟。

要求推翻“错误结论”的斗争通常非常暴力。与早期批判运动中所攻击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一样的是，要求推翻“错误结论”，实际上是在责难当时的法律和权力执行机构。与早期批判运动中所攻击的对象，是已经下台的共产党干部不同的是，要求推翻“错误结论”，实际上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的权力在位者。最为意义深远的是，要求推翻“错误结论”的新要求与早期的批判不一样的是，它斗争的对象已不再是学校领导，工作队成员或者是十几岁的学生，它斗争的对象都是军队里的指挥员和警察机构，这些都是以前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这样一来，这些批判就变得非常的敏感。

发生在广州的要求推翻对“八一战斗队”的错误结论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八一战斗队属于造反派阵营，1967年3月1日被广州军区正式宣布为反动组织。要求对这一错误结论的平反，在很多人眼里是有意图地攻击广州军区，因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开挑战。就像一份保守派的报纸指出的：

> 众所周知，“八一战斗队”是反动组织，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州军区已勒令其立即解散。这个组织被反革命干部，劳改释放分子，叛徒，奸商和以前运动的斗争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他们那些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子女组成和控制……”

要求为“八一战斗队”平反是反革命复辟的证据。这一趋势的关键要害是要动摇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造反派也同时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发誓“为了‘八一战斗队’十万多成员的解放，我们不怕担任何的风险”，他们声称“为推翻对‘八一战斗队’的错误结论，我们甚至可以以生命为代价”战斗到底。[6] 因而，在他们要求平反的呼声中，造反派不

---

6 《新人大》1967年4月27日。见*RGP*, 5: 1163。

仅要维护“八一战斗队”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同时也直接指责了警察机构和军队组织的违法行为。晚些时候的调查报告报道，1967年3月1日清晨四点，全广州市的警察全部同时出动，在广州市全面搜查和逮捕“八一战斗队”的成员。他们没有持有任何逮捕证，而随便逮捕人。当有人对他们的行动提出疑问时，那些警察宣称“在特殊情况下是不需要任何通缉令的，帽子上的徽章和肩上的臂章，还有手枪就是最好的通缉令”。警察给所有被逮捕的人都戴上手铐和五花大绑，连残废军人也被同样处置。一些被逮捕的人甚至不在警察局的逮捕名单上。不止两千多人被投进了监狱，不少于一万六千多人被迫登记自己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因为牵涉的面这么广，我们可以预见前面提到的“公开审判斗争”问题的出现。

调查报告还记录了在警察滥用权力的情况下，受害者所遭受的迫害。警察用关禁闭的方式强迫被投进监狱的人坦白忏悔。被逮捕的人还被残酷地拷打折磨。他们生病也不给治疗。

对这些不公正的谴责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诉。调查报告中还控诉揭露了，那些受害者遭迫害的细节；他们的家属和亲戚受到排斥；一些人还被开除公职；有一些被调离原单位；有些人工资被削减或失去福利待遇；有些人被迫卖血度日，被逮捕的受害者的孩子有的流浪街头；两个人在公开批判会上被当众凌辱而神经失常。

类似的要求与对现存权力机构的谴责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在很多地方，造反派对军队权力机构提出更为激烈的控告和指责。在新疆，造反派直接点名攻击军区司令员。在西藏，造反派给地方军区领导贴上“土皇帝”的标签。在四川省，造反派甚至把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最高军事权力机构，中央军委的成员，因为他发电报到四川支持当地军区领导的行动。警察和军队席卷整个四川省到处抓人，逮人，被逮捕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庙宇，公园和学校都用来作为临时监狱”。[7]因而，当地造反派公开责难“来自于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一纸血腥文件”。

很多人在亲身经历或者目睹了由警察机关和军队机构执行的这些滥用权力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之后，开始认真思考他们身边的阶级斗争。当他们直接参加与保守派的真正斗争时，这些现实就变得更为严峻。与运动早期，红卫兵对专政对象所使用的暴力相比，

7 《新人大》，1967年4月27日，见*RGP*, 5：1163.

1967年夏天开始的武装冲突，明显地更加大规模，也更为残酷。

早期的武装冲突发生在中国西北省份的新疆，在一个新兴城市——石河子，从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七日，一共发生了七次“造反兵团”冲击军区的事件。最严重的武装冲突发生在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四人被杀，七十四人受伤。武斗的双方都对被抓获的对方俘虏进行残酷的折磨和迫害。一方甚至把一具年轻女尸裸体示众，以警告对方。[8]

在河南省，一百多个被俘虏的人在拷打折磨中腿被打断。有一些人甚至活着被火化。从1967年的5月到6月，不止2,900人被杀害和受伤。很多人被强迫流放。[9]

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有报道说，被抓获的造反派被活埋。在武斗中除了使用步枪、机关枪、冲锋枪、汽油弹、催泪弹和一般的战斗武器之外，有人还喷撒石灰粉，投掷硫酸，甚至使用毒气。

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市，发生著名的“六月六日大屠杀”据报道，有人除了使用铁矛剑戟之外，甚至还用石灰粉，农药，甚至毒蛇攻击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派群众。八人在武斗中当场死亡。一个人被砍十七刀而当场死亡。最后，三辆大卡车开进人群，杀了四个人。[10]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被报道发生在广西，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广西造反派因此向全国人民发了一个紧急通告。[11] 他们指责广西地方军区司令员韦国清是这场大屠杀的策划者。[12] 根据这些报告，保守派势力有组织、有系统地采用所有可使用的方法杀害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根据造反派的报告，保守派势力设立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来领导这场大屠杀。[13] 他们实行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来逮捕造反派，他们宣称用共产党在国内战争时曾经使用的、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来对付造反派。他们甚至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他们动员民兵、警察和部队联合进攻造反派的重要据点。从1967年的12月到1968年的4月，广西省全省86个县就有56个被保守派所占领和控制。在梧州市，最早开始的武斗持续了15天。13条街的3,000多所房子被烧，这等于市中心一半的房子被烧。被抓的俘虏不但被残酷的拷打折

8 《工人战报》，1967年5月5日。见*RGP*，9：2783。
9 《铁道红旗》，1967年5月21日。见*RGP*，12：3817-8。
10 《纺织战报》，1967年5月5日。见*RGP*，4：0949。
11 《井冈山》，1967年3月22日。见*RGP*，3：0585-7。
12 《东方红》，1967年5月12日。见*RGP*，13：4160。
13 《大庆公社》，1967年4月15日。见*RGP*，11：3627。

磨，还被集体公开处决。据报道，有50,000人被杀，数不清的人被流放。[14]

在武斗和反抗“错误结论”的斗争中，造反派不是直接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军队，警察和民兵斗争，就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党员，共青团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以及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人斗争。这些新的经验无疑与他们所受的旧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相矛盾。随着这种新的觉醒，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社会状况，获得了不同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公正的谴责和批判，导致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社会主义中国里的不平等的批判。

社会主义中国里的不平等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社会被官方的宣传舆论称颂为人类社会的天堂。假如有任何不平等存在的话，这也一定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这些东西绝对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政府对宣传媒体的严格控制，很少中国人可以知道官方宣传报道之外的任何消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里不平等的批判无疑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人们可以窥见铁幕后面的秘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被公布了，无数的冤案和控诉也被人们听到了，丑闻被揭发出来了，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完美社会的神话被打破了。这时的大批判，几乎触及到社会实质的所有方面。同样地，它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的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当人们把他们所了解的所有资料放进阶级斗争理论的模式里去看时，造反派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前官方舆论宣传提供给他们的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与他们所观察到的阶级关系是多么的不同。

社会歧视 ---- 出身不好的年青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有影响的文章中的一篇，无疑要数遇罗克写的长篇《出身论》，遇

14 《科技战报》，1967年5月9日．见*RGP*，9：2561．

罗克是北京的一个年青工人，他用“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发表了这篇文章。[15] 他的文章早在1967年1月正式发表之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流传了，包括像天津、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16] 几个北京的中学生非常欣赏这篇文章，因而他们办了一份报纸《中学文革报》，用首刊来发表这篇文章。第一期发行在1967年1月18日。因为需要量太大，第二个月马上要重印这一期。以后的数期都专门刊登由《出身论》引发的讨论文章。很快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17] 反对者声称作者在“说谎”，说它“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18] 他们说文章带有“诽谤的味道”，是在“发泄个人的不满”和“煽动对新社会的仇恨情绪”，是要“否定过去的十七年”，和“在舆论上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翻天作准备”。[19] 他们还指称文章“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里反动思想意识形态的倾向，暴露了一些人潜藏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愿望。”“这种反动倾向的主要特点是灌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鼓励对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怀疑。”另一方面，文章的支持者欢呼这是“唤醒沉睡大地的惊雷”，[20] “没有任何大批判文章可以与《出身论》相提并论”，文章引起了一场大辩论，“没有这场大辩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算最后完成”。[21]

很多事实证明，这篇文章有着很深远的意义。甚至十多年以后，在1978年到197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一份非官方的主要报纸发行了一份专刊重印了《出身论》。[22]

《出身论》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通过仔细分析，遇罗克的文章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有很重要的突破。首先，《出身论》把对文化大革命早期政治上不公正的谴责，延伸扩大到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社会不公平的控诉。第二，《出身论》通过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出身不好的人所受的歧视，来反驳家庭出身好的人在文革前受歧视的说法，他用出身不好的人最受歧视这一事实，把官方制造的神话打破了。

“家庭出身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文章是这样开的头，然后文章指出由于错误的阶级成分政策，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那些出身好的年青

---

15 《32111战报》，1967年10月30日。见*RGP*，11：3394。
16 《井冈山》，1967年4月8日。见*RGP*，3：0400。
17 见例子，《中学论坛》，1967年4月6日。见*RGP*，4：0803。
18 《红旗》，1967年4月6日。见*RGP*，6：1570。
19 《人民交大》，1966年11月12日。见*RGP*，8：2411。
20 见例子，《人民交大》，1966年11月12日。见*RGP*，8：2411；《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见*RGP*，3：0509；《建筑红联》，1968年1月9日。见*RGP*，2：0212-7。
21 《体院战线》，1967年4月29日，5月6日。见*RGP*，12：3721，3725。
22 《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见*RGP*，3：0509。

人受歧视，而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受歧视：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这条路线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23]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出身好的人如何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出身论》直接了当地揭穿了这种说法完全是人为的虚构。文中指出：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上那么反动还入了党，那一点像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

《出身论》提醒读者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之时，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么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24]

《出身论》进一步指出这一类的歧视现象并不局限于学校。例如，凡是近三、四年提

23 《红旗》，1967年4月20日。见*RGP*. 6: 1662.
24 《井冈山》，1966年12月31日。见RGP. 3: 0347-8.

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不是出身好的人。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假如他们出身不好，他们就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社会上的其他部门情况也相差无几。1966年到1967年北京街道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待业青年求职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栏。[25]

"出身压死人"！《出身论》的作者大声疾呼。遇罗克责问"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文章总结说，出身问题已经"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在《出身论》里遇罗克公开宣布了他认定的解决办法，只有起来进行斗争。他还指出"我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文章最后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文章无疑鼓励进一步暴露和揭发中国社会里的不平等。例如，一篇随后发表的文章争论说，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血统论就已经存在，支持和助长这一观念的主角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它主要通过《中国青年》杂志来传播这一观点。另一篇文章报道了最近几年，在一个矿山里大部分出身不好的工人被调离机械工程和电工部门，同时还被剥夺了提升工资的机会。矿山的党支部书记甚至极端地公开宣布"党员和团员不应该和地主、富农的子女结婚。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应该加强政治学习。那些还没有和这些人结婚的，则不应该继续发展这样的关系"。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村青年说，在他的村子里，出身不好的年青人没有一个是团员或者是干部，算工分时，他们中没有一个被算作强劳动力。村干部经常公开表示不支持出身好的青年人和出身有问题的青年交往。

《出身论》的伟大影响不仅因为它介绍了社会现实的另一个方面，同时还因为作者表现出来的敢于说真话的大无畏精神。作者所陈述的事实不是听来的或者是看到的，而是作者本人亲身的观察体会和判断。这一点对于随后出现的用现实主义的方法重温阶级斗争的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遇罗克后来被很多老造反派称为中国思想

25 《兵团战报》，1967年4月10日。见*RGP*，11：3343。

启蒙的先驱。

社会受压迫者的控诉——下放青年

当时关于家庭出身的辩论虽然非常热烈，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学和农村里。甚至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不愿意公开站出来讲话。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歧视，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勇气。辩论主要在其他学生中进行，特别是那些出身于既不“红”，也不“黑”的家庭如知识分子、小商贩、或者是一般职员家庭的孩子。

在农村里，情况甚至更为严重。以前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亲属被看作二等公民，根本就没有他们说话的余地。但是，这一类人里的一部分却敢大胆讲话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很活跃，他们就是那一批被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不好。公开的歧视加上重体力劳动，还有农村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变得非常好斗。来自于城市的消息对他们是极大的鼓舞，这些青年人拼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返回城市，求助于公众对他们的支持来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所经历的磨难给社会主义中国的黑暗面添加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一篇由一个自称为“反迫害”组织写的，很有代表性的文章，就很形象地以《血和泪的三年》这样的标题描述了他们的状况。从文章的标题和这个组织的名字都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的一种深深的既仇又怨之恨。文章列举了很多他们所经历过的不同性质的虐待。为了完成计划，凑足下乡名额而获得奖励，一些共产党干部用尽不同手法，强迫，欺骗，胁迫待业青年下乡。拒绝下乡的青年人不仅不给予分配工作，他们的家长假如不配合做动员工作，他们自己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一间学校的校长宣布那些不愿意去农村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其时，那些干部贩卖鼓吹农村是乐园，年青人只要求在农村呆两到三年就可以回城。被送到农村的青年人中，最年轻的只有13岁，他们中有的还是残疾人。

很多下乡青年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他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的身体不能承

受他们所要求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在佛山附近的一个农场，33个下乡年轻人中，就有2个得了关节炎，4个有胃病，3个患了贫血，3个得了肝炎，一个有水肿，2个患了阑尾炎。一个在九江公社的15岁的男孩子，甚至因为劳动过度而死亡。

被下放的青年人很多都遭受了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被剥夺。他们经常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在广东省江门市郊区，下放青年被派去跟“四类分子”一起劳动。在一个国营农场，甚至设了一个劳改农场来安置下放青年。在广东省靠近阳春的一个村子里，村子里开会选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要求城市下放青年先离开。一些女学生被强奸，有一些甚至自杀。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地方。一份报告记录了湖南省的一个农场5名下放城市青年1966年12月的工分收入，这份记录显示了下放青年的严酷的经济状况。[26] 例如，一个男学生一个月劳动30天，只有2元5角的收入，扣除了7元一个月的伙食费，他实际上还欠农场4元4角9分钱。一个女学生一共劳动了18天，她的收入是6角钱，因而她欠农场6元4角的伙食费。文章控诉说“假如陶铸（原中南局的党委书记）要花一万元一年吃人参，梅兰芳（著名的京剧演员）每演出一场挣2,000元，那么这份收入记录会把人吓坏。”在经济困难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的双重压力下，8个年轻人自杀了.

在湖南的一个农场，两个场领导强奸和调戏了81个女青年。一篇文章描写了一个下放女青年跳进迎面开来的列车自杀的恐怖场面：一个年青的女孩子躺在血泊中，她被列车自辗成三段，她的左臂断了，她的脑袋被压碎了，只留下一个冰凉的尸体在铁轨上…….这个年轻人穿着一身学生装，在她尸体的旁边还有一顶草帽，上面鲜明地印着四个大字——“支农光荣”。[27]

一份报纸引用了湖南省宁远县的一张大字报揭露了城市青年在农村所受到的政治虐待：

通知（1967年2月7日）

春节期间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下放受教育青年必须得到批准才可以离开外出。外出时间不可以超过半天。任何违反规定，延迟返回的人将受到贫下中农的批判斗争。

---

26 《红旗报》，1967年1月22日。见*RGP*，6：1699-14。
27 同上注。

红石造反兵团

另一篇小报引用了一份日记（日记可能虚构）中的一篇：

12月30日

今天我在桃村邮局遇见了一个我认识的农民，她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她我在寄信。她惊讶地问我“寄给谁？”

“寄给家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问得那么奇怪。

“你也有家人吗？”她问得越发奇怪了。我觉得她的问题很好笑，我笑着说“我怎么可以没有家呢！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她使劲摇着她的头说“不是，不是，人人都说你们下放青年没有家。你们是小流氓被送到农村来劳改的。”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不是的，”我开始给她解释“我们都有家庭，毕业之后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这里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她怀疑地摇着她的头说“但这是在大会上，公社干部告诉我们的呀。”

我像当头挨了一棒。眼泪充满了我的眼眶。一种受了侮辱和不公平对待的感觉令我窒息。

一篇文章记录了广东省一个公社里，当地农民如何集体殴打下放青年，以致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事件。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这些青年家里寄来的生活费晚了几天，他们在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砍了属于生产队的两行香蕉，拿到镇上去卖，换一些钱来买食物所引起。[28]

共产党的干部同时还用各种手法防止下放青年对公众和媒体暴露他们的状况和他们所受的磨难。一个女儿被谋杀的母亲揭露，当地干部力图掩盖这一事件以阻止调查。[29] 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青年经常成为斗争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公开处决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30] 下放青年宣称“我们是刘、邓、陶黑线的牺牲品，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

---

28 同上注。

29 《红军战报》，1967年3月8日，见*RGP*，7：1767-70。

30 “渣滓洞”是国民党秘密警察在四川重庆设立的专门折磨摧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监狱。

控诉说“农村是地狱，是苦海。”他们相信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这些青年人打出了“反迫害”，和“要求人权”的口号。在广州，一些下放青年甚至威胁要大闹广交会。

尽管下放青年的示威抗议没有赢得一般公众的支持，但他们的悲惨故事已经在社会主义中国天堂般的形象上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另一种印象。

经济剥削——合同工和临时工

另一个社会群体，他们觉得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并且敢于起来进行斗争的是合同工和临时工。他们的委屈和不平对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这些人都是工人阶级，而这一阶层正是国家的主人和领导阶级。如何用阶级关系来解释他们所受的歧视和虐待很明显不是一件小事。

一篇以“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为标题的文章在当时提供了很重要的辩论。文章指出这种“雇佣制度”是从“苏联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在这个制度下，“甲方”（工厂和企业）雇佣“乙方”（合同工，临时工）应该通过双方“商讨谈判”来签订“合同”。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合同”只是甲方陈列了一大堆要求，而被雇者（乙方）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签字。这样的合同保证了“甲方可以解雇乙方，而乙方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文章争辩，这样的合约“根本上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它说：

>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雇佣劳动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甲方”付钱“乙方”出卖劳动，这是最便宜和最方便的劳工制度。它给“自由劳力市场”和恢复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合同工制度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的东西.

作者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但是合同劳工制度却要把“工人放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合同“采用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使用的条款和术语”。它为企业追求“利润第一”提供了“最便宜，最灵活的劳动力”，这一制度把工人阶级分裂成两类。合同工人不能把企业当作他们的家，但他们要靠“出卖他们的劳

动来活着”，因而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家”。

除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之外，合同工人同时还受到严重的经济虐待。例如，工龄在决定福利待遇，像获得多少退休金和多少病假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合同工人不能算工龄。因而他们被剥夺了国家应该提供和保证他们的权利。

合同制度同时还违反了宪法。根据记录，宪法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者当他们年老体弱，或因工致伤致残有权享受国家的物质补助”。但是，正如报告的作者指出的，“合同工人尽管他们还可以工作就可以被强迫解雇，当他们生病了就被一脚踢开了，在这样的制度下，他们怎么可以享受得到劳动保护呢？”

“关于其他福利”，作者控诉说“不平等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同一份报纸上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一些具体例子。[31] 在一家炼油厂，有400多个工人，平均年龄24岁。每年工厂都要雇，解雇和开除大批的工人。“是因为太多工人吗？但为什么每年都要雇人呢？是因为人手不够吗？但为什么每年都要解雇和开除工人呢？”作者提出疑问。作者指出，在1965年这个炼油厂不能向合同工提供劳保设备。这些工人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要赤脚走在粗糙的山路上，但是他们没有鞋穿。他们没有雨衣，一下雨就浑身湿透。在他们的合同文件上用来证明他们身份的印章，工人们用中国最形象的话来描述是“这是旧社会一个人用来卖身的契约”。当这些合同工人被解雇，他们被强迫“在六小时之内离开炼油厂”。[32]

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抗议活动席卷全中国。他们的声势劲头很大，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如陈伯达、江青和康生等人。这些工人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据说曾经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在北京游行。

这个组织很快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宣布为非法，这些工人的运动也被禁止，但他们的一些领导人没有放弃和停止斗争。他们更加公开的对这一制度的攻击使他们后来遭受了很多磨难。在一个邀请了外国来宾的会议上，这个造反团的一个分部领导陈述说“三年中（1960年到1962年）我没有尝到过酱油。有时我甚至没有玉米面，我几乎饿死。我们要挖菜根和捡烂的白菜叶子来吃 . . . 为了活下去，我一家被分开好几个地方. . . ”

31 《红军战报》. 1967年3月8日. 见*RGP*. 7: 1767-70.
32 《红军战报》. 1967年3月8日. 见*RGP*. 7: 767-70.

造反团的头头还报告说“现在，新疆、内蒙和其他地方，很多合同工和临时工由于被开除，而引起了大量的自杀，上吊，家庭破裂和逃亡．．．”。因而他们悲叹“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我们都是奴隶；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以此来形容合同工，临时工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他们对当时政权和制度的攻击相当尖锐。他们甚至提出“打倒所有的当权者”的口号。[33] 造反团的领导承认，他们确实想要“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面”。听了他们的伤心故事之后，一个从南非洲来的来宾评论说，他觉得“好像回到了他的家乡，听他的邻居讲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压迫”。[34]

除了对合同工和临时工的不公平待遇之外，其他工人所受的不公平也得到揭露。清华大学的工人抱怨说，党的领导干部花上百上千元来盖别墅，以供他们个人享受，而十多个工人只能挤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控诉学院实验工厂的领导从来都不和工人说话。一个一家四口的工人家庭挤住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子，而只有两口人的这个领导干部却住在5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35] 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个五口之家的工人家庭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危房里。很多工人三代同堂住在一间房里。一个工人要和他那前来探亲的妻子住在走廊里，长达两个多月。[36]

生病的工人经常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一个北京大学的工人，因为他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曾经被放射性铀污染过而被过度辐射伤害，但是他的病情却对他保密，不让他本人知道。北京郊区的一个矿山，矿领导经常对那些患了尘矽肺结核的工人保密，从而让他们继续工作。[37] 由于这些共产党干部的迫害，一些工人被迫自杀。[38]

农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也得到了揭露。“三年困难时期”所直接导致的恐怖后果第一次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道。据说在一些地方，整个村子的人都被饿死。当人们从一些报告中知道了造成这些悲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地方党干部强迫农民高报，多报粮食产量，以迫使农民多交公粮给国家的事实，很多人因此而非常愤怒。[39] 据说，当农民稍有反抗，警察便被派去镇压他们。[40]

所有这些报道都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存在着剥削。留下来的问

---

33 同上注。
34 《首都红旗》，1967年2月7日。见*RGP*，1：3469。
35 《井冈山》，1967年5月16日。见*RGP*，3：0428。
36 《井冈山》，1967年11月24日。见*RGP*，3：0466。
37 《新珠影》，1968年2月。见*RGP*，5：1109。
38 同上注。
39 《新北大》，1967年12月6日。见*RGP*，5：1403。
40 《环球赤》，1967年6月27日。见*RGP*，6：1497。

题是，谁剥削了谁。当一些共产党干部的奢侈腐化生活被暴露出来之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变得很清楚了。

奢侈腐败——共产党干部的生活

随着大批领导干部的下台，共产党干部的私人生活第一次被一般老百姓知道了。这些揭露都相当具体，有时甚至夸大其词。有关共产党干部私人生活的资料来源，包括他们自己的坦白交待，他们的同事，下属，服务员，亲属对他们的公开揭露批判，群众组织所进行的调查，甚至在抄他们的家时获得的物证。这样的报道经常在一般群众中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

开始时，人们对这些共产党干部所享有的物质条件非常惊讶。一个参加过抄福建省党委书记叶飞家的前红卫兵生动地描写了他的印象：

> 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没有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你看了之后一定会很吃惊。”我们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些看上去这么诚实，总是声称无私忘我的共产党干部会是这么腐败。[41]

一篇文章描写前广州市长曾生的房子是这样记录的：曾生的豪华房子里有四个大衣橱，每个价值800元，三张席梦思床，每张价值600元，一张桌子价值800元，一张价值几百元的沙发，两张价值各3,000元的地毯。六把电风扇，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电炉。还有两个照相机，九个晶体管收音机，一个留声机和一个录音机。报告同时还揭露了曾生包租了广州最好的宾馆的一层作为他个人的住处，他还用公家的钱举办了很多豪华宴席。广东省的党委书记赵紫阳，据说有他自己的私人体育场。南方局党委书记陶铸被控告为他个人建造了一座豪华房子。

然而，像这样的例子还无法与那些专门给高级干部，包括付部长，将军以上的干部和他们家属开的特别俱乐部相比。[42] 这些俱乐部1958年始建于北戴河，自1959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扩建。新建筑的标准都是超现代化和奢侈豪华，主楼花了一百多万元和六年

---

41 《东方风暴》，1967年11月23日。见 *RGP*，13：4020；《新北大》，1967年11月29日。见 *RGP*，5:1400。
42 《反修战报》，1967年7月8日。见 *RGP*，4：0915；《红色造反者》，《斗私批修》，1968年1月4日。见 *RGP*，7：1985。

的时间还没有建好。俱乐部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台球房，羽毛球场，象棋室，电子游戏室，射击场，画廊，餐厅和舞厅。一级服务员，一级厨师，一级理发师，甚至修脚的高级师傅都从北京最好的宾馆被抽调到那里工作。在这个特别供给的地方，你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这里也从来没有缺少过供应。节日里所有的东西都免费。一些高级干部甚至吃完之后还带回家。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喝“龙井”，抽“熊猫”香烟。[43] 邓小平来这里玩牌的时候，他所需要的点心茶水是4元，但他只需要付1元。其它3元由政府通过其它渠道来支付。坐在最好的沙发上，他还觉得不够舒服，坚持要在上面再加一个软垫。看，他是多么的“修正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骥平、邢湘生和其他市警察局的人，吃好东西吃腻了想吃狗肉。他们派人到延庆找狗，但当地农民不愿意把狗送出去当宴上肉，这些办事员欺骗农民说这些狗是要拿去给医院做实验用。更为不能让人忍受的是一些“高干”在这里玩到深夜一，两点钟，他们困了就躺在床上，衣服也不脱，服务员要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这里每周有两个舞会，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舞伴都是特别从各文艺团体和大医院里挑出来的“漂亮姑娘”。这里放的电影不是西方的就是香港的电影。

这些文章还揭露了在北京的一个大百货商店里，有一个专柜为国家高层干部专门供应特别日用品。

共产党干部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人格也被曝光。刘少奇被描写成一个伪君子，他可以“牺牲一些物质利益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据说他和他的老婆在海南岛玩了五天，就花了6,952元。正如文章的作者指出，这笔钱“可以支付174个人一年的生活费”，但他们个人只支付了其中的15元。邓小平据说是个桥牌迷。每个星期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下午他都要打牌。当他出公差到哈尔滨，他甚至派飞机到北京接他的牌友到哈尔滨陪他玩。他经常带全家外出旅游。当他到贵州省出差时，有72个人为他服务，他每顿饭至少要有14到15个菜。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要求三个医生专门为他服务。外交部长陈毅据说只吃好的东西，只看高级的文娱演出。贺龙喜欢看武侠小说，这些书被放在他的床上，在他的办公室，甚至摆到他的厕所里，他经常呆在厕所里看这些书，长达一到两个小时。[44]

---

43 《红旗贫下中农》，1967年10月7日。见 *RGP*，6：1720。

这里还有很多关于共产党干部如何假装像农民和工人一样生活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的故事。据说当她住在农村的时候，她有专门的好食物存放在她的屋子里，但她会到农民家里装模作样地与他们一起吃饭，尽管这样，去吃饭时，她还要带上她自己的碗筷和有人专门负责清洗。她用陈旧朴素的衣服遮盖穿在里面的豪华名贵衣料。她参加劳动时，有好几个人在旁边帮忙。[45] 陶铸到工厂劳动时，宣布他不吃肉，以便表明他和工人生活的一样。但事实上，正如文章的作者指出的，他花了不少于10,000元在吃人参，这些钱可以“买10,000斤猪肉”。类似有关的故事还有广州市副市长焦林义和农业部长谭震林。[46]

对共产党干部的指责里最敏感的是他们对妇女的虐待和调戏。大量的“解放后很多高级干部重新组织家庭”的消息传播开了。人们在疑问，“高级干部有责任领导全国革命，假如他们沉迷于‘女色’，革命怎么办呢？”[47] 刘少奇据说结过六次婚。他43岁跟一个16岁的姑娘结婚，很快又跟她离了婚。他很快又跟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王光美结婚。有证据说1956年贺龙曾经企图强奸过一个女服务员。[48] 广州市长曾生喜欢欣赏西方的色情电影。文化大革命前他曾经强奸了四个妇女，这些受害者中一个才十几岁，一个有夫之妇，一个军人的妻子。在宴会上，他会记住那些被他看上的妇女的电话号码，饭后他通常会去找她们。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撤职以后被控告强奸过很多妇女。

由这些干部亲近的人出来对他们公开揭露和批评，通常很触动人。刘少奇的女儿公开了他如何虐待她母亲的故事，她详细陈述了刘少奇如何不让她母亲学习或工作，只许她全心照顾他的生活。离婚之后他不允许她探望女儿。[49] 贺龙的女儿也讲了相似的故事，她说她的母亲非常压抑，曾经想自杀。

一位老工人回忆他为一个老干部当服务员的生活时说：

> 他好像是地主和资本家。我替他当了14年的奴隶，14年没日没夜地干，每天只能睡4到5个小时。我要擦地，买菜，烧开水……我要做所有的家务。我甚至要给他怀孕的老婆清洗呕吐物，给他们倒屎，倒尿……一次我实在是受不了，几乎想自杀。

---

44 凌耿（Ling Geng）《天涛：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香港，心境传播公司，1972年，87。
45 《1.25战报》，1967年1月3日。见 *RGP*，8：2375。
46 同上注。
47 《体育战报》，1967年10月30日。见 *RGP*，12：3754。
48 《风雷》，1967年12月。见 *RGP*，4：0992。
49 特别期刊，见 *RGP*，17：5441。

在公开批判中央检察局局长罗瑞卿的讲话中，一位他以前的服务员也提供了类似的故事：

我刚到罗瑞卿家工作时只有15岁，但反党分子罗瑞卿和郝治萍（罗的妻子）把我当牛作马，像他们的奴隶。他们安排我做这么多工作，我连喘气和伸腰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睡4到5个小时。不管我干得多晚才睡，早上我一定要在7点钟起床。当反党分子罗瑞卿起床时，我要对他说“早上好”，假如忘了说，我就会挨骂。我要给他的脚上药，我要给他打洗脸水和洗屁股，我甚至要在他的牙刷上挤好牙膏。晚上，反党分子罗瑞卿经常出去跳舞，上剧院，打麻将，或者做其它肮脏下流的东西。他经常呆到半夜或凌晨一点才回家，他回家以后我要给他准备洗澡水和烫脚水，我还要给他的脚抹油，他不允许洗澡水的温度有一度之差，洗完澡后我还要给他身上涂护肤液，我只能在他躺下睡觉之后把灯关了，才能上床睡觉。每天晚上他都要摇几次铃，听到铃声，我要立即起床，告诉他几点钟，让他吃药，给他到便盘。每次他小便完就会摇铃让我去倒。他每天晚上都这样折磨我.

在一篇标题为“我要说！我要讲！我要揭发！”的文章里，一个护士揭露了北京市长彭真如何享受按摩服务。从北京几间大医院里挑出来的护士，被派去专门给彭真按摩，以前她们被告知，这是党的秘密，不能对外说，现在她要把它都讲出来：

他（彭真）像个暴君，每次我们去给他按摩，他不是在打牌，就是在打乒乓球。假如他在打乒乓球，我们就要给他捡球。我们在他玩够，吃够之后才能开始给他按摩，按摩起码要一个钟头以上，有时长达两到三个小时，当按摩的护士累得满头大汗，精疲力尽，魔鬼彭真和他的老婆张洁青呼呼大睡之后，我们还要轻轻地，随着他们的呼吸节奏离开。

共产党干部奢侈腐败的大曝光，刺激了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真正社会关系。谁是社会的真正主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权力和日常生活中特权之间的关系也被人们注意到了。这样的重新思考由于对共产党干部子女享受教育特权的批判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教育特权——干部子女

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种特别不平等的现象，可以在当时的精英学校里发现。公众很快发现这一类特别学校的存在，它们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这些学校专门招收共产党干部的子女。因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教育特权的批判，主要针对这些学校。1967年初期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展览，题为“彻底粉碎首都修正主义的干部子女学校”，这个展览对公众揭露了这些学校的内幕。

根据红卫兵报纸揭示的1955年教育部党委发布的一份文件，1952年有42间这样的特别学校，这些学校仅招收了13,034个学生，却雇用了2,935个教职员工。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学校的数字还在增加。例如，1950年早期，北京市有10所这样的学校，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增加到不下30多所。[50]

正如文化革命时期学生报纸谴责的，这些学校的入学标准是“择官”（挑选学生根据父母职务头衔），而不是“择优”（挑选根据学生学习成绩）。例如，当时北京市党委就直接控制北京市北海幼儿园的招生工作，一段时间，只有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可以进入这所幼儿园。这里公开宣称的是，这间幼儿园只“为高干服务”，“刘少奇的孩子和孙子，邓小平的孩子，彭真和其他黑帮分子的孩子是这里的“尊贵的客人”。专门为干部子弟设立的育英小学，1948年就在解放区建立，解放后搬到北京，仍然由共产党中央直接控制。他们宣称“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将军的孩子”。

广州市广雅中学的一篇文章描写了学校招生入学期间的情况：

> 干部子女的家长派他们的秘书，或者亲自到学校要求批准他们孩子的入学……中南局党委，省党委，和市党委把干部子弟的名单列交给学校，作为招生的依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打电话，递条子都是常用的方式。[51]

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广州的学校被分为四等。广雅属于最高等的学校，一些干部子弟虽然他们的分数连最低等学校的入学分数线都没有达到，却仍然可以进入广雅中学。例如，一个干部的孩子，他的数学入学考试只有零分，但仍然被招入了广雅。

---

50 当时“龙井”茶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茶，“熊猫”牌香烟是最好的香烟。
51 特别刊刊，见 *RGP*，17：5441。

1964 年，学校招收了240名新生，其中170 人，百分之七十五是干部子弟。[52]

专门为干部子女设立的学校，有很多特别的待遇。根据上面引用的1955年的文件，这些学校的学生从衣着、食物、居住条件和交通设备都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所不能比的。很多干部用他们的小汽车送他们的孩子上学。根据对六间干部子弟学校的调查，1954年12月的一天，一共有359辆小汽车送孩子上学，其中大部分是高级干部的小汽车。在这些学校里，学生和教师的比例是六比一，大城市里一般学校的师生比例是二十比一，全国范围内，郊区和农村学校的师生比例是三十三比一。[53] 这些学校的经费比一般学校要多得多。

北京“八一”中学的学生描写他们从前的生活时这样说：

> 学校的设备既豪华又浪费，学校里有动物园，花园，牛奶场，游泳池，果园，鱼塘等等。什么东西都有，就像王公贵族的宫殿。全国人们都生活在供给制下，但我们的学校却由北京军区提供专门的食品，因而学生可以随便吃，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这样。[54]

在这所学校里，一共有500多教职员工照顾这里学生的所有日常生活，他们的服务甚至包括剪脚趾甲和手指甲。假如学生稍有不如意，教师和职工随时会受到学校领导和家长的责骂。模仿北京“八一”中学建立的广州“八一”中学，也报道了差不多类似的消息。[55]

为了保证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在北京育英小学，所有的楼房都有走廊相联接。学生们春游外出要乘大轿车，因为他们相信大轿车比较安全，交通路线也要预先检查过。学生们爬山，教职员工要排成一行保护他们。学校的设施是一流的，以致前来参观的苏联专家都评论说这里比“我们的海军学校还好”。[56] 八一中学附属幼儿园有一个配有18个医生护士的医疗室。[57] 北海幼儿园甚至配备苏联和日本的医生和护士。[58]

尽管有这么好的设施条件，一些干部还不满意，还提出诸多要求。一个六年级学生的妈妈，要求她的老师每天早上打电话给她汇报她的女儿头天晚上有没有尿床。一个家

---

52 《经济批判》，1967年4月28日。见 *RGP*，3：0328。
53 《造反》，1967年1月11日。见 *RGP*，1：265。
54 《东城风暴》，1967年12月7日。见 *RGP*，13：4020。
55 《红卫兵报》，1967年2月8日。见*WGZL*，1：491。
56 特别期刊，见 *RGP*，15：4893。
57 《城建战报》，1967年6月27。见 *RGP*，2：0125。
58 《红卫报》，1967年5月10日。见 *RGP*，8：2251。

长要求老师给她的孩子按摩。另一个家长每天派他的保姆送牛奶和苹果到学校给他的孩子。有些家长要求学校给他们的孩子安排小房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在挨饿，但一个部队姓杨的将军的儿子却要接受专门的治疗来减肥。

这一阶段对教育特权的批判几乎成为了反对干部子弟的宗教战争。这正好与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主流唱反调。因为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重点是控诉那些精英学校对从前的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把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但现在所暴露的却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被这些精英学校拒之门外是因为他们的位置被这些干部子弟占据了。例如，一篇文章透露，北京市第一小学，一所专门招收干部子弟的学校，始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然后是北京市第二小学的建立。学校的校址占据了原来农民孩子上学，风景优美的地方。当地的农民学生被迫离开他们的学校。[59] 1964年一间精英学校仅招收了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所有的其他学生都是高级干部，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的孩子。”通过这些批判，社会主义中国里不平等的含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

欺骗——官方的舆论宣传

文化大革命前由共产党官方控制的不真实的新闻消息也同时被暴露出来。很多批评暴露了共产党干部如何树立虚假的典型要人们学习的内幕。例如，一篇题为“董家耕的真实面目”的文章，详细地描写了共产党干部是如何虚构故事，把董家耕硬树立为下放青年榜样的过程。河北省省会的红卫兵出版了一份报纸，揭露了由河北省党委树立的六个假模范的事实。[60] 造反派谴责那些共产党干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欺骗广大的群众的行为，同时指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也变成了“特权阶层的成员和脱离劳动的工人贵族”。[61] 一篇文章列举了另一个全国下放青年的模范陈国冀所得到的特别待遇，揭露了在他下放到农场的六年当中，实际上从事农活的时间不足半年。

---

59 特别期刊，1967年11月。见 *RGP*，17：5488。
60 有好几个有关这样的报道。例如，《造反有理报》，1967年3月10日。见 *RGP*，12：3999。
61 《斗陶战报》，1967年4月13日。见 *RGP*，1：3923。

伴随着这些批判的同时，也报道了一些被官方舆论宣传掩盖了的重大事件。例如，1962年6月1日，10,000多人涌向广州铁路东站等候去香港的火车的事件。[62] 甚至1959年在平叛西藏叛乱中的错误也被暴露了。通过这些报道，很多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有了更清楚地认识。

* * *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和随后的“四人帮”倒台，使一些中国人开始叙述文化大革命“从未透露过的故事”和文革前他们的生活。那些离开中国到了西方，并出版了他们论文集的人，经常被西方的舆论捧为英雄，因为他们敢于站出来说话。实际上这些故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广为流传，正如我在这一章里陈述的，最有勇气和胆量的是当时那些造反派和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批判”，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对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伟大的批判，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全面的社会大暴露。它几乎触及到社会的所有方面，从个人问题到社会事件，从小偷小摸到通奸行为，从派性冲突到权力斗争的阴谋。毫无怀疑，这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更重要的是，这场大批判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直接参与和完成，因而这绝对不会是一场空洞的对话。最重要，也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使很多一般老百姓卷入了政治。它把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影响和深远意义实在是不可估量。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批判”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是阶级分析，这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由此可见，正是阶级斗争理论引导着大部分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逐渐变成了真正的激进派。阶级分析不允许任何人把个人所遭受的折磨和痛苦，作为个人别案例去看待，它教会了人们把这些腐化堕落的干部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来看待。这样就把批判的范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的构架里。来自于“大批判”的这些信息材料，因而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里的一幅全新的社会真实写照。同样的，阶级分析不再是一种政治标签，它变成了既是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真实写照，同时又是当时社会制度下所产

62 《广州日报红旗》，1967年7月11日。见 *RGP*，9：2639；《铁道红旗》，1967年5月10日。见 *RGP*，12：3816。

生的革命的真实反映。通过这样的途径，很多造反派开始意识到一种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已经在中国出现了。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理这种新的阶级关系，和如何根据这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式来继续进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讨论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初步形成的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内容。

新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

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在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都非常强调经常性的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在实践中学习阶级斗争理论的紧迫性。早在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那时起，当毛泽东明确地要求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为主题写文章，并定下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63] 的调子之后，对理论学习的这种强调就变得非常突出。然而，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临死之前，他才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意图。但是，他号召和动员的理论学习，实际上变成了形成新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他的动员对于当时那些热衷于响应他们所热爱的领袖的号召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启迪。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官方对这一主题特别的指导，无疑为人们自由发展他们自己对这一理论主题的解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一旦造反派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马上提出了他们对当时运动的政治纲要，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根据自己的政治日程来行动。同样地，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了一股有别于毛泽东中心的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

“特权阶层”

新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心是以“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已经在中国形成为前提而提出来的。大部分的中国人对“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的理解主要是通过文化大革

63 《红色公交》，1967年4月14日。见 *RGP*，7：1911。

命开始之前不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大辩论。中国共产党指责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党内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苏联修正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64]，正是这一阶层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威胁。

很显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疑团，当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的概念看来也适合中国的国情了。与这一概念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些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干部的性质。是否把这些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干部，“走资派”，作为一个特别的利益相同的阶层？或者是把他们作为“混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来看待？后者把腐化堕落的共产党干部简单地作为社会中另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代表了被推翻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用私有制来取而代之，那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这些蜕化的共产党干部，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或者是特别的阶级。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所持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官方的宣传机器和毛泽东主义者从没有正式使用“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来描述中国的阶级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人们发现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主义者表示了很多激进的倾向，从而在很多方面脱离了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但是它仍然保留了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的框架，并没有远离他的基本中心要点。

假如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干部被看成是一个有他们自己特别利益的集团的话，那么，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既然这些共产党干部要努力保持他们的特权，他们没有必要推翻公有制。相反，他们需要保护国家和集体经济，因为他们的特权是以这个制度为基础，从中获得支持的。比较与旧的有产阶级合作，他们知道，作为旧的有产阶级的代言人更有利的是，他们可以镇压和利用他们，就好像利用其他劳动者一样，以便巩固和继续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特权地位。

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基本形成了这样的思想，我将在下一章里专门讨论这一思想。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思想的基本原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开始出现。如其他很多激进的思想一样，这一思想同样也是由毛泽东主义者首先提出来。当他

64 《打倒贺龙》，1967年11月。见 *RGP*，17：5189。

们力图把运动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但是当他们需要迅速结束这场运动时，他们却决然地抛开了这些思想，并终于镇压了那些忠诚的支持者。

最早在1966年，陈伯达对高级干部的子女是否应该掌权的问题就提出了挑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著名讲话里说："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在同一个讲话里，陈伯达同时针对一些共产党干部在文化革命期间的表现，提供了新的解释。他指出为什么一些高级干部追随错误的路线，是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这些干部"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值得注意的是，陈伯达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这些干部的职位，而不是以前官方宣传经常使用的，是这些干部的"资产阶级立场"。他的争论指出，是因为这些干部的职位腐蚀了他们。这些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镇压群众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职位。这些干部的企图和努力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批评里，陈伯达实际上含蓄地把这些干部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来看待了。

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对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指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不肯改造的地、富、反、坏、右的同时，社论还附加指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仍然有市场，他们的立场观点还没有转过来，或者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社论指出这些人不关心革命的事业，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官职"，为了保住他们的职位，他们蒙蔽和操纵群众斗群众。他们声称自己是党的化身。此外，他们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来欺骗和蒙蔽一些学生，包括"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他们用右派的帽子来威胁群众，为了使群众追随他们，他们还要求群众反对"盲目服从"和"奴隶主义"，以达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目的。

这些批评的重要性，在于它传达了一些干部不仅仅追求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还发展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样一种含糊的信息。当他们预言文化大革命将给中国的阶级关系带来重要的改变，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将从政治革命转移到社会革命时，毛泽东主义者几乎打破了在中国使用特权阶层概念的禁忌。这些暗示表明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主义者所能达到的最激进的思想。在他们的正式讲话里，一些毛泽东主义者甚至使用了“特权”和“特权阶层”这样的术语来批评那些共产党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然而，毛泽东主义者从未充分发展这一思想。稍后他们甚至简单地完全避免讨论这一主题。他们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沉默和含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空隙，而他们的忠实追随者却很灵敏地感觉到了这里面的间隙。但是这些感到有责任去发展和完成这一思想的人，很快发现，他们将面对着严厉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正是来自于那些当初首先提出这一思想的人。

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已经或者正在中国形成的思想的出现，标志着毛泽东的中央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分野。毛泽东的中央和激进的造反派之间的这中分野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它标志着毛泽东的中央和群众之间关系的逆转。在这以前，一直领导着这场运动的毛泽东的中央，通常表现出比一般群众更为激进的倾向。因而，这一时期的造反派是那些紧跟中央和中央的政治纲要的人。然而，造反派接受和采纳了特权阶层的概念的事实使这一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这些造反派第一次表现出比毛泽东的中央更为激进的倾向。同样的，这些造反派感到他们必须基于前面的那些学说，形成新的理论和提出新的政治要求。随着这些变化，造反派的标准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于那些激进的造反派来说，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不再是步步紧跟中央政府指示的人，而应该敢于支持和拥护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以此为行动指南。这些造反派因而变成了改变和形成文化大革命新进程的真正造反派，他们所形成的这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就这样文化大革命从官方的政治运动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顶峰时期，特权阶层这样的术语，最早出现在用于批评高干子女，这一概念在当时出现，很明显是由于高干子女在运动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他们的显赫地位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逐步深入而迅速衰败促使的。干部子女那种傲慢自大的态度和残忍行为在一般学生和教师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愤怒。早在1966年底，学生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就要求“立即取缔北京东纠和西纠”。文章说：

> 文化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

亮，他们采用国民党的“训政策略”，组织一部分人成立“纠察队”欺骗和镇压群众，“管理”红卫兵，扮演了文化革命“消防队”的角色。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像高高在上的暴君。他们是红卫兵里的特权阶层。西城区和东城区纠察队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对这些高级干部子女的批判首先主要集中在，他们声称的他们在社会中的特别权利，正如他们的批判者所指责的，干部子女的“特权思想”。

一篇由北京第三中学一个红卫兵组织写的《打倒特权思想》的文章，指出了“特权思想在没有教育好的高干子弟中还很普遍”[65] 然后文章提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老”红卫兵和领导文革委员会的人几乎全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女。他们遵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组织他们自己的小集团，这种现象几乎可以在所有的中学里发现。[66]

文章随后指出，臭名昭著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在一些干部子女中大受欢迎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心里相信他们所拥有的特权。这些干部子女把这幅对联视为特别的财富，到处贩卖，因为根据这幅对联的逻辑推理，他们很明显被置于所有学生之上。

文章揭露了红卫兵纠察队的真相，他的成员几乎全部都是高干子女。此外，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没有一个不是这一阶层干部的子女。由于这些组织高踞于其他红卫兵组织之上，他们看不起其他的群众组织，也不把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放在眼里。他们声称有权力“检查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党政机关，所有的工矿企业和团体”。从这里，文章得出结论说，这些组织“变成了特权组织，他们的成员属于一个特权阶层”。

文章同时讨论了“特权思想”的来源和它的结果。文中指出“迷信特权，同时也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苏联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苏联社会里的高薪阶层和特权阶层。”“特权思想”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同时也来自于几千年前中国古代社会封建传统习惯的影响。[67]

对“特权思想”的批判，一直继续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篇发表在1968年，题为《接班人之争：特权思想的批判》的文章指出，干部子女在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欺骗和进攻面前，比一般学生更容易中矢。因为干部子女被给予很多特权，他们从小被

---

65 《造反》，1967年1月11日。*WGZL*，1：266-7。
66 《体育战报》，1967年10月11日。见 *RGP*，12：3752。
67 《红旗战报》，1967年4月28日。见 *RGP*，7：1840。

培养和教育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事实上，是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子女组成了一个“贵族”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变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特点。

文章然后列举了干部子女所享受的特权，来阐明这些特别的权利如何助长了他们“特权思想”的发展。首先，干部子女享有教育特权。干部子女可以进入最好的学校，在学校里获得特别的重视和培养。可是，文章用一种厌恶的口吻指出，这些“权贵集团”却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声称他们受了压迫，通过这些主张和要求，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是更多的特权，文章总结说。

第二，干部子女享有政治特权。文章指出，干部子女不仅像高级干部一样可以有机会接触党的内部文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培养和教育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他们远远高于一般人之上。例如，学校里经常为干部子女举行特别会议，宣传“干部子女生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是可靠的接班人。你们不接班，谁来接班？”；“假如你们不占领科学文化阵地，谁来占领它？”这一类的题目。在这样的方针的指导下，学校发展大部分干部子女入团。例如，考虑到赵紫阳（文革前广东省委书记，八十年代成为国务院总理和党中央书记）的儿子还没有入团，学校的校长询问学校共青团团委，“你们为什么不发展赵书记的儿子？”，校长甚至直接和赵紫阳儿子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谈话，说“你们应该考虑发展赵某某，难道赵书记的儿子都不可靠吗？”对共青团团委或支部发展干部子女入团施加压力并不局限于这一例子或赵紫阳儿子的个例。一些干部子女的家长经常打电话给学校领导询问和打听他们孩子的入团问题。他们责问“假如我们的孩子不能入团，谁可以入？”

“接班人之争”一文指出“所有这些事实，严重毒化了一些干部子女的灵魂”，这些干部子女所享有的特权和他们在学校，在共青团里的特殊地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他们看不起所有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

> 他们觉得接近工人和农民是一种耻辱。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参加体力劳动。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掌权”，成为权贵。他们只考虑如何保护和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干部子女心目中的特权思想极度膨胀，基于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原则，他们想利用革命中的“混乱”达到可以使他们获取特权的交椅……

出身于革命领导干部家庭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还可以从干部子女的这样一些陈述和讲话里看到，在“革命干部子女委员会”里，那些“出身高贵的男女”自称“我们将来一定要掌权，我要当党委书记”。更有甚者，一个联动成员宣称二十年后他将是国家总理。文章指出，当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反对特权思想，这些干部子女变得日益反对这场运动，因为它开始影响了他们的特权。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正如文章论证，“这正是他们这些人长期享受政治特权的结果”。

文章继续深入进行分析，干部子女除了享受教育和政治特权之外，他们还享受着生活上的特权。对于大多数普般中国人来说，郊游和旅行在当时还是很罕有，一些干部子女却可以随同他们的父母到处旅游，或者利用他们父母的权力外出度假。例如，一个学生去海南岛和越南过春节，另一个则乘军舰到公海上玩。除了这些旅行度假的机会之外，干部子女同时还有看内部电影的特权，这些内部电影对一般群众不开放。

在“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干部子女带他们自己的食物到学校。广州市长的女儿因为带了太多吃的东西到学校，以至她的行李箱经常被老鼠咬坏。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副市长经常送食物到学校给他的孩子，连他的跑腿都有开门进学校宿舍的钥匙。结果是，当全国大多数人都在饿肚子的时候，干部子女可以吃他们想吃的东西，并可以随意享受哪些美食。

干部子女除了在学校享受特权之外，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贵族化的生活方式里，在家里他们指望别人照顾他们。有些人甚至要他们的保姆给他们端洗面水。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他们怎么会不变成‘修正主义’呢？”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对“特权思想”的批判本质上是对干部子女的批判。然而，很快这些批判导致了对共产党干部本身的批判。一些造反派学生开始把党的干部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来看待了。把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共识，使对干部子女的批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直到这一阶段以前，干部子女还是被看作出身于“红色”家庭，只是因为他们犯了一些错误，导致他们离开了革命的阵营。然而，当共产党的干部被攻击指责为“特权阶层”时，对他们的基本评价和审读就改变了。他们被作为出身不好的一类了。他们的唯一希望是背叛他们隶属的社会阶级，成为革命者。1967年早期发表的一篇题目为“为什么这么多干部子女在路线斗争中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

文章，把干部子女所享受的特权与党的干部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分析这些问题。文章把阶级斗争应用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从一种新的角度和更为全面的方式来分析上面所提到的现象。

文章首先提供了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六个月期间，很多干部子女在路线斗争的搏斗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些干部子女帮助工作队镇压造反派学生和教师，他们组织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充当军事武装警察来反对群众运动。他们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想象吗？”文章提出了疑问。随后文章以下面的陈述回答了这一问题：

> 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的背后有着很深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这种现象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表明了党内和社会里严重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接着文章引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一篇共同社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基础仍然存在的证据。正如这一权威理论综述的，文章说，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组成要素。社论指出，除此之外，“反动路线在党内也很有市场，这主要是因为那些干部，他们的观点没有或者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然后，文章集中陈述了以上综述里的最后一段话。通过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剖析干部子女的问题，它重提了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所产生的激烈辩论，很多干部子女引用毛泽东著名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语录，“但是他们完全歪曲了这一‘最高指示’”文章指责说，因为根据他们对阶级地位的理解，他们用政治标准取代了经济关系。然后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文章接着说，我们必须体会和理解毛主席教导的真正含义，干部子女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

为了澄清干部子女的经济地位，必须首先弄清楚共产党干部的经济地位。文章指出，自从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干部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经历了一个根本个改变。他说：

政治上，干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同时又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情况导致了他们逐步脱离群众。他们慢慢养成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一些人政治上开始变得腐败。经济上，现存的资产阶级残存势力，现存的三大区别，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给干部们提供了不同程度的高标准生活水平。他们的生活标准比一般的工人和农民要高得多、他们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来源于旧制度的各种不同的特权。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意识形态上，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国内和国外，党内和党外的修正主义思潮不断地腐蚀着我们的干部。

文章的结论很清晰：这些干部不再代表无产阶级，他们现在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基础。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领导下，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正是这一特权阶层，构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

因为这些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他们的孩子可以作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后代”来看待。文章提到，这些干部子女住在一流的豪华住宅，由保姆带大，进特别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此外，他们的事业和政治前途都有保证，他们利用他们父母的权力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特权，是以剥夺一般人的权力，浪费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为代价的。

文章争论说尽管大部分的干部子女拥护毛主席，敢于和旧的阶级敌人斗争，有些人甚至和个别黑帮分子作斗争，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特权地位和环境，大多数人已被拖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事实证明了，他们并不愿意与新生的修正主义作斗争，因为这一体系正是为他们利益服务的基础。[68]

文章接着揭露了，走资派如何利用干部子女来执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实。它进一步指责那些走资派的子女，实际上不是革命干部的子女，而是那些修正主义干部的子女。同样，干部子女不但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同样可能会成为反革命分子。正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他们经常反对革命群众，斗争老干部。有时候，这些干部子女可以走在运动的前头，但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可以提前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到关于运动的消息。在这些例子里，他们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待群众的资产阶级官僚主

68 《战报》，1967年1月19日。见 *RGP*，2：0016。

义态度，和他们高人一等的心态。

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组织就直接攻击“联动”是，一个由高干子女组成的声名狼藉的红卫兵组织，是“特权阶级的护卫者”。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张，“毋庸置疑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特权阶级的社会基础，一个中国的特权阶层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第二部分分析了“联动”的阶级性质，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阶级分析的标准只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状况；一方面是政治状况；前者是决定性的。由此，文章强调，“联动”集中了那些享受着特别政治和经济待遇的干部子女，这些人“骑在劳动人们的头上，已经变成了精神贵族”。文中陈述：

> 这些人是修正主义的未来，他们是特权阶层的继承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们的行动代表着他们的阶级利益。“联动”充当了刘，邓黑帮的保皇队，刘少奇把他们当作他的千金宝贝，中国的希望。“联动”所做的一切都是保护特权阶级的利益，“联动”是特权阶级的产物。[69]

第三部分讨论了联动如何通过镇压群众，保护走资派来达到他们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目的。关于第一种行为，“联动”成员贬低和辱骂其他同学为“狗崽子”，他们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第二种行为，在“保护老干部”的口号下，“联动”抱怨“由于文化革命小组领导的清洗运动，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还留在原职”，然后控告说“文化大革命是苏联1930年‘大清洗’的扩大化”。

攻击反对“联动”，成为反对高级干部子女的旗帜，造反派学生写了许多文章批评联动这个组织。他们指出，联动的主要成员都是干部子女，他们的职位由他们父母的级别来决定，这个组织与苏联的特权阶层有联系。他们指出，“联动是刘，邓反动特权阶层的一部分”，那里有“这一阶层的少数几个成员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个组织是保护特权的产物。联动的成员是保护“老干部”的先锋，因而，这个组织是“保护爹妈的小集团”，[70] 造反派学生形容联动的成员为人面兽心，[71] 他们像强盗一

---

69 同上注。
70 《首都红卫兵》，1967年5月21日，见 *RGP*，11：3570。
71 《广雅八三一》，1968年3月，见 *RGP*，9：2727。

样，抢掠，殴打和杀害工人，干部，学生和一般群众。这个组织是一帮政治土匪。[72]

这一阶段关于“特权阶层”的讨论仍然主要以干部子女问题为中心。直到1967年的第二阶段，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心才逐步向领导干部本身的问题转移。对干部子女特权批判的重要性，在于把干部子女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集团或阶层来看待的同时，也把这些共产党干部划分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把干部子女作为“特权阶层”批判的同时，也是把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批判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对干部子女的批判，开创了理解和应用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全新方法。《为什么这么多干部子女在路线斗争中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文的编者按揭示了这点：

这篇文章写得何等好！

作者应用了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原理，既不是随意地贴标签，也不是纯学术的讨论，它既不感情用事，也不是抽象概括。它的结论出自于阶级关系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它有力地指出了：家庭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对他们的孩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这一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意味着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掌握和理解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这篇文章深入讨论了一些由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值得注意的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开拓了我们对一些概念，如“阶级”和“复辟”等概念的狭隘认识的视野。[73]

在这里“我们对一些概念，如‘阶级’和‘复辟’的狭隘认识”很明显是指文化大革命以前盛行的旧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往往被用于“乱贴标签”和（“学术原著讨论”）。对于作者和当时很多造反派来说，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陈腐过时。他们需要确定“当时情况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对中国社会里存在“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做出结论。这一结论变成了这些造反派形成自己思想理论的基本理论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上，一些造反派开始发展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论，这就是很快广为人们所知的“新思潮”。

“砸碎旧的国家机器”

72 《春雷》，1967年5月24日，见 *RGP*，4：0748。
73 《八一风暴》，1968年3月，见*RGP*，10：3071。

从1967年夏天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是理论学习小组的出现和与此同时出现的不同理论。例如，北京有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山东有一个“十月革命小组”，[74] 上海的“东部学习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75] 广州的“八五公社”。这些小组主要是在响应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号召下相继成立的，毛泽东当时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于1967年九月以后，成为当时官方舆论宣传“伟大战略计划”的理论学习的主题。[76] 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之后，一般人，特别是造反派都感到迫切需要一种合适的、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当时的运动。既然毛泽东的中央难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这些学习小组的形成正好满足了当时的这一需要。

与当时的武斗相比，这些学习小组的成立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但是，一旦他们的学习研究成果传播开来之后，它唤醒了很多被当时运动的迂回曲折所困惑，并急迫需要寻找引导的人。此外，这些激进的作品同时也引起了当时毛泽东中央的警觉。

来自于这些学习小组的理论学说被统称为“新思潮”。这一名称反映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它表明了这些理论代表了与传统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方法。第二，表明了这些新理论虽然很明显在观点上和重点上都有很多不同，但他们却有一致的共同基点和立场。假如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一共同基点很明显的，正是新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特权阶层已经在中国形成的假设。否认还是承认这一假设，成为正统官方思想意识形态和“新思潮”之间的最根本分界线。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阶级斗争的解释，应该从与特权阶层或共产党干部的专门斗争着眼，前者则力图从旧阶级斗争理论中寻找对这种新的社会矛盾的解释。因而，“新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正式出现。他们的著述集中体现了文革造反派理论上的最高造诣，因而这非常值得我们的特别注意。

下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由于毛泽东主义者对“省无联”的批判，这种全国性的批判使这个组织的著述得以广为传播。这个组织的四篇主要著述将被进一步分析：《我们的纲领》，[77]《省无联

---

74 《春雷》，1967年7月。见*RGP*，4：0752。
75 同上注。
76 《挑战》，1968年3月中。见*RGP*，12：3789。
77 同上注。

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和《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任务》（简称任务）。

“省无联”在这里提出的主要论点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思潮。它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以“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已经在中国出现为基点。把它与有关这个主题的早期讨论相比，“省无联”的著述里，几乎用“阶级”这一专有名词全部取代了“阶层”，当提及这个新生的剥削社会集团，有时会交替使用这样的标签，如“特权阶级”，“官僚阶级”，或“‘红色’资产阶级”，这些新术语的出现，表明了一种对当时越发严重的阶级分裂问题的认识。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阶层，这个新的社会群体本身是人民的主要敌人，因而，他们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对象。

“省无联”的著述可以说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对待这一新生“特权阶级”讨论最好的可见文章。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三个主题：重新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十七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过去的第一年提供一个基本的评价；澄清和重新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作定义。

谈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或者说十八年），“省无联”断定人民共和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纲领》一文提供了下面的一半观察报告：

> 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地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十年代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看来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

这一总结基本上否认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曾经发生过任何基本的变革。正如文章所主张的，新的国家机器是“旧国家机器最典型的遗留物”。因为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彻底完成”，上层建筑“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公，检，法系统已经变得“完全腐败变质”。一个关键的要数表明了当时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是特权阶级的存在。正如文章指出的，“干部中的大多数正走近，或已经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纲领》然后总结，“特权阶级的出现，表明了部分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变质”。

另一篇文章，《我们的任务》更进一步解释了特权阶级是如何和为什么形成。[78] 首先，他指出了1949年的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继续和存在，它产生和分化出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仅仅在1956年到1957年，伴随着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的集体化运动，生产关系短期地从资本主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斗争仍然在继续。反对和抗拒社会主义道路在干部阶层里出现了。1962年的恢复时期标志着官僚阶级的形成。这个官僚阶级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式，引起了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的任务》从三个方面陈述了中国的生产关系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

第一，既然一个国家工厂企业的领导有全权掌握和管理工厂，他或她可以违反国家生产计划，以便为他个人谋求更高的个人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意义下的生产，而“事实上是官僚阶级私人财产的生产”，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严重，文章接着指出，“知识青年在很多地方成为了事实上的新形式下的奴隶”。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变成了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劳动人民失去了反抗不平等的权利。谁要是敢于提出异议，就会被贯上“反党行为”的罪名，文章悲叹“官僚阶级根据他们的意愿完全控制了劳动人民的命运”。

第三，产品分配“已经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改变成为官僚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高工资，高稿酬和奖金制度等等使这种新的剥削形式制度和专门化。

文章最后总结，官僚阶级的形成引起了新的阶级矛盾。“官僚阶级享受着特权和高薪。合同工，临时工和计件工制度已经造成了新的阶级分化，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

---

78 《八一风暴》，1968年1月3日。见*RGP*，10：3067；3071。

法律和制度上的不平等已经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恨。农村里的官僚阶级也引起了农民们的憎恨。然后，文章指出，在作为1964年“四清”运动党的著名指导文件的“二十三条”里，毛泽东第一次尖锐地指出了“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我们的任务》声称，“‘二十三条’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已经完成了形成一个新的阶级关系的转变。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阶级——已经变成了革命的主要敌人。”[79]

除此之外，《我们的任务》竟然提出，在中国“官僚阶级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在新的情况下共产党干部中的“必然分裂”。一些干部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参加革命的同时，一些则抱着资本主义的目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持续性，现实社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影响的腐蚀，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了新官僚阶级的出现。

确定了特权阶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主要敌人之后，“省无联”毫不费力地否认了文化大革命早期所取得的任何重要成就。过去的一年或更早一些，反动路线的“阶级基础”“几乎完全没有被触动过”，这场革命被“认为没有把个人放在他们的领导地位来予以考虑，更没有推翻特权阶层和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省无联”的主要著述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我们的纲领》概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动员群众，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因为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利用他们手中还掌握的权力欺骗群众，干扰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特别是毛主席的理论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由于反动社会习惯势力影响的延续，很大一部分群众仍然不明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反抗特权阶层的形式还停留在试图减轻他们所收的压迫上。
>
> 尽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评和批判从去年起已经开始了，但这些批评和批判还是停留在对个别人的犯罪行为的揭露上。此外，产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产生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的阶级基础几乎完全没有被触动过。
>
> 尽管今年的一月风暴拉开了从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序幕，但夺权只是把一些个

79 《八一风暴》1968年3月。见 *RGP*，10：3071。

人从他们的领导职位上撤了下来，但没有把特权阶层作为一个阶层来推翻，也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同时，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熟，结果是政治权力还在官僚主义者的手里，所以夺权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改变。因而，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功绩是增强了人民的运动意识。一般来说，运动还是处于自发性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在我们的万里长征中，我们才刚刚完成了第一步。

在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不但对这些观点作了最出色的阐述，实际上还把以上的这些观点进一步引申和说明。《中国向何处去》指出因为人民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还是很“浅薄”，“他们不仅没有办法有意识地理解，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和监察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他们甚至不承认敌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结果使“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夺走了”。因而它公开向新的革命委员会挑战，它指出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帮助官僚主义者官复原职”，组成了“为红色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政体，军队和地方的官僚主义者将在这一政体内扮演一个重要的领导角色”。它把“二月逆流”看作是由周恩来领导的红色资产阶级向革命群众的报复。同样地，它把武斗颂扬为反对红色资产阶级的“地方人民革命战争”，但令人悲哀的是自从1967年九月份以来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受到镇压，换一句话来说，革命远远未能完成。[80]

“省无联”的意图是要否认过去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否认过去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重新制定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因而，“省无联”非常强调当前运动所面临的阶段仅仅是这场运动的开始，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根本改变的出现。这一思想也可以从《我们的纲领》里看到：

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11. 12”指示（由江青提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由林彪提出）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使用像“伟大的政治革命风暴”，“彻底革命”，“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样的

80 同上注。

措辞，“省无联”表达了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强烈愿望。这样一来，它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要求和目标，其最后目的就是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彻底推翻。这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中国向何处去》引用了列宁的话来证明，一场真正革命的最终结局必然是阶级的分化和改变。它声称“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百分之九十的高干靠边站了”，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阶级的真正内涵在一月革命中已经改变”。然后它进一步指出：

>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作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中国向何处去》继续指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最起码要求”必须是“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它号召“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它需要“财产和权力的完全重新再分配”。更具体地说，它要求百分之九十的老干部应该靠边站；他们最好的出路是被重新教育和再团结。因为他们已经基于他们自己特别的利益形成了一个腐朽的阶级。

把当前的运动看成是一场全新的革命，《中国向何处去》打出了“极左”的旗帜。它极为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它号召对“中国社会新的阶级分析”和“重新组织和划分阶级”，因为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所引起的伟大的阶级改组和变动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向何处去》公开支持“极左派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政党”以便“带动群众推翻新的资产阶级，去完成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的要求。作为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中国向何处去》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自然要卷入军队”，它说“在革命群众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主义阶级之前，国家内部的革命战争是完全必要的”。最后《中国向何处去》自豪地宣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中华人民公社”。

“省无联”的文章标志着中国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这些文章不仅仅清楚地把党的干部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划分开来，同时提出和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计划来应付这些新问题。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管这些文章是如何的狭隘或者是如何的不成熟，但是它在思想意识形态的创新影响对当时的中国人民的信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尽管大部分人在当时不能接受，或者简单地说不能理解他们的激进思想，但是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有很多与“省无联”成员所经历过的相似的经验。“省无联”的思想被其他群众接受和发展的事实还可以从文化大革命末期“继续革命”的要求中被证实。

“继续革命”

在1968年一月“省无联”被毛泽东主义者们公开地抨击和批判。它的主要成员被马上关进了监狱。通过公开批判“省无联”，毛泽东的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当时的中央坚决反对“新思潮”。中央所需要的不是独立思考，而是“紧跟毛主席中央的主要政策和路线”。要安定不要混乱，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服从不要造反，要结束运动而不要继续革命，变成了毛泽东中央当时要求全国人民遵循的方针。

毛泽东中央要结束这场运动的意图，很快伴随着一系列反对造反派的强硬措施，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措施而得以贯彻。军队干部掌管了新的革命委员会，大量老干部被吸收加入了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结果，使造反派几乎失去了他们在新权力机构里的影响。1968年夏天的一个月之内，毛泽东中央接连发表了两个很强硬的命令文件，“七月三日通知”和“七月二十四通知”，号召结束武斗和恢复正常秩序。这两个通知证明了为什么当时军队可以通行无阻地镇压造反派，在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恐怖的大屠杀。七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成千工人进驻了清华大学，当时北京造反派的一个重要据点。造反派向工人开火造成了5个工人被杀，731人受伤。第二天的一早，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召见了北京地区的五个主要学生领导，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马上投降。

随着这一事变，“工宣队”和“军宣队”在全国范围内进驻了学校，大多数的文化和教育机关部门。工人阶级而不是造反派被毛泽东中央指定为“管理一切”的阶级，毛泽东中央很快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获得了全面的胜利”，群众组织因而被解散，学生被送到农村劳动。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召开。新的共产党领导被挑选出来，文化大革命也最终结束了。

对于那些希望文化大革命可以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改变的造反派来说，文化大革命以这样的一种形式结束，确是一个很大的失望。他们感到这样的结束不仅抛弃了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目的，同时也背弃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原则。

无论如何，面对着来自于毛泽东中央和自1967年晚期开始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日益增加的压力，大部分造反派不再那么激进，他们经常受到攻击，他们处于一种更为缓和低姿态甚至是防卫的地位。与其像“省无联”那样提出更激进的要求，继续推进革命的雄伟目标，这些造反派开始寻求保护他们在革命中已经获得的成果。他们力图限制把革命向“极左”方向的推进的努力，从而转向为反对“右倾回潮”。他们对保护自己比对攻击别人变得更为关心，或者是，他们攻击别人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而不是认真的理论思索。因而他们的很多观点，从“省无联”的角度来看，被认为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或者是“投降主义”。

然而，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造反派的这些文章著述，仍然被“省无联”思想意识流的冲击所承认。在毛泽东的中央镇压了极左之后，这些文章成为仅存的、支持和保留着“新思潮”精神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背离“新思潮”，还不如说，事实上他们延续了新思潮。通过这些最后分析，这些文章作品和“省无联”的文章都是来源于同一理论框架，也就是，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新阶级斗争理论所起的作用方面，下面的讨论将主要集中在这些文章著述的相同方面，而不是他们的分歧异议。我想论述证明的是这些文章著述背后的思想与“新思潮”的基本思想观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下面的讨论所使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于广东。

当时广东造反派组织的主要文章大多出现在“反击‘右倾回潮’”这样的大标题

下，这样的主题表明了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当时形势的基本态度。尽管当时的官方舆论宣传在全国范围内庆祝运动的全面胜利，造反派们却继续从不同的方面谴责“右倾回潮”。然而，政府需要结束这场运动，而造反派却要求“继续革命”。尽管官方媒体要求铲平“山头”，造反派却公开地辩护这些派别和小集团。为了辩护他们的立场，造反派必须寻求支持，毫无疑问地他们投向他们所称为的“阶级分析”。他们所应用的阶级分析，当然不是旧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大部分讨论所围绕的中心是“派性主义”。当时，毛泽东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动了一场反派性主义，动员群众组织排除过去的分歧，组成“大联合”的运动。这一行动引起了造反派的强烈抗议。为了维护他们的组织活动和自治，造反派坚持号召应用阶级分析去进行“派性主义”的讨论。他们认为派别都是阶级斗争的手段。一个派别相当于阶级里的一个特别的部分。不同的派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同样的，不同派别不应该被看作不利于革命的原因。革命派和保守派的共存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对立需要被作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来考虑。因此，两大派不应被同等对待。正如一篇文章所说：

> 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对立，被少数走资派所利用，原因是一派需要革命的变革，而另一派则想维持现状。这种对立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当这种现象在群众中出现时就变成了人民群众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里的关键要点是“人民群众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通过把路线斗争从革命派与走资派之间的斗争扩大到群众中间，造反派可以争论过去两大派之间的斗争不是简单的派性冲突，而同样是“路线斗争的表现”。因而，这些造反派提出，作为路线斗争，派性冲突应该被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两大派的形成，存在和冲突的背后是由阶级原因为基础的”。然后他们指出“保守势力是党内走资派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保守派组织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正如文化大革命过去的历史所表明，和一些激进造反派所证实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宠儿，工作队，冒充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组成了“中间派”的核心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过去阶段，这些人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他们的组织都是正牌的保守同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伴随着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产生了“红旗派”的核心成员。他们总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这

两大派之间斗争的本质是路线斗争。

造反派争论说，既然两大派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阶级斗争，造反派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那么毛主席党中央所号召的大联合，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把所有的组织联合统一起来。大联合应该依靠造反派为领导力量来建立。此外，大联合只有通过斗争才可以完成而不是通过折衷的方式来达到。大联合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这意味着造反派应该吞并保守派。造反派应该“构成大联合的核心”，并且“教育保守派，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些人甚至提出这样的口号，“红旗派（广州地区的造反派）是党的最高灵魂”，或“红旗造反派必须发扬光大”。

不管怎么样，造反派抱怨说，在反派性运动中，很多人故意忽略问题的阶级本质，把对派性的批判转变为反对造反派的运动。很多造反派揭露了在“批判派性”的名义下，他们如何受到攻击的遭遇。例如，一份关于一个大学生如何卷入他家乡的运动的调查报告就提供了有关这一类问题的有力证据。赖光明，华南工学院的一位学生，同时也是红旗派的成员，5月22日紫金县的革命委员会向全县发了一个通知，“敦促赖光明和其他所有外地学生返回他们的学校”，同月23日，华南工学院的革命委员会收到紫金县革命委员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说，赖光明从事严重的反革命活动，要求学院把他召回学校。学院革命委员会在省革命委员会的批准下派出了一个特别小组去调查这一事件。调查报告是这个特别小组十一天调查的结果汇报。

根据这份报告，赖光明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回乡探家，他动员了当地的学生起来造反，他对当地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在此之前曾经受到当地两大派双方的承认。但自从反派性运动开始，赖光明的弟弟受到批斗。赖光明回乡探家，由此他发现当地非常严重的右倾回潮问题。因此赖光明站出来参加了当地反右倾回潮的斗争。

报告继续描述了右倾回潮的范围和深度。报告解释，“平山头”意味着完全解散群众组织，紫金县革命委员会从一月份开始解散这些组织。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声称，决定“要不要解散这些组织是革命和保守的分界线，是紧跟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标志”。报告批评大联合只是表面上的自愿联合行动。很多人眼含热泪交出他们组织的旗帜和臂章。报告指责说，这样的大联合“只是对阶级敌人有好处，因为他们想要反攻倒算，复辟回潮”，因而，赖光明支持重组群众组织的行动，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报告

接着说，因为“不是这样做的话，紫金县的文化大革命将半途而废。”

由于对批判派性主义的这种错误理解，其结果使坚持革命原则的造反派变成了斗争的对象。例如，在学习班里，造反派的头头被强迫做自我检查。假如他们批评自己的组织，把他们的组织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就被赞扬为好同志。假如他们说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就会被指责为有“严重的派性主义”，因而不允许参加革命委员会。报告说：

> 他们（指县革命委员会）在批判派性斗争中，没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把所有的讲话和活动都贴上了“派性主义”的标签。他们随意地用“派性主义”的帽子来威胁造反派。造反派贴的大字报被指控为“派性主义发作”，“黑传单”。假如几个造反派凑到一起，他们就会被指责“开阴谋会议”，或“进行派性活动”。造反派势力强大的单位被称为有严重派性问题的地方。县里全部十二所中学被认为是有“严重派性主义”的地方。

这份报告随后辩论，“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能逃避派性的影响。每个人不是属于这一派就是属于那一派。”“那些总是以‘派性主义’的帽子威胁别人的人”并不是他们就没有派性。相反，这些人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和右倾保守派性主义。

把这些事例，经验集中起来，造反派指出当时攻击造反派的现象，实际上是当时阶级斗争新特点的反应。阶级敌人（指走资派和他们的追随者）把造反派作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因为造反派是今天社会里“最有活力，最积极，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因而造反派自豪地声称，他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社会基础”。[81]

一些造反派因而反对解散群众组织。他们强调说，只有造反派在运动中占据了优势才可以考虑解散群众组织。在这些条件和情况被考虑之前，允许所有各派联合统一就意味着放弃了革命的原则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这些造反派指出，不管如何，在这一点上，造反派组织仍然需要时间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领导能力。因而，继续保持他们组织的存在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些激进造反派因而谴责解散群众组织的行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是“保守派势力用和平方式向造反派进攻”。强调这一点，造反派声称他们的组织象征着一种“权力”，“无产阶级的权力”，“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权力”。同样地，“没有任何人可以有权利剥夺他”。因此，与解散他们的组织相反，造反派应该坚定地

---

81 《广印红旗》1968年3月，见*RGP*，9：2755-8；英文翻译见*Mehnert*，82-100.

保卫他们自己，这正是“省无联”极力提倡的立场和态度。

来自于造反派的另一个强烈抗议，是对大范围内大批的老干部官复原职的关注。“省无联”非常强调这一点。造反派清楚地意识到，干部的问题将是建立新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问题。当时有不少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报告。

由“汕头‘二七’红旗革命造反者赴广州联合请愿团”写的一份报告，控诉了“县里、市里、区里的走资派完整无缺全部回到他们的职位。”临时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军管会在执行省革命委员会“指示”的名义下，帮助完成这一权力移交过程。为了使这些干部官复原职，军管会甚至派部队到揭阳县解救那些被造反派组织关押起来的干部，并公开地保护他们。

造反派感到非常愤怒，因为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干部现在由新的革命委员会来保护，而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却受到迫害。一份报告公布了一份对广州一些工厂里的严重情况的详细调查。它公布了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如何遭到骇人听闻攻击的事实。它列举了这些干部如何成为批判、攻击、绑架和毒打对象的例子。

报告同时注意到，那些曾经被造反派攻击过的干部变得越来越积极。他们要不仅做肤浅的自我检讨，要不公开地否认他们个人所犯的任何错误。广州氮肥厂的一个副厂长甚至跑到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报复曾经揭露过他的人。一些干部公开地对造反派说“你们做的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或者“除非你做自我检讨，不然我不会参加三结合”，或“不参加三结合没有关系，我是不会作自我检讨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省份。一份广东报纸曾报道在湖南省出现了“地下革命委员会”，在湖南省岳阳县，16个县干部里就有14个重返他们的原来职位。另一份广州报纸报道，在广西省，很多革命委员会是在镇压了造反派之后马上建立起来的。在湖南省，一些保守派甚至公开要求替刘少奇，彭德怀平反。一分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来的报道，陈述了保守派和老干部如何在新革命委员会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从这些抱怨和抗议里，我们可以看到“省无联”积极支持和赞扬的精神，正是“省无联”提出，要求干部中的大多数靠边站。这表明了广州的造反派同样相信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把共产党的老干部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阶级来推翻。像“省无联”一样，广州的造反派非常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很明显的，这是他们对当时官方意识形

态不满意的一种表现方式。与“省无联”一样，广州的造反派非常强调阶级分析。他们要求用阶级分析来看待派性活动，大联合，新的革命委员会，甚至来自于毛泽东中央的指示。在这些要求的背后，暗含着的是极端激进的思想。例如，广州的一些造反派公开地建议“必须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紧跟’”，“紧跟”是当时官方媒体强烈鼓吹的一个口号，要求人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当造反派要求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这些号召时，这几乎是公开地向毛泽东的中央提出了挑战。通过要求进行阶级分析，造反派提出了一个新的行动原则。现在，革命者要服从的不是某个共产党员或者是某个党支部，不是党的纪律原则或者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者是“毛泽东思想”。现在一个真正革命者所要坚持的原则，不再是外部施加给他的原则，而是真正根据革命者本身对革命的理解和经历所得出的原则。那就是说，这种原则可以被证明适合于革命者的长远利益。当然，造反派相信，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同样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理解是革命原则的标准。总之，现在是由造反派来决定任何原则的性质，而不是用任何原则来决定造反派的性质。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激进思想。它标志着造反派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一旦造反派认为他们自己应该是革命原则的根据，他们就不再隶属于任何的权威，他们不再被任何原则所限制。从这些变化来看，造反派表明了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政治上的学徒阶段，他们已经开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时，一些造反派终于变成了真正的造反派。

这些激进思想意识形态变化的背后，是对新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作的直接反应。这些造反派相信，作为造反派，他们是真正的群众组织，因而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的对立面，是共产党的干部和被这些干部所操纵的保守派。而这正是他们主张进行阶级分析背后的真正目的。造反派相信作为特权阶层的共产党干部是革命的对象，而造反派应该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造反派反对批判派性运动，并认为，大范围内恢复老干部原来的职位是“右倾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标志。这也是为什么造反派反对由当时官方媒体大力提倡的“反对个人主义”的口号。广州地区的造反派争辩说，一个真正无私的革命者，不应该只顾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便取悦上级领导。一个真正无私的革命者应该积极投身到真正的阶级斗争中。那就是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

该向已经形成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造反。同样的，他们不应该批评他们自己，而应该替自己辩护。在反对特权阶层的同时，这些造反派支持人民群众的权威。他们声称人民应该有权力对政治决定作最后的发言。他们要求群众“有（政治）帽子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可以对任何他们不满意的干部解除职务。因而，他们要求“广泛的民主政治”，要求把共产党干部的权力交还给人民。这些要求很明显类同于“省无联”“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中国的人民的公社”的纲要，有着与反对共产党干部相同的共同目的。

由于造反派已经把共产党的干部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来看待，而这一阶层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要推翻的，造反派当然会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远离它要完成的既定目标。这正是“省无联”的基本立场，“省无联”是非常强调当时文化大革命所处的阶段，正是这场运动的开始，当时的任务是要把运动向更加激进的方向推进。为了这个共同目的，广州的造反派公开地声称当时的状况是一种“右倾回潮”。他们认为，新的革命委员会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队”，它“应该被废除”。与“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相呼应，广州的造反派提出了“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并且要求“广州应该重新出现一次大震动”。由于全国的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的晚期都遭遇着这样一种共同危机，因而，类似的要求和呼吁充满了大多数造反派的大报、小报和文章的版面，他们都要求“继续革命”。

广州地区造反派的著述文章里所强调的主题，非常清楚地与“省无联”的著述所表述的思想意识形态很相像。我的最后分析认为，这两组造反派的思想理论都来源于同一理论前提，也就是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 * *

假如我们比较文化大革命晚期与文化大革命早期的主要思想意识流派，可以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最狂热地推崇阶级斗争理论的是共产党的干部。出身好的人最强调的是大力加强阶级斗争，党员和团员真诚地要求应用“阶级分析”，保守派最强烈支持的也是应用阶级斗争理论。

与此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晚期，是造反派最支持阶级斗争理论，是群众在现存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受最大的压迫。是来自于不同出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比共产党的干部更要求进行“阶级分析”。是那些受压制的人要求“继续革命”。

对这一看来令人迷惑不解变化的解释，实际上非常简单。它贯穿在我的论文中，那就是——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占主导的阶级斗争理论，我把它作为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文化大革命晚期被造反派所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我把它作为新的阶级斗争理论。旧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旧的剥削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则把新的共产党干部作为革命的主要敌人。这两种阶级斗争理论在性质上和作用上都非常不同，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当时的国家机器用来动员人民进行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则是造反派改革国家机器中使用最多的理论原则。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国的诞生，她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的民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变成了这场民主运动中的主导思想理论，在下一章里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些变化。

第五章

为民主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后的阶级理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以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早期的民主运动时期，大规模的非官方报纸刊物和大字报重新出现在中国的街头。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民运积极分子，大部分是以前的造反派学生和造反派青年工人。他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这一代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品相比较，民运期间这些刊物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多样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部分作品主要是从官方刊物抄袭而来，醒目地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几乎出现在这些著述的每一页，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很简短，他们的观点和论述也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述几乎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模式来解释。

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早期民主运动期间的著述里，这些特点已经不再存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政治评论，一般来说比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前辈们的作品，不仅更为详尽和更为复杂，同时还加入了很多纯文学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小说、诗歌、文学评论、舞台剧和电影剧本都很繁荣。

这些作品和著述的内容和兴趣的多样性更是不同以往。除了专门集中在政治方面，这些作品和著述的主体可谓包罗万丈，它们包括了数学，有关“UFO”的报告， 有关人民圣殿党集体自杀的报告，有关石英表的介绍，等等。在政治讨论方面，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再是衡量政治的唯一标准：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在这些作品中比比皆是，同时还可以发现的是孙中山的摘录，世界人权宣言，罗丹对艺术的评论，甚至哈勃政治思想的大段介绍。

姑且不论这些多样性，我将在下面的篇章里确定一些从这些作品和著述里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倾向。我将在这里讨论当时最认真辩论的四个问题。他们是：要求民主，阶级斗争理论，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我不准备对民主运

动时期出现的所有著作文献作全面地回顾。在考察这些文献资料中涉及的以上这四个主要问题时，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民运积极分子中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和这些理论对他们所起的影响方面。我的研究分析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这些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来自于已经在公开场合失去了他们显赫地位的残存有产阶级的威胁。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则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的新的剥削阶级的威胁。这一点继续被大多数民运积极分子所支持。这一理论，为当时要求民主的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民主政治因而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政治反对特权阶层的过程。然而，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一点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民运显得很孤立的现象，同时也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原因的解释透出另一亮点。除了其他众多因素之外，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不完全。

民主的要求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民主运动呼声最高的要求，如这场运动所冠名的，当然是民主的要求。第一篇有关这一主题，最重要的文章当属李一哲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正如文章的标题所宣称的，大字报直接提出了民主的要求。李一哲小组的三个成员都是从前的造反派学生。大字报最先出现在1974年的广州市中心街头，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后来被重版在1979年的一份非官方刊物上。这份大字报因而对了解从前的造反派学生，他们从文化大革命到民主运动期间的思想轨迹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它还说明了这一过程如何导致了中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

与其他民运作品和著述相比，李一哲大字报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它所强调的阶级分析。它的其他所有观点都基于这样一个结论，即新的剥削阶级已经在中国形成，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存的最大威胁。这一主张很明显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新阶级斗争理论的直接反映。

大字报以整段引用毛泽东著名的阶级关系陈述开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仍

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被共产党奉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政治路线。为什么李一哲感到他们必须要“全文”引用这一著名的陈述呢？是什么原因使这一引文在这里特别的意义深远呢？唯一的解释当然是李一哲在他们的大字报里声称的：

> 按照（党的）基本路线所警告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因而，大字报坚决否认了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旧的阶级划分的解释。它讥讽了那些声称相信今后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在我们的社会里仍然只存在着旧的阶级敌人、因而支持旧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大字报提出“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假如人们同意毛泽东的主张，那么在社会主义很长的历史阶段里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这一论点最关键的要素是它所立足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的新阶级”这一论点的提出，只是对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陈述的简单逻辑推理而已，然而，对毛泽东的信徒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通过这样的推理，大字报的作者们没有给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留有任何余地。

一旦新阶级的出现被大众所认同，大字报的作者们把主要目标转到确定由这一新阶级衍生出来的新的占有形式，和如何处理这些新问题上。文中指出：

>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原则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很明显，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懂得如何看待这种占有形式，因为它着眼的是旧的阶级敌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的新的资产阶级不一定是，也不主要是从前的有产阶级。提高集体公有制的水平，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新的剥削阶级控制了公有财产。在同一意义上，鼓励道德修养，斗私批修和努力工作只能是简单地帮助了新的资产阶级。巩固

党的领导甚至更为有害，因为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对于李一哲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重大矛盾”是“不可动摇党的中央领导权”的同时，要把“力量集中在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解决这一矛盾，要求一种与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同的新的方法。因而，李一哲指出，阶级斗争的功用应该直接对准那些新的特权阶层，而不是旧的有产阶级。因而，国家应该限制“新贵”和“新生资产阶级”所享受的特权，惩罚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僚”。

最重要的是，民主与法制对解决“重大矛盾”至关紧要，因为他们为群众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因而，大字报的要求主要是保证“所有的民主权力都应当真正地属于群众”，“群众革命管理的权力应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上”。

李一哲的大字报在这场民主运动中宣布了对民主的要求。这场运动的一些思想意识形态已经出现。首先，大字报呼吁的不是西方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它预设了公共所有权和推行平均主义。第二，大字报的讨论主要停留在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激进解释上，这一解释很明显来自于文化大革命的“新思潮”。第三，处理阶级斗争新形式的需要——也就是与新的特权阶级的斗争——直接导致了民主的要求。民主方法被推定为与官僚政治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那就是，李一哲呼吁的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人民的权力，他在与走资派和党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应该受到保护”。对于李一哲来说，民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李一哲的大字报不仅证实了文化大革命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也证明了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民主要求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或许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民主概念的最大特点正是它与反官僚政治情绪之间的牢固关系。在那些非官方出版物里，几乎所有的民主要求都与反对官僚政治阶级的要求同时出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民主运动因而也是一场反官僚政治的运动。这场运动没有探索一种稳定的，基于公民权力的抽象的民主概念。民主的要求只是一种反对官僚政治阶级的措施，它的主要意义也主要反映在这一点上。

在一份非官方的主要刊物《四五论坛》的编者文章中，就对严格坚持旧的阶级路线提出争议。文章坚决反驳当时官方公布的阶级分裂已经从中国消失的说法，文章主张官

僚政治阶级仍然存在，这一阶级产生的根源在于当时的劳动分工。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指出，劳动分工产生了一个阶级，他从直接参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在中国，（旧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特别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但与其他劳动阶级相对立的特权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没有消失。社会划分的原则继续以新的形式起作用。因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与管理干部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生产方式，一种官僚政治的形式已经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官僚主义者已经形成了一个阶层或一个阶级。

文章把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的起义看作“反抗官僚独裁政治的群众运动”。文章还把著名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作为“打破世袭阶级（资产阶级）专有权力”的尝试。文章接着指出，同样地，中国民主运动的出现是在所必然，因为“在一个带有严重官僚政治弊端，又有严密组织的社会里，可以与官僚政治倾向自由抗衡的主要力量，是那些自由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人民与官僚政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那么深，以至来自湖南省的民运分子和理论家陈尔晋，曾经提出“对使用暴力推翻官僚主义者和新贵的统治，加以认真考虑”。

陈尔晋这里所说的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它说明了官僚政治阶级的出现，如何导致了民主要求的出现。陈尔晋的文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同凡响之处，不仅是文章的长篇幅和相当老练的辩论，同时还因为文章撰写的时间。如李一哲的大字报，陈尔晋的文章实际上是在民运之前就完成了。与李一哲的大字报强调“事实”不一样，陈尔晋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理论。与李一哲的大字报几乎只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不一样，陈尔晋的文章引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述。他还介绍了从西方社会和历史学来的经验教训。陈尔晋提出的社会解决方案也与李一哲的大字报所期望的方法很不一样。姑且不论这些不同之处，陈尔晋的文章与李一哲的大字报在一个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集中针对中国社会里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他们都从民主政治入手来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陈尔晋的分析从讨论苏联的制度开始，他总结说，修正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方式的所有权被特权阶级所垄断，而组成这一阶级的正是官僚主义者。这一阶级疯狂地把政治，经济以及组织机构进行高度集权，以便一小部分人可以掌握权力。而这一制度，如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神化党都助长了这种势力的增长。陈尔晋指出，

权力已经腐败："从一开始，这种现存的垄断制度，就对一小部分掌权者施加极为有力的腐蚀性影响"。

在这一点上，陈尔晋的结论很明显地与李一哲的大字报类似，他们都在思考强化党的领导权与反对党内修正主义斗争之间的矛盾。陈尔晋的创新之处是，他建议对共产党制度进行一场改革，而李一哲的大字报则呼吁直接加强人民的权力。

陈尔晋的解决方案，以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权力结构的分析为基础，他指出，国家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高度集权（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全部发生在共产党内，在共产党的完全控制之下。另外，其他政治组织合法地与共产党争夺权力的可能性早就被限制了，因此，不可避免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只能集中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内。实际的解决方法，是在党内提供制度上的机会来进行公开竞争。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他建议一个双重的共产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两党的组织领导将把他们的原则观点体现在他们的著述里，人民将自由地根据他们的愿望选择离开一党而加入另一党，而不受任何的责难。

他建议的这个两党制度将提供一个理性的论坛，让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政治团体公平竞争。两党制度的起源可以从资产阶级的民主里找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政党除了对资产阶级行使权力之外，反之也可以作为替他服务的工具。双重共产党制度将为无产阶级扮演同样的角色。"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度是一种历史产物；它可以调动整个统治阶级的资源和提高它的效率，它可以相互制约，同时监督统治阶级本身，因而，它限制了特权，限制了那些在公共机构里膨胀的官僚政治。"[1]

陈尔晋的解决方法很明显与李一哲的不一样。李一哲支持人民的民主，而陈尔晋支持党内的民主。但是，他们所要求的目的基本是相同的：他们都抵制现存的政治制度，他们都要求打破一党专制，他们都认为民主是限制新生特权阶级的唯一有效方法。

然而，民运期间关于民主的大部分讨论，并不是专门或明确地针对官僚政治阶级问题，尽管，一般来说很容易把它当作民主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民运积极分子如何把官僚政治阶级问题与民主要求联系起来的深度和广度，而是他们对大权在握的人所造成的潜在威胁的觉察程度。民主的一条至关重要标准已经从这里开始出现了。

---

1 他们是李正天、陈一杨和王希哲。

在民运期间的非官方刊物上，象“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政治阶级”，“官僚主义者”，“特权阶级”，和“特权阶层”这样的名词到处可见，并且含混不清。这些名词通常指那些不好的干部，但他们同时也代表了整个干部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专门对这些名词作定义和区分。这恰好与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相反，在那一阶段，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区分哪个干部属于“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文革期间使用的这些含糊名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认识上的明确区分。缺乏好干部与坏干部之间的区分，恰恰传达了一个非常革命的概念：干部，无论好的或者坏的，对公共利益都有潜在威胁。民主的作用就是要排除这些潜在的威胁。通过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统治政权、干部、特别是制造官僚政治阶级的制度，反官僚政治的呼声导致了民主的呐喊。这种认识上的知觉是中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有民主要求里的基本价值。

事实上，号召民主本身表现出来的显然是一种异端思想，这种思想完全背离了官方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这两种口号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他们所针对的目标：后者针对所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人，包括旧的有产阶级；前者把他们的斗争矛头专门指向来自上层的问题，那就是，干部阶层、当时的制度、特别是党组织。

这一区别无疑被很多民运积极分子所理会。他们所认识的民主是“管理干部的法则”。他们指出，在中国，劳动阶级和人民的主权要求只是一纸空文。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这种专政当然明正言顺地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民运积极分子讥讽那种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可以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的神话。一位作者愤怒地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我们将被迫承认我们是‘坏分子’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即使我们只是简单地贴了一张小字报”。

有关民主的主要讨论集中在党的领导权方面。一篇文章建议，巩固共产党领导权的正确方法是确保共产党的正确性，而不应该强调群众如何服从这个党。另一篇文章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出疑问。它指出，问题是那些负责集中的人实际上是最后作决定的人。因而，民主的花言巧语在这里没有任何实质区别。

一篇题为《对‘支持党的领导’质疑》的文章相当全面地考察了这个问题。[2] 文章指

出，党的作用应该是领导而不是统治。这里的区别是，前者把党放在群众的监督底下，而后者则把党放到群众之上。为了保证群众对党的监督，所有的干部都必须由群众直接选举。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最后应该被逐渐削弱。中国政府应该从由党领导的国家，改变成为由劳动人民直接管理的国家。然而，一些党的干部出自于个人利益，坚持长期保留党员里的“高级阶层”，因为他们需要保持他们的特别利益。假如这样继续下去，文章指出，终有一天“‘高级阶层’将变成‘官僚主义者’和‘贵族阶层’”。

在关于民主的讨论里，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当反对官僚主义的呼声导致了对民主的要求时，这些讨论往往特别强调官僚主义的阶级性质，它经常与民主的基本要求有一个比较接近的内部联系，因为他们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个别问题导向整个制度，如李一哲的大字报、陈尔晋的文章和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很多其它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两篇登载在《北京之春》上鲁明写的文章。

鲁明对官僚主义者和官僚制度作了一个区分。在引用了马克思的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之后，接着指出，简单地抛开旧的官僚主义者和旧的国家机器，离实现马克思的理论思想还很远。要达到马克思提出的目标，革命人民必须废除标准军队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不然的话，与这些制度和机构相关的问题将还会重新出现。鲁明承认，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能马上废除标准军队制度。然而，假如不废除官僚政治制度，那就与马克思主义根本背道而驰了。根据鲁明，官僚政治制度主要由任命制和等级制所支持，其结果是人民失去了对干部和生产方式的监督和管理权力，因为他们都被共产党干部把持了。正如文章的标题所建议的，解决的办法是逐步废除官僚政治制度，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民主制度。

巴黎公社是当时大部分民运积极分子心目中的民主基本模式。人民可以从这里再次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这一阶段，对巴黎公社模式的引用，更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解决官僚政治问题的手段。由民运积极分子提出来的三个最著名的措施是：选举干部；检查制度；工人和干部平均工资，这些很明显地适合解决官僚政治问题的目的。围绕这一主题的讨论比比皆是。其中以一篇署名“北京铁路工人”的文章最有代表性。

文章认为中国的国家制度最初是模仿苏联的模式，同样的，“国家的组织形式本

2 陈（Chan），罗深（Rosen），安格（Unger），37.

身，是造成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的原因。”作者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可怕日子”，当九亿中国人民面对“四人帮”的淫威无能为力的时候，应用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将有效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器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

当然，反官僚主义并不是民主要求的唯一原因。正如我在这一章的开头提到的，民运著述的最显著特点是它数量之多，关于民主的讨论同样也不例外。很多新思想和新理论，例如公民的概念、人权或南斯拉夫的经验等等，都是通过这些文章和著述被介绍给民主战士，这方面恐怕没有人比魏京生更为出名了，魏京生不仅支持西方的民主，他同时还公开地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

然而，仔细研读魏京生的著述显示，他使用的如平等、人权、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在他的民主讨论中只有一些边缘性的意义。对官僚机构的批评比那些抽象的概念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反而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对这些概念实在太不熟悉了。

首先，在魏京生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里，他认为官僚阶级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是由“贵族和奴仆”组成的。很明显，魏京生喜欢用“贵族”一词来强调他所认为的那些中国官僚主义者的封建特征。因而他相信，如何维持民主社会次序的问题应该“由人民来解决”，而“不是‘特权贵族’的事情”。在反对当时政府干涉群众的示威游行时，魏京生指责，在中国，宪法“只属于少数几个官僚主义者”。他毫不犹豫地采用官方“新生的资产阶级基础”这样的名词来形容“四人帮”。所有这些都表明了，魏京生指出官僚阶级概念的根基，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根本理解，而这与他的民主要求有很大的联系。

第二，像大多数的民运积极分子，魏京生主要把民主当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合理方式。他的观点可以从《探索》的创刊词里得到清楚的表述，他当时是《探索》的主编。文章说：

> 我们的运动已经超出了文化大革命反官僚主义运动，超出了以西单民主墙为中心的反专制运动。我们反对任何支持官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理论。对于那些不准备给别人自由的人，我们将不给予他们在我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权利。

第三，如其他的民运积极分子，魏京生所坚持的民主，意味着“所有的权力都应该交由劳动人民来掌握”。他的基本观点，保留了巴黎公社的原则——选举政府官员和检查

制度——加上言论自由。

尽管他以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现，魏京生的民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运动的主流是一致的，而当时的民主运动与批判官僚政治阶级有着紧密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联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民主运动，对魏京生和其它大部分民运积极分子来说，保留着反官僚政治统治的民主方向。

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

尽管民主的题目在民主运动的作品和著述里占了绝对的多数，但其中仍然存在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专门关心。然而，与所有的民运积极分子都支持民主的要求不一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有些人在他们的观点里还继续运用阶级斗争的概念，但很多人已经简单地把它抛弃了。我将在这里分析这两种趋势，从而发现他们的差异和可能的相同之处。

对于那些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作品，第一点最突出的，人们不会错过的是他们绝对不支持旧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情况大为相反，那时的主要思想，几乎全都受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而民运分子所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仅在他们的观点立场上与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划上了清楚的界限，同时还尖锐地批评了旧阶级斗争理论的险恶用心和严重后果。例如，陈尔晋就指出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旧解释是“社会法西斯政治”，它被那些当权者所利用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前强调阶级斗争是为了转移社会对当时现状的注意力”。《北京之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经验告诉我们，夸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与声称危险的不存在，通常都是用来掩盖真正危险的办法。”，“新贵族比旧贵族危险一百倍”，《北京之春》上的另一篇文章说。

民运人士所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出现新有产阶级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在上文，我已经对新阶级斗争理论作过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李一哲简单地用毛泽东的语录来求证他的讨论不一样的，现在提倡新阶级斗争理论的人试图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证明新有产阶级的存在。一篇题为《阶级出身与社会主义社会

里主要矛盾的初步讨论》文章就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例子。

文章以主张阶级的含意就是等级作为开头，然后，根据中文词义的起源，作者指出这两个词很明显地，是指不同的社会地位或不同的社会状况。文章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生产方式的私有制是阶级产生的唯一经济基础来源。这样的一种推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不再有效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废除生产方式的私有制。文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要给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生阶级的起源定义。

文章然后追索到人类社会最早的历史和最近的发展。文章从这一概括分析中得出结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对经营管理的需求，对经营管理的这种需求又引起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第一次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的双重性质是，一方面，这是对管理和控制日益增长的复杂生产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它对由于行使领导权力而可能出现的剥削，提供了可能性。文章接着指出，社会分工的这种两重性没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出现。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旧的有产阶级以后，它变成了决定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以上这些思想，文章通过这样的语言来表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公共事务的社会主义化和经营管理的相对垄断之间”。在这里，作者回应了陈尔晋的观点，它实际上触动了一个关于官僚机构功能的合理性，以及它与民主原则之间的矛盾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在民主运动中，自觉意识到官僚机构的必要性，是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然而，作者没有任何意图，形成韦伯式的官僚机构概念，同时作者也不愿意追随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或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去探究精英和现代民主问题。很明显的，作者深深地陷于官僚机构或官僚主义者这些概念的消极含义的影响中。他们很明显地带着一种清晰的实际目的来研究这一问题。作者关心的显然不是合理的官僚机构存在的潜在问题，而是滥用权力的直接危险。作者因而建议，评判和管理官员，不应该根据他们在社会上所占有的职位，而应该把他们的“道德、能力和工作态度”与他们的职位分开，根据前者对他们做评价。作者然后建议，那些履行管理职责的干部属于“劳动者阶级的领导阶层”，而那些利用他们的领导地位为自己谋利益的干部则属于“官僚政治阶级”。

这样的讨论在民运作品和著述中并不是很有代表性，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很多混乱和不一致。然而，尽管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它思想上的突破仍然是很明显的，它显然界定了

管理阶层里会出现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同时也隐约看到了民主的解决办法。这两点组成了当时支持阶级斗争理论那部分人的共同标准。

这部分人所支持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被认为是新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提倡民主，坚决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它的实践。正如上面提到的，文章所指出的，不论是过去我们应用过的“政治运动”，还是“社会革命”都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因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官僚政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而过去的所有运动或革命都是由领导者控制的，只有民主和法制可以限制官僚主义者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斗争的矛头应该对准上层，共产党的上层领导而不是人民。这是为什么一旦应用了阶级的概念，就不再要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不再提出“红色恐怖”这样的口号，就不再提出要求建立“贫农下中农的绝对权威”这一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流行的口号。

然而，仍然有少数几个民主主义作者还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概念。这看似与民主的要求相对立，但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类观点的真正含义，他们同样也要求民主。最好的例子是李一哲大字报三人写作小组里的其中一位，王希哲写的一篇题为《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斗争》的长文，通过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王希哲希望打破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垄断。他用有力的事实，展示了共产党如何在大范围内取消了人民的管理，和这一过程如何助长了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化。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意味着抵制共产党的专政和个人领导的独裁政治。对于他来说，这是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他建议一个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政府，因此，他所建议的不是专政，而是民主。

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的国家”概念》的文章是这一类里很有意思的一篇。整篇文章，从它的标题到它的内容和用语，几乎都是从毛泽东时期的官方文章那里复制而来，文章的讨论中心，是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质。它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手段。“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国家不属于全体人民。”此外，文章非常强调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必要性。所有的讨论都用不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来表述。

假如我们没有读同一作者后来写的文章，恐怕我们对这篇文章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会摸不着头脑。[3] 这位作者真正要讨论的是，尽管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

一个阶级的工具，但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国家，因而它不会压迫另一个阶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摧毁国家机器的开始。所以，作者在这里真正要找的是给所有人的广泛民主。我们可以发现，民运里对阶级斗争的支持几乎总是导致对民主的要求。

假如我们说支持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大多一致支持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民主的话，而那些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在抵制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方面，又与前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一阵线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旧的有产阶级已经被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基本矛盾。正如《求实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明确宣布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年之后，靠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除了台湾）。[4] 由此为基础，讨论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而主要是反对把阶级的概念套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

《关于阶级和国家的一些问题》是一篇由徐瑞良写的值得一读的文章。据他所说，他思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有很长一段时期，直到1976年，他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无阶级的社会。在此之前，他曾经提出过“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简单地消除阶级，而是要清除产生阶级的社会根源”这样的理论。他相信过去的所有错误都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一词的错误理解，人们以前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根据这一假设，通过“继续革命”这一重要理论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好像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是错误的，徐瑞良接着指出，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由于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社会，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没有阶级，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只是在那一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然而，徐瑞良没有排除新的剥削阶级重新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他相信这种可能性已经在苏联出现了。徐瑞良接着指出，苏联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意识到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消失，因而一味继续强化国家机器，这样的恶果是把一个官僚政治阶级带进了这个无阶级社会。

勿庸至言，徐瑞良的观点可能是幼稚和相互矛盾的，但他很显然在抛弃阶级斗争理论

3 同上注，77-78，81。
4 同上注，77，80。

的讨论中有重要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它显示了这一类讨论的主要目的不是否定新的阶级的存在。正如我们从徐瑞良的文章里看到的，他没有丝毫犹豫地承认新的官僚政治阶级的出现。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最后的分析显示，这一时期两种不同倾向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在本质上并没有相互排斥。

此外，阶级斗争理论的两种不同倾向在支持民主这一点上，他们的共同努力是完全一致的。一些人应用新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要求民主，另一些人则通过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声张民主。在上面的文章里，徐瑞良指出，主张阶级存在的长期性，其实是想提出保存特权和独裁政治的理论，他的这一观点在他进一步对一个当时的诉讼案分析里，表达得很清楚。[5]

他的分析揭露了“持有特权的人”如何利用“所谓法律的‘阶级性’”进行违法活动。 在这个例子里，一个军队干部非法占用了一处豪华巨大的私人房产，在他的辩护词里，这位干部反复强调他是“共产党员”，“老红军”，他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一个“老红军的家庭”。另一方面，这位干部不断地提醒法庭，对方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因而，他指责这样的诉讼是“阶级报复”。文章的作者指出，这样的法庭辩论必须受到批判，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

对很多人来说，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失，只是对一种更广泛的民主的简单辩论。《四五论坛》上的一篇题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缓和还是越来越严重？》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文章的作者随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阶级斗争应该变得更加缓和，不然的话，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怎样才可以形成呢？因而，文章指出“既然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缓和，那么民主的程度就应该越来越高。”

追随同一趋势，另一篇文章公开地要求《在企业单位取消地方党组织的管理权》。[6]围绕着这一标题，文章指出，既然党组织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阶级斗争的慢慢消亡，党的领导也应该慢慢地取消，这一过程首先应该从地方开始。文章警告说，假如共产党不能自动让出权力，“阶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会重新出现”，由于社会会因此失去

5 《四五论坛》1979年12月，见*DXKJF*，10：1-17。
6 同上注，6。

对共产党的控制，一旦野心家和官僚主义者获取了国家的权力，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一个新阶级将会产生”。

《新民主浪潮》上的一篇编者文章以它的标题提出了另一个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全体人民的政党》。文章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来自于很多不同的阶级。因此，共产党曾经一度代表工人和贫下中农利益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所采用的原则，而不是组成这个党的成员的阶级属性。既然共产党不代表任何真正的阶级，假如她要寻找一种阶级性质的话，那么就只能是他那三千万党员里的特权阶级。假如共产党能够有意识地把阶级的政党改变为全体人民的政党，那将会消除这一类的“阶级偏见”，那么就可以避免重复那些假的“阶级斗争”，就可以集中力量在生产发展上。

回顾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提示：两种不同倾向的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的不同，主要是它外表的表现形式而已。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非常清楚地，这两种不同倾向的理论在两个关键论点上非常一致：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支持民主。这一点看来也被某些民运积极分子自己所意识，《人民之路》评论员的一篇文章就表达了，对为什么有些人全盘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评论员在文中重提，文化大革命期间，只要提到“阶级斗争”都会在人们中间引起恐慌，“‘阶级斗争’已经成为了灾难的代名词”清除了林彪和揪出了四人帮之后，人们相信“阶级斗争”将永远结束了，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评论员接着指出，但是愿望是不能取代现实的，现实中，人们仍然感到官僚政治制度的压力。“日常生活里，很显然存在着对立关系，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阶级的特权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样的理解揭示了为什么当时两种不同倾向的阶级斗争理论之间没有根本冲突的原因。所有的民运积极分子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继续支持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重新评价

来自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民主运动的一股很强烈呼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这是我要在这里进行讨论的第三个主题。

当所有的人都一致反对官方的旧版本，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时，他们反对的文化大革命所使用的形式却五花八门，因此，只注意这种外部倾向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尽管大部分人都相当真诚地支持来自当时官方媒体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一说，但少数人仍然坚持他们的不同意见。这部分人需要确定文化大革命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根据前面关于两种不同倾向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对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的这两种明显不同意见，恐怕也同样不是绝对的针锋相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人，把这些讨论看作是一场应用旧阶级斗争理论的运动，因而，他们要否定的是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些试图肯定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人，则从这场运动中发现了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一部分人所要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反官僚政治的方面，因而，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持了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从控诉和揭露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辜群众受迫害的强烈呼声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找到了他们的支点。有关这样的主题，几乎占据了当时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文学作品的版面。这些文学作品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这一称谓反映了当时很多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的共同主题。有这样一篇故事，讲的是几个好朋友和恋人，他们如何因为真诚的不同信仰而互相残杀。[7] 同时还有不少故事表达了一些从前的学生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的老师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表示的深深懊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恐怖的大屠杀被报道出来。例如，大兴县的大屠杀第一次被公开揭露出来。那场骇人听闻的广西大屠杀也被公诸于众。这些报告、小说里的无辜群众很明显是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受害者。那些小说、故事力图揭露的是过分简单地应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诞无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其实是谴责旧阶级斗争理论的可怕后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谴责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无辜群众的打击迫害同时也包括那些老干部。事实上，迫害“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严重罪行遭到责难，这些例子在当时官方和非官方刊物上随处可见。不少民运积极分子事实上提出，重新起用一些“可敬、可爱的领导同志”要求，而这些领导同志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他们原来的领导岗位被清除下去的人。正如我在上一章曾经讨论过的一样，这样的要求与文化大革命晚期造反派的要求完全相反。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指责和要求直

7 同上注，11。

接导致了对“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其中也包括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这些批判通常把这些党的老干部描写成文化大革命最无辜的受害者，在他们的笔下，与此关联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文革期间出现的流毒最大的理论。

全面理解这种混乱现象的关键，再一次表明，在于对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当时所谓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指的是旧和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左倾阶级斗争理论被认为应该对无数普通老百姓所受的迫害负责，这些老百姓里很多人是旧剥削阶级的成员或者是他们的亲戚，同时也包括那些党的老干部。由这一理论导致的可怕后果可以追索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旧的剥削阶级成员是运动的主要对象；同时与此有关联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党和军队对抗的活动，在这些活动里，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在所有这些不同事件都混淆在一起的情况下，所谓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很容易就变成了人们同仇敌忾的对象。这种感情因而为“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因而也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这样一来，通过更加深入地分析，找出“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这种共同要求下的差异，和不同的变化就显得非常重要。

首先，“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被一般人所接受这一事实，已从民运积极分子理论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混乱可见一斑。这表明了这些民运积极分子不是来自于同一意识形态阵营，他们政治上的意识也处于不同的水平。尽管他们都要求民主，但实际上这些民主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一些人需要废除当时的政治、甚至经济制度；一些人要求的是人民大众对国家的管理；少数人主要关心的是把不好的或坏的干部从他们的职位上清除下来；另一些人则希望重建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他们怀念可以在好领导下愉快工作的那些日子。

第二，必须指出的是，很多民运积极分子接受这种观点，主要是把它作为支持民主的一种便捷理论。通过接受这种官方公开承认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事实，民运积极分子实际上获得了揭露中国体制和宪法上存在严重问题的有力根据。作为一个经常在官方和非官方刊物上提到的问题，假如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像刘少奇，都不能保护他自己的宪法权利，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又怎么能保护他们自己呢？这是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证。民主改革的要求因而变成改革的决定因素，民运积极分子几乎不能拒绝使用这种方便的理论。

他们同时渴望打破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官方对“左倾阶级斗争理论”的指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此，他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冷静地对其他因素做周详的考虑。

第三，比较官方宣传与非官方出刊物，我们还是从这种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中发现一种微小的不同。前者很明显地强调对老干部的迫害，而后者则表现出对一般群众所经受的痛苦的同情；前者强调错误理论所导致的，把老干部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进行攻击，而后者则把这种现象作为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不公正；前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上，后者则把矛头对准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前者把引起这些灾难的原因归结于少数几个人（最典型是“四人帮”），而后者则追索这些原因一直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前者着力于渲染黑暗时期的结束，而后者则强调过去的一些问题仍然会继续发生。

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全盘否认文化大革命思潮里潜藏的问题，并从中感觉到这里面的政治含义。一篇文章清楚地提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运动场面和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方面是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之间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是群众反对官僚政治阶级的运动。另一篇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 今天，绝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满意，并反对这场运动。但其中的原因却都很不一样。少数有特权的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文革动摇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他们意识到独裁政治已经不能为他们的贵族利益提供好处，而这种贵族利益正是这些官僚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职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而不需要担心任何独裁政治监督。然而，在文革大动乱之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为他们带来政治平等和社会进步。我们只有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法律制度，才有可能消除特权和发展生产。人民绝不允许全盘“恢复”文化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他们也不能让特权的苗头重新出现，而这种特权正是“文革”前的特权阶级以保持“安定团结”为借口要保留的。

这样的陈述清楚地列举了在同样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下，他们所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却根本不一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反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因为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失去的特权。革命人民决不能让他们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借口，

从而恢复文化革命前的旧制度。”

有些人对老干部是文化大革命最无辜的受害者的主张提出疑问。有关的讨论受短篇小说《伤痕》的影响很大，“伤痕文学”正是由此而来。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女学生由于她母亲被错误地定为叛徒，她所遭受的心、身折磨和痛苦。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干部的子女（或者说老干部本人）是否是社会阶层里受迫害最深的？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指老干部的子女）离最容易受冲击的阶层还很远。“黑五类”子女里面，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而被虐待、受歧视、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遣返回乡、被剥夺了政治和生存的权利，等等，社会冲突过去之后，他们逐渐被社会所遗忘。而我们的干部子女呢？一旦他们的父母官复原职，他们很快就重新获得以前的高级生活享受和优越的社会地位。

这样的评论使我们想起遇罗克在《出身论》里的讨论，我在前一章里已经对此作过论述。在另一篇文章所作的更进一步讨论里，作者提出，大多数人同情这位女学生是因为她的母亲后来被证实不是叛徒，问题是，假如她的母亲确实是一个叛徒呢？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把讨论的焦点，从对个别例子地分析转向对政治和司法制度原则的探讨，正如作者所争论的，最重要的是，要铲除引起这些社会不公平的因素。这些讨论表明了，当时的一些民运积极分子，正试图澄清这种流行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求掩盖下的思想混乱。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少数民运积极分子要求通过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方面，来反对官方当时号召的“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种要求对当时人们在评价文化大革命中所存在的不同态度、情感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根据。

虽然同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下，我们仍能发现其中的种种矛盾和差异，但反对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的基本态度，则显得惊人的相似。当他们要求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方面给予肯定时，没有人肯定文化革命初期对知识分子迫害的事实，没有人同情破四旧运动，没有人支持血统论，没有人对当时的红色专政表示支持。他们都指责文化大革命不同阶段里对群众的镇压，例如，反干扰运动，二月逆流，阶级划分运动。他们中多数人所珍视的是，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他们支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

判；他们高度赞扬“新思潮运动”。根据我前面对两种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们反对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在一致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一致支持新的阶级斗争理论。

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反对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提出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这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造反派提出的基本观点，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讨论过了。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通过宣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民运积极分子进而描述了一场他们想望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意图，在刘国凯写的一篇题为《文化大革命简析》的长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刘国凯发现文化大革命有三条主要发展线索：文革中坚领导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群众之间的冲突。这三者中间，刘国凯发现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是最基本的，这是成千上万的群众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正是围绕着这一条基本路线，其他的两条路线才穿插出现。刘国凯指出，文革的主要领导人物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利用了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保守派非常需要保持原有的现状和制度，而造反派则强烈地需要改变现状，这就是为什么群众中间经常分裂成两大派。刘国凯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正是造反派对官僚主义的冲击。

然而，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特别是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官僚主义制度的行动，这些我们都可以从“新思潮”里发现，但这些群众运动，被文革的主要领导人借助保守派的支持，残酷地镇压了。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宣布“全面胜利”，然而，这不是人们所期待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从没有期望‘新秩序’可以建立得这么快”，如另一位民运活跃人士愤怒指出的，“不必提及这是以什么样一种法西斯的方法完成的”，象李一哲一样，刘国凯因而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任何直接“成就”，如林彪和江青小集团在权力上的坐大、“革命委员会”掌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出现，等等。

刘国凯与他的同道所发现的，文化大革命最有价值的影响，是他所指的思想“启蒙”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打破了长期存在的，高度官僚主义和非民主的社会秩序。群众运动给官僚主义者应得的打击，同时也打破了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8]

通过肯定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官僚主义者的攻击，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成果，刘国凯和他的同事直接站到了由于文化革命攻击了老干部而否定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刘国凯没有因为“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抨击了老干部而加以反对，相反，他认为这恰恰是这种新阶级斗争理论的积极方面。正如刘国凯所说，

> 理论上来说，革命的红卫兵运动起源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然而，这里的不同点是，这场运动没有沿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以毛泽东进一步发展的这一理论为基础。传统理论的斗争矛头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发展了的理论把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进了已经被排列的打击对象。根据这一理论，这一类新加的对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刘国凯在这里使用的“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很明显是指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所说的“发展的理论”正是我们所指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刘国凯坚决反对“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对“发展的理论”持有保留看法，因为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发展的理论”的基本观点持有怀疑，他觉得毛泽东的意图并没有把官僚主义者作为一个阶级来攻击，而仅仅想把他的个人竞争对手搬开。但是，这并不是说刘国凯不支持新阶级斗争理论。刘国凯与提出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先驱，如“省无联”和李一哲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这样的事实，后者力图把他们的论点置于毛泽东的理论权威之下，而前者则希望在群众的观点和中央领导的观点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换句话来说，刘国凯并不赞同由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来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他赞同和支持的只是产生于群众的新阶级斗争理论。我们可以从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系列文章里发现持同样观点的人，其中一个，是民运活跃人士严桢（Yen Zhen)，他在解释新阶级斗争理论时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两种不同的群众运动，一种被少数中央高级领导人利用了；另一种是“来自于群众精神灵魂的真正的民主运动”.他所指的后一种运动，把它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文化大革命以前身体力行官僚主义政治的共产党干部。严桢、刘国凯、李一哲和其他民运人士需要辩护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大革命。

另一个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当然，这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评价不可

---

8 同上注．167

避免地一定导致了，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阶级斗争理论曾经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的最重要的贡献。

在刘国凯的文章里，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往日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尊敬。少数人仍然赞扬毛泽东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仍然支持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的结果使大多数人觉得，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大部分民运活动积极人士并没有特别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国凯的文章里，他反对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的是旧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发展的理论”指的是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这些辩论中，焦点大多数集中在毛泽东当时提倡这一理论的意图上，而不是他的理论本身。这种倾向在古峻军和王希哲的两篇文章中很有代表性。[9]

古峻军在他题为《毛主席晚年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一文里，赞扬了当时民主运动中群众性的对特权的批判。他把这些批判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大事和毛泽东的作用联系起来，他说，

> 难道这不是最伟大的方面吗？毛泽东持着一种批评的态度，去对待他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国家，去攻击这个他自己被称为主席的党。在整个世界和历史上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回应古峻军的文章，王希哲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长文。王希哲把毛泽东描述成最糟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认为，尽管毛泽东批评共产党干部的官僚主义行为，甚至把官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批判，但这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革命者，因为他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攻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铲除官僚主义阶层把权力交给人民，因而他的努力不应该被肯定。毛泽东的邪恶动机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毛泽东的朝代。毛泽东对当时的状况不满意是因为集中在党和国家手里的权力和专政程度太低，而他要扭转这一局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清除他的政敌，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同样地，他那反官僚主义的花言巧语和虚伪行为与其说是革命的还不如说是反革命

---

9 《四五论坛》1979年1月6日，见*DXKW*，4：88。

的。

从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王希哲像刘国凯一样，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所反对的只是毛泽东的理论行为背后潜藏的邪恶动机。正如王希哲公认的，也是李一哲大字报明确表示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引导造反派向激进方向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也是启示和激发人们在文化大革命后为民主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但现在王希哲发现，毛泽东欺骗了人民，或者用刘国凯的话来说，毛泽东“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官僚政治阶层的怨恨”。因而，王希哲感到有一种义务要反对毛泽东，因为他希望有一种真实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也就是说他想要一种真正的新阶级斗争理论。这种对毛泽东的矛盾感情以及对他的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困惑分析评价，在分析了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就变得比较清晰了。大多数民运积极人士反对毛泽东，是因为他们反对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中其他支持毛泽东的人，只是为了称颂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经过最后的分析，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基础已经由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们奠定了。

一些观察资料

根据我对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初民主运动的作品与著述的调查分析，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注意。第一，到了这一阶段，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几乎从公众的观点看法中完全消失。这种情况恰恰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情况相反，那时的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思想完全被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所控制。这种变化可以从这些事实里看到，尽管政治思想上的多样性纷纷出现在非官方刊物上，但没有一种观点表现出支持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此相反的是，当时有不少文学故事和小说揭露了旧阶级斗争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多文章公开指责了它理论上的错误。然而，最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一般群众对旧阶级斗争理论的态度转变，并不在于我们可以听到的声音，而是当时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这一阶段民主运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般人民群众对运动不感兴趣，大多数人没有投身参加到这场运动。群众的这种冷漠态度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所表

现出来的狂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共产党干部的温和批评都会引起群众的愤怒，党的高级干部没有任何困难动员群众起来围攻那些胆敢批评他们是“阶级敌人”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当时的群众自动起来维护他们的“心爱的领导”。这种情况在民主运动期间已经荡然无存。民运期间，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甚至漠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最公开的攻击。这是一个事实，当时的民主运动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一般支持，但没有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也是一个事实。没有其他社会现象可以比人民群众的冷漠态度更清楚地反映了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已经完全消失的事实。抛弃了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人民群众不再认为反党和反政府的人是他们的阶级敌人了。因而，他们也不再有义务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辩护了。

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从公众舆论里消失的现象表明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一转变并不是发生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而是在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经验，或者至少可以说，发生在思想最活跃的那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抛弃旧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人民不仅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把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整体摒弃了。从更大范围来说，这也意味着放弃了他们的基本政治信仰。因而，这种现象预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

第二，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民主要求之间有一种很密切的联系。民运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对外部世界很开放，外国的影响还很有限，很多西方的观念是一种催化剂，但他们还不能对中国民主理论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民主要求，主要来源于对过去的反思和识别已经过去的革命的意义。由于这样一种关系，新阶级斗争理论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在帮助抵制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为民主改革的要求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我在这一章里已经讨论过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民主的要求之间有着历史和理论的紧密联系。可见，大部分民运活跃人士都是以前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民主运动既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第三，新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的影响很有限。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当时的民主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孤立得到证明。正如我在前面指出过的，这一

阶段的民主运动不是一场流行的群众运动。很少几个人真正参加了这场运动。既然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民主的要求之间有着紧密地联系，那么这场民主运动从没有得到过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事实，就充分显示了新阶级斗争理论在群众中的有限影响。

新阶级斗争理论的有限影响还可以同时在这两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是一般人对官方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表示的赞同；另一方面是大众中流行的对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理论解释的冷漠态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有一种阶级斗争理论，那就是引导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文化大革命也只有一种，那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流行心态表明了大部分中国人从没有被新阶级斗争理论刺激过。

新阶级斗争理论的有限影响对探究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原因也很有启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的混乱，特别是在理论应用中的混乱，同时也因为这些理论通常很不健全、很不完整。看来很多中国人简单地忽略了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阶段来看待。特别是在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几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因而旧阶级斗争理论的优势也从来都没有被动摇过。在其他地方，大部分人在受意识形态再定位的全面影响之前，就已经卷入了武斗，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再定位是由毛泽东主义者领导，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新阶级斗争理论没有战胜旧阶级斗争理论，对一般人来说，他们分不出或者不想分出两者之间的不同。甚至在一些学校和城市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曾经明显地出现过，但因为太多人在运动中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受害者，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在运动迂回曲折的过程中，他们只看到一种理论，只看到一场运动。有些人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力，有些人再也不能从这场运动带给他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我们怎么可以期待他们能从中分得清运动的不同阶段呢？

结果是，很少一部分人实际上真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能真正理解思想意识形态再定位过程的人就更少了，这一过程我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论述过了。那么，真正能够从根本上重新解释阶级斗争理论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由此可见，激进造反派所寻求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

第六章

结论和思考：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流产的中国启蒙运动

我论文的前面章节纵观了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期间和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几个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过程，这些分析显示了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理论对理解文化大革命复杂、混乱过程所起的关键作用。旧阶级斗争理论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国家用于社会改造的思想意识形态，新阶级斗争理论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用于重建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的派性斗争本质上是旧和新的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竞争的具体表现。新阶级斗争理论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最宝贵的精神。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意识，正是这一改变对中国自七十年代以来的巨大变化作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新阶级斗争理论恐怕是简单的、甚至天真的、还可能是偏见的、甚至是武断的，然而，拿它与其他类似的理论相比较，仍然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尽管文化大革命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只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体系的尝试，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基础在精神上与意大利的精英理论相类似，然而，这种尝试并没有导致一种可悲的结局，像帕累托(Pareto)、莫斯卡(Mosca)、米歇尔斯(Michels)那样的学者所写的著述，依仗精英效应来管理和控制思想，经常变成反民主力量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源。相反，文化大革命的新阶级斗争理论、特权阶层的发现、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等等，充当了民主要求的主要理论依据。攻击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官僚主义机构与欧洲共产主义者批评官僚主义机构如同出一撤，文化大革命的新阶级斗争理论消除了象卢森堡(Luxemberg)、考茨基(Kautsky)、托洛茨基(Trotsky)、布克哈林(Bukharin)、德热拉斯(Djilas)这些最主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已经问世著述的命运。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这些共产主义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官僚政治机构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只有很小贡献。与此相反，他们的作品主要被西方媒体用来攻击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这正是他们投入了他们的全部心身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里，人们可能发现文化大革命的新阶级斗争

理论的独特作用，它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实际应用。它没有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家或理论家，但它造就了真诚的革命人民。它没有书写的名著，但它创造了真正的历史——文化大革命。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可以被作为另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尽管根据直接的文化成就来说，文化大革命不能与半个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相比，五四运动被誉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启蒙运动，但根据影响和动员一般群众的范围和深度来说，五四运动却不能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因为文化大革命唤醒的不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而很大程度上来说是整个国家。不幸的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流产了。由于这场运动的夭折，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中国人民留下积极的遗产，相反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思想混乱和深深的精神危机。

这一章我将探究，作为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明确通过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思想意识形态改革的意义；讨论这场革命的失败原因；提出我对关于这一研究的理论启示的一些想法。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思想意识形态运动

这篇论文的第一个结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第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意识形态运动。我在这篇论文里通篇讨论了新的和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我认为它是理解多方面、多层次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文化大革命思想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可以从这场运动的动机、运动的主要内容、运动的主要特点和运动的持久影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提到这场运动的动机，我首先讨论了主要领导人物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经常被描述为是一场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的一般认识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与其他党的主要领导之间存在的分歧和冲突这一事实。然而，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之间有公开的、蓄谋的权力争夺并不是一个事实。经过回顾和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运动中各级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说“走资派”，并没有顽固地抵抗运动，相反他们都非常容易地顺从毛泽东的中央。一个事实是，正如“十六条”，关

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最重要的党的文件指出的，大部分的党员干部并不理解这场运动。直到今天，还没有证据提出当时共产党的干部存在任何有意图、有组织的行动与毛泽东中央争夺权力。例如，出名的“二月逆流”仅仅是几个党的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发牢骚，而这恰恰反映了那些高级干部们对文化大革命所表示的强烈的不满。这里面，本质上没有一点是为了权力。事实上，“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谭震林对毛泽东的中央提出的要求的第一条是自己辞职。今天我们还同时知道，毛泽东的中央里的一个代表人物被解放军战士包围的武汉事件，决不是一个感人的军事政变，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并没有一点反对毛泽东的意图，更不用说要绑架他了。

我们现在还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彭真和刘少奇两人一再恳求毛泽东返回北京领导这场运动。事实上，这场运动令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困惑不满之处，不是他们是否愿意追随毛泽东的路线，而是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想要他们做什么。这种困惑挫折感是那么严重，以至浙江省的党委第一书记江华在1966年早期毛泽东停留在杭州期间，甚至要求保卫人员清理毛泽东的废纸桶，以便从中找到有关的材料来了解毛泽东心目中的计划。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干部都努力紧跟毛泽东。正如巴黎张（Paris Chang）和马须（ T.J. Mathews）指出的，不管他们是仅仅为了“生存的需要”，还是他们简单地盲从毛泽东的中央，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正如安德鲁•瓦尔克（Andrew Walder）指出的事实，[1] 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关心的是他们自身的政治安全，假如有人想夺权的话，也是极少数几个人有意与毛泽东争夺权力。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与其他共产党干部之间的一场公开的权力之争。

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他的顶峰，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他并没有在他权力的顶峰停止提倡和发扬他的激进思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而，光是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一再加速他的一系列激进行动是不足够的，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是要把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从思想和精神上来改变他们。从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发现，这一过程并不是如他个人所想象的，他的个人权力可以影响和加速推广他的激进计划；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激进过程依赖于他的个人权力。正如我们今天知

1 罗伯特•奈（Robert A.•Nye），《精英学说的反民主来源》*Anti-democratic Sources of Elite Theory* (London: Beverly Hills, 1977).

道的，毛泽东主义者们当时在共产党的高层里是相当孤立的，假如毛泽东当时没有这样的个人权力，就不可能有这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政治权力的讨论相当公开。毛泽东主义者经常提醒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政权”，然而，正是这种关于政权的公开讨论，表明了这场运动的目的远远超越了对个人权力本身的关注，因为这场讨论要解决的是权力的性质。在这些有关讨论中，关键是如何保证权力的性质，权力的性质不在于他的形式，而在于它赖以生存的政权的性质、在于这种政权是否真正为人民所掌握。这种公开的讨论，很难用纯粹的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个人权力的膨胀，更适合被看作是这场运动的结果，而不适合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高级领导人的最终目的。

当我们把分析的重点从个别重要领导人物的理论，转向人民群众的激进主义思想上，我们必须明白，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不同社会阶层为各自利益互相争夺的阶级斗争，因为，谋私利不是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赞同的基本道德原则。

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就是谋私利，因而，私利原则也是理解一般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正如林怀（Lynn White）所说“假如中国人像其他人一样(一种相反的假设，会结束最有希望的解释)，他们为自己行动的同时也为他们自己的团体而行动”。熊永利（Hung Yung Lee）也认为，造反派的行动“与西方的‘利益集团’有些相似”。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私利被定义为与物质利益有紧密关联。

这些看法的问题在于，勉强地用私利的原则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很难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特别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首先，私利在这场运动中从来都不突出，相反，这场运动从头到尾的主要口号是“斗私批修”。高喊着这一口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因而，人们很难怀疑这场群众性运动的自发动机，除非他们可以证明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伪君子。事实上，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当年运动的参与者还继续证明当年投身运动时的自我牺牲要求和对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追求，是他们当年投身运动的动机。用私利的原则来解释这一点看来很难自圆其说。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议题都很抽象，并远离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因而，这很难解释人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件和行动的积极性和狂热性，是由于与他们人性的私利原则直接相关。更难以用私利的原则来解释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学生们提出废除考试

制度，这一行动的结果使数百万他们的同辈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送到农村劳动，假如说他们当初的行动是出于私利，那么为什么结果却恰恰相反呢？在运动中，是工人自己提出废除奖金制度，其结果是，很多工人由此失去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实际上被减了工资。在运动中，正是农民自己提出把自留地交给公社，其结果使他们失去了他们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通常的私利原则很难解释这些现象。

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出来的一般公众心理与通常的私利原则完全相反。这一点可以从公众对临时工、合同工和下放青年运动的态度得到证实。这部分人确实提出了具体的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要求，例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和要求返回城市等要求。然而，这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形成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事实上，当他们这部分人显露出追寻私利的倾向时，他们通常马上失去了公众的支持。这是为什么这部分人经常努力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如熊永利所观察到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原则是禁止“任何个人追求狭义上的私利，如个人利益，派性团体或制度上的私利。”这种公众心态直接与私利原则的解释相反。

公众对私利的鄙弃态度或许最明显地表现在运动过程里缺乏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目的和计划这一点上。大多数人投身到这场运动里只是因为他们响应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他们参加运动是表示他们对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忠诚的第一政治表现。同样地，参加革命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为了个人谋私利，相反，参加革命正是他们清除私心杂念的一个机会。在这一点上，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历史上表现得很独特。这场运动的基本任务不是针对某一个社会阶层或某个人而斗争；而是针对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私念作斗争，“灵魂深处闹革命”正是当时提出来的口号。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当时的政治辩论，甚至武装冲突里，人们仍然忙于参加自愿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和自我检查是当时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假如从预想的政治斗争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一特点看来没有任何意义，但这确实曾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然而，当我指出这一点时我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人变得不自私了，或者说他们参加运动没有参杂任何个人的打算和私念。我想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抑制了他们追求那种狭义上的私利。造成群众中派性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不是出自于直接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考虑。思想意识

形态的倾向，包括人们的道德选择和社会经验看来比纯粹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在这里面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对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暴力行为既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特点。关于这场运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部分人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参与人身折磨或者武斗，他们参与的是阅读、听报告、唱歌、思考、辩论和写作，这场运动最普通的场面不是搏斗，而是在公共场所张贴的大字报、自印的传单和报纸、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通宵达旦的辩论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那么多人，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那么多种形式卷入到这么严肃的政治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 从来没有一场群众运动象这场运动发展的那么深入，那么广泛。从工厂到农村、从学校到部队、全国上下人人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感到他们在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从前，一家人凑到一起谈的都是日常小事，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聚到一起的时候，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父亲儿子、兄弟姐妹、丈夫妻子、甚至少年儿童和祖父祖母，都参加了讨论。[2]

对一些统计数字的简单综合考察，给我们对群众性的政治参与所涉及范围一些基本的概念。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的第二学期到1968年底中学和大学停课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其直接后果是，全国434所大学里至少534,000大学生，和全国范围内56,000所中学里的6.4百万中学生在理论上——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职参与者。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工人，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里的工人，用他们的空余时间参与运动或者是旁观这场运动。这种大范围的群众性参与可以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和大量的民间出版物得到证实。例如，当时只有4000学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有70个群众组织。1966年末，北京有200多份新的期刊杂志出现在街头。文化大革命末期流行的强化政治学习和加强政治讨论，可以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办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得到充分体现。一个这样的学习班，当时在北京举办，参加者由来自于四川省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这个学习班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五月份才结束，人数也从开始的1,000人增加到结束时的5,000人。

2　只有已故的德热拉斯除外。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也是一种事实，它受到今天公众最严厉的谴责。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的是，暴力行为并不是运动领导者的本意。与此相反的是，疯狂蔓延的暴力行为，正是毛泽东的中央失去对运动控制的结果。另一点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武斗和真正的战争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文革中的那些武斗从没有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文化大革命中的“战争”是全国性的，但不是全民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的程度和范围都有限。甚至在忙碌于武斗的同时，大多数人仍然把它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政治辩论和政治宣传上。实际上在武斗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舆论宣传，而大造舆论声势是非暴力的活动，因此，这时的笔杆子比枪杆子更为重要。事实上，这一点被很多人所接受。武斗的双方都知道，真正的胜利不是在武斗现场，而是在政治舞台上。简单地说，暴力行动没有在这场运动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点还可以从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非暴力策略的应用得到证实。

普通中国人第一次目睹了像静坐、绝食这样的斗争形式。这些战术很快在全国范围传开。例如，1966年夏天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中央国防科委门前静坐了28天，最后迫使国防科委交出他们的党委书记接受批判。[3] 在1968年晚期的广州，有一位名叫晓兵的艺术家进行个人绝食，要求解除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这些新方法的使用显示了这场运动的非暴力方面。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些暴力行动中发现非暴力的基础。例如，人们卧轨的形式来阻止列车行驶；交换人质的方式广为应用。甚至全国范围的冲军区，从部队驻地、仓库里抢武器的暴力行动也很少有人被解放军杀害。

假如暴力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点，那么，把这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恐怕更正确地说，这是一场长时间的、激烈的政治辩论，而这场政治大辩论最关键的成分，是它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程度。这一特点可以从对这场运动运动的概览中得到证实。

很多人抱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然而，只有极少数人会否认这场运动对中国人民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事实上，很多文化大革命参与者的共同感觉是，他们不再是当年的自己了。特别是那些当年的年青学生。他们后来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或是“思考的一代”。是好还是坏且不要去说，但这些名称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巨大

3 《人民日报》1979年2月26日；《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见*WGZL*，I：295-311。

的思想意识形态影响在这些人身上所产生的作用。例如，那些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著书写作的人里，像戴晓艾（笔名）、凌更（笔名）、梁衡、高原、张钧等等，他们是如何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从一个政治上无知，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突变成政治上敏感，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呢？

我将在下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作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已经足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运动。

思想意识形态转变的意义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思想意识形态转变，并不局限于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思想意识形态转变的含义是很广泛和很深刻的，发生在成千上万中国人头脑里的思想意识形态变化，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基本改变或者是改变的开始。这是我这篇论文的第二个结论。

为了考察思想意识形态转变对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影响，我将简单比较一下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状况。与我在第二章的讨论相呼应，我将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共产党的领导，社会倾向，经济生活，流行思想。

文化大革命对共产党的领导最深刻的影响，是使党的形象失去了光泽。不久以前，党的领导在社会里的地位几乎接近于神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共产党干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批判，老百姓知道太多关于共产党干部的内部秘密，其中包括他们的政治错误和他们的个人缺点。要保持从前共产党清廉、绝对可以信赖的形象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对很多人来说，党的干部不再是他们所敬爱的领导，而是过去犯了错误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可能还会再犯错误。事实上，根据新的阶级斗争理论，由于他们在社会里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形成了对公众利益的最大威胁。这种对共产党领导的态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状况。

很多人，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和研究这场革命的学者，曾经悲叹这场革命没有根本改变真正的权力结构。例如，他们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

形式新颖而已，实质上与旧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区别。假如从这场革命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来看，这样的批评是对的；但假如这是说革命没有影响真正的政治环境，那这样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的指责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它表明了共产党政治权力的失落。因为这些指责，表现了很多中国人不再满足现存的政治机构。正如我在第二章里讨论过的，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寄托于人民对它的信任。一旦普通老百姓改变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真正的权力结构就再不可能一样了。这种改变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非常显而易见。

共产党的领导从来都没有面对这样严重的挑战。新的革命委员会从没有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所享有的权威。无秩序、动荡不安、混乱、甚至武斗并没有因为这些新的公共机构的建立而平息。在大多数地方，花了大概一到两年的时间才恢复基本的社会秩序，毛泽东的中央下达了措辞严厉的指示，才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他们甚至调进军队来协助恢复秩序。

文化大革命前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例如，李一哲称地方政府和一些居民之间贴大字报和撕大字报的“拉锯战”就是一例。政府要撕掉所有的大字报，但一些人不断地在刚冲洗干净的墙上贴出新的大字报。这里最有意思的是，为了抗议共产党的控制，人们直接求助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过的思想和方法。又例如，在武汉曾经有人试图用工会来与新的革命委员会竞争。在1974年的3月，一个省的党委书记被群众组织绑架，因为群众要询问他。[4] 一个月之后，6个省委最高领导人被以前的造反派绑架，这些前造反派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还被关在监狱里的造反派，作为人质交换。在1975年1月，一群人占据了市中心的一座宾馆，他们与警察搏斗、阻隔交通，要求省、市领导公开道歉。[5] 两个月之后，另一批人两次冲击了省委办公大楼，中断了省党委的会议。在杭州，动荡的局面是那么严重，以致30,000多名解放军被派到那里，帮助恢复正常秩序。

公开向共产党的领导挑战的顶峰，出现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悼念周恩来总理

---

4 弗莱士·卡尔（Forster Keith），《中国一个省分的造反于派性活动》*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20.

5 例如，费迪利·武维斯（Frederick C. Teiwes），“在中国的地方政治：主体与变异”"Provincial Politics in China: Themes and Variations, "in 简·宁伯（J·Lindbeck），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1)，；安得鲁·瓦尔德（Andrew·Walder），《张春桥与上海的一月革命》*Chang Ch'un 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的名义之下，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忧国忧民，对毛泽东的同僚、甚至毛泽东本人的不满和憎恨。在南京，反对毛泽东中央的两位主要领导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抗议标语被刷在贯通全城的列车上。在北京，数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无数诗歌、散文、各式各样的文章贴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周围的树丛。这些文章和诗歌里，有一些直接攻击毛泽东。“四五运动”显示了现存的政治体系已经开始动摇，看来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造或改革已经在所必行。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最明显体现在文化大革命后突然流行的“走后门风”。“走后门风”指的是滥用职权为个人谋私利的行为。例如，卖肉的人也许可以把好的肉留下来给他自己、他的亲戚、他的朋友、或者其他有权、有地位可以帮他的人。作为回报，他的朋友、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好处的人也会替他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交换可以延伸到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这种状况广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致当人们需要公共服务时，他们必须依赖于人事关系和“走后门”。因而，“走后门”在当时受到公众最尖锐的批评。

这种现象里最有意思的是，走后门成风和激烈抨击走后门之风共存的现象。一方面，寻求个人利益的这种“走后门之风”的盛行，明显地与文化大革命力图消除个人私心的公开目标相违。正因为走后门的行为受到公众这么广泛的批评，恰好证明了中国人民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抛弃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想。另一方面，被文化大革命唤醒了的中国人民不仅知道了过去共产党的干部是如何滥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利益，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些行为还在继续，只不过在文化大革命后换了一种形式而已。正如李一哲愤怒控诉的“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同样地，一般人也强烈感到他们必须以任何可利用的方法和手段来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当这种思想和行为广为扩散，当然就变成了“走后门成风”。

事实上，这种现象表明了社会的一种历史性转变。正如一些学者已经观察到的，一个非正式的社会在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正如我们从“走后门之风”里发现的，在开后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关上了前门。用另一句话来说，人们背弃了国家的法制和政府的规章，采用违法的手段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官方渠道被社会关系网取代了。作为群众中广为流行的一种行为，“走后门之风”的意义远在追求个人利益之

上。其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有效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与此同时，对这种行为的批评表明了人们的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出现。很多人已经不满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他们同时要求根据他们的权利来受益。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正在要求变成一个正式的社会。这种社会倾向可以从一些人公开要求物质报酬和提高福利中得到证实，我将在下面继续这一讨论。

非正式社会的出现对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影响。由旧阶级斗争理论促进发展起来的工作道德态度曾经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济体制起了关键作用，现在已开始逐步减弱。工作纪律松散、消极怠工、甚至罢工都是明显的表现。与此同时出现的，是人们对物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强烈要求。

当然，期望更多物质报酬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提出这些要求的人通常被认为道德低下和自私自利，甚至那些提出这样要求的人也经常会感到惭愧。那是因为，这一类的要求通常很少得到公众舆论看法的支持。然而，文化大革命后，这一类的要求不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它得到舆论的辩护。

李一哲的大字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李一哲抨击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搞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 李一哲随后争论说：

>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吗？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什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物质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

在这一论述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内容已经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前，这

一原则被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用来促使人们把他们所有的能量和能力投入到工作中，其实这只是“各尽所能”的原则。在李一哲的论述里，根据“按劳分配”这一原则，就应该奖励多劳、多出成绩的人。旧原则的新应用，反映了当时的工作道德态度如何在公众意识中的改变。这种改变在经济体制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政府发现他们再也很难依赖人们的积极性来提高产量了，共产党干部必须寻求其他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如曼得逊（Madsen）观察到的，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之后，甚至当时毛泽东仍然在位，政治道德已经断然转向了功利主义。作为一个积极分子，现在对成为领导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成为一个实际管理人员变得更为重要。[6] 尽管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发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但是，改革的苗头在那之前早就出现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意识形态转变，给中国带来了全面的改变。这些改变中影响最大，意义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民自身的思想变化。这一点可以从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流行意识形态分离中得以证实。

文化大革命前，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容怀疑的是社会的统治思想意识形态。在那时期，政府树立的榜样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他们的英雄人物，官方定论的坏人也会被群众认为是他们的真正敌人。当时的社会，基本上由国家来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领导在当时非常强大，因为它一般来说有人民的支持。官方教育的这种广泛群众支持，正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强大领导的原因。

但是，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后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官方树立的英雄人物经常被人们作为取笑的对象。另一方面，官方认定的“敌人”也不再自动地被社会认为是“人民的敌人”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他们崇拜的英雄。

少数人仍然继续学习毛著。然而，他们学习的重点和目的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截然不同。文革前，学毛著主要是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和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检查。毛著被作为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学毛著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来研究，这时的着眼点在于如何理解和撰译。同样的，人们要探究的不仅是毛泽东怎样说，更为重要的是，他陈述的思想观点背后的原因和逻辑。这样，通过学毛著，很多人很快发现光读毛泽东选集已经不够了，从那开始，一些人开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

6 怀特（White），42.

宁和斯大林的著述；一些人开始读费尔巴赫、黑格尔和其他西方思想家的著述。一条通向现代社会的路正在他们面前展开。一场思想意识形态革命在很多人的头脑里不可逆转地出现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启蒙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失败。这场革命的失败不是因为它没有完成它的远大目标。很少革命，几乎没有，可以完全实现它们的理想。我们可以由此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不仅没有完成它的既定目标，同时，与此背道而驰的，在这场运动的后期，它几乎否定了这场革命曾经提倡发扬的所有理想。这场革命不仅抛弃了它的理想，还抛弃了它的理论。

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部分老干部返回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党组织很快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与从前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大字报和非官方出刊物不再被提倡，相反受到阻止。群众组织被解散，他们的很多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最激进的，被投进监狱。大部分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这场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体，被送到农村劳动，在那里，他们不是被作为造反派来对待，相反他们是“再教育”的对象。

官方宣传舆论的调子现在与旧的阶级斗争理论如出一辙。阶级斗争理论的重点因而从政治前线移到了意识形态前线。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重新获得他在官方宣传阶级斗争理论里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思想和党组织之间的分歧不再被提及，相反，新的革命委员会现在被置于毛泽东思想权威的保护之下。人们被规劝“衷心拥护和坚决捍卫”新的领导权力，以此表示他们对毛泽东中央的拥护。人民群众的权力和共产党领导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了。人民不允许自我教育，更不要说自我解放了，现在强调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统一目标、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调”。革命从“全面阶级斗争”倒退回“文化革命”，回复到改革教育和其他“上层建筑”领域，剔开了它的主要部分——政治组织。巴黎公社的原则被完全忘记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最革命的很多方面所受到批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它

使文化大革命成为很多中国人生恨的原因。一些人，特别是老干部和文革前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仇恨这场运动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其他人憎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们感到这场运动没有完成它的既定目标，简而言之，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死亡的开始。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与文化大革命有着太紧密的关系，以至他们很难推托对这场运动后果的责任。对文化大革命的流行憎恨情绪，带来了人们与毛泽东及他的追随者之间的第一次疏远。没有了虔诚的信徒，毛泽东思想开始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从1973年晚期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毛泽东主义者们试图再次动员群众起来造反没有成功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着来自共产党内部和外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威胁，毛泽东主义者使用文革时期的老办法来寻求帮助，他们要求人民群众“反潮流”。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样，毛泽东主义者对人民群众发出了很多信号，煽动人民再次起来造反。当时一个叫王帅的小学生，由于她敢于对老师提出批评而得到颂扬，一个中学生的自杀被归结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结果。戏剧“三上桃园”和“园丁之歌”被批判为旧政治路线复辟的证据。然后是树立“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最后是反“右倾翻案风”运动。然而，令毛泽东主义者们很沮丧的是，他们的这些努力显然没有任何效果。公众对这些运动的热情非常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发起的这些政治运动变成了一出出闹剧。此外，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怀旧情绪开始增加。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敲响了毛泽东思想的丧钟。对毛泽东思想的幻灭，反过来是文化大革命完全失败的最清晰的迹象。通过遗弃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不但抛弃了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和方法，同时放弃了追求一个理想社会的希望。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悲剧。

如我在前面章节里讨论过的，毛泽东思想在新的还是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与中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的英雄业绩和伟大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除此之外，从长远的历史观察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影响甚至比这一切更为重大。当中国人民经历了从一个前现代化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以后，面对巨大的思想意识形态危机，毛泽东思想不仅被很多中国人民作为很有包容性的现代思想的表述，同时

还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思想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变成中国革命的象征，一个独立的中国的象征。因而，抛弃毛泽东思想意味着否定了过去的革命，和抛弃了中国的优良传统。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特别是那些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信徒，这种放弃的含义无疑与对基督徒宣布上帝的死亡一样，使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后果是，这些人不再相信任何原则，他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他们放弃了对理想社会的所有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人，主要是指文革时期的年轻人，后来被称为“失落的一代”。因而，毫不奇怪的，自从七十年代晚期开始，中国向外界打开大门以来，中国人民，特别是年青人几乎被西方的思想意识形态所征服。这种趋势可以从当时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下”的播出得以体现，这部电视剧通过文化改革运动的形式反对中国的所有一切。同样地，在他们的改革中，中国人经常吸收了西方经济问题最多的方面和西方文化最丑恶的部分。

一些理论的思索

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点方法，正如我在论文里已经讨论过的，这种新观点的本质部分和她的基本精神仍然被很多人忽略，这些人包括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外界的观察者、学者和一般人。通过对这场人类历史上非常不同寻常的大事件作新的阐述，这一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的思索，希望这些理论的思索可以帮助加强突出这一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这篇论文里，我使用了传统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概念来深入探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使用这一组概念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它们的一些局限和问题。正如我们可以在前面的章节里看到的，我从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现的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和社会之间的区别，同时还有这两者之间的含混不清。由毛泽东主义者和造反派共同发展起来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动力。这一结论因而引起了一般的关注，迫使一种新的研究概念的出现。特别是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全民社会理论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这两种理论被广为应用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中

国的研究，前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很流行，后者在最近这些年里变得很时髦。

极权主义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并不是由于理论的辩论，而是由于历史本身。1984年，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再是灰色的、由一个巨大野蛮的机构所统治的社会，这个社会如奥威尔（Orwell）所预言的，冷漠的人民过着他们冷漠的生活，他们毫无意识地重复权威们模式化的教条，而使他们自己的思想干枯。然而，不论我们看苏联、东欧国家或中国，八十年代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年代，改革的浪潮几乎席卷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人民看到了一个不再是静态的、死亡的世界。发生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这一意义深远的变化，很显然它的动力主要产生在这些社会的内部，而不是社会的外部。这是极权主义理论不可以解释的。因为它相信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意味着它的控制渗透到国家机器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的结果将是社会的完全消失。因而，这一理论的最后解释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坚实的整体，任何变化的机会都被排除了。这样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它的错误。

近年来出现的公民社会理论的复苏，至少部分地作为纠正极权主义理论面临的问题的一种努力。面对自七十年代开始的，共产主义世界里的历史性变化，学者们被迫从社会内部寻找导致这些变化的动力因素。因而，他们重新发现了共产主义世界里的公民社会。在这一新发现之上，最近一些学者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这些学者发现，共产主义国家不是完全由国家机器所支配和控制，社会也没有像极权主义理论以前所建议的——完全消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历史上来说，全民社会理论的重新发现是最近的趋势，但至少一位学者早在六十年代就在他的研究里使用了这一理论。目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群众运动，弗朗茨·舒曼（Franz Shurmann）立即意识到这些事件对于完善他的理论系统的重要性，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国家机器在共产主义中国里的局限性，因而他发现了社会的重新出现，正如他在他的著述《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组织》第二版前言里陈述的，他从文化大革命里学到的是：

> 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意识形态和国家组织并不如我以前想象的那么强有力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以他的社会阶级形式出现时，它声称反对国家组织，并表现出社会的意愿不能被扭曲的特性。

正如我在第一章里指出的，问题是舒曼（Schurmann）在六十年代，和今天的一些支持公民社会理论的学者一样，都共同使用着极权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他们都赞同和使用传统的国家机器与社会的概念。他们着眼于国家机器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和对抗关系，在他们的眼里，思想意识形态仅仅隶属于国家机器，在这些前提的限制下，当他们寻找变化的基础时，他们的视野被遮挡住了，他们看不见很多明显的因素，相反聚焦于一些琐细的成分。因而，他们的解释很有问题。

首先，公民社会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发生在中国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学者们所能发现的，只是一个“初生的公民社会”。这显然非常软弱无力，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国家机器控制之外的独立组织机构，这种组织不受约束，就像被称为“团结于障碍之上”，“突然的，广为散布的公民社会”。这些都并不是重要的，因而它可以在十九世纪晚期，地方权力“改头换面”重新出现的过程里发现。这些微小的、根据不足的和边缘性的因素如何可以解释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里的根本性变化呢？

第二，当这一理论提出新生的公民社会来自于过去的社会时，公民社会理论简单地显示了它的谬误。因为，提出和利用改革的社会已不再是旧的社会，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这个社会诞生于共产主义革命。正如我们可以从中国看到的，七十年代晚期以来的学生抗议运动，很明显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延续。魏京生很清楚地是毛泽东中国的儿子，而不是儒家的中国的后代。“四通”集团，一个在最近的经济改革浪潮中出现的有名的企业，更像是今天中国的公司，而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企业。可以说，被持公民社会理论的理论家们所注意到的、新出现的社会，并不是传统复苏的结果。领导和推动中国改革的社会力量，主要来自于新近发生的革命，而不是旧社会的产物。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我在这篇论文里论证的，这场运动至关重要的动力，产生于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官方思想意识形态影响强大的地方，造反派的力量也相应地强大。同样地，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势力薄弱的地方，恰好也是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限制的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国家机器对社会不可抗拒的控制，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机器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渗透，同时还因为这

种渗透的分界和不完全。新阶级斗争理论发展的不完全不仅仅是由于旧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顽固性，同时还由于新理论在社会上传播的局限性。

对于很多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特别是那些被送到农村劳动的学生，这恐怕是一种痛苦的发现，文化大革命逐渐消失淡化之后，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许多理想未能实现的革命后的社会，而仅仅像是革命前没有任何理想的社会。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进一步使他们相信，一个完美的社会只能在梦中才存在。他们缺乏的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理想本身。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民，他们很少受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没有真正经历过意识形态的改革（这种意识形态的改革是我在第二章里已经讨论过的），那种通过教化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完成的思想改革。这部分人把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不可改变的定律来接受。同样地，他们永远不可能受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因为新阶级斗争理论源自于对旧阶级斗争理论的批判过程。

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封建主义遗毒”，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改革家们相当准确地指出，改革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于国家机器，同时来自于古代中国的遗产。那些还生活在中国过去阴影下的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民主社会的梦想，更不要说发动改革运动来达到这样的梦想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晰的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改革势力，决不可能来自于旧的中国社会。对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改革，这个旧的社会与其说它是改革的源泉，还不如说它是改革的障碍。

不管怎么样，公民社会理论的学者们在观察和发现社会机构在中国现代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方面是正确的。一个主动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正在中国发生。

直到七十年代末，所有发生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改革都是由精英们发起，由国家机器全面发动，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通过最后分析，归结为所有这些改革都是被一个保守社会所窒息的结论。这是为什么，所有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们的共同迫切要求是社会的改革，从梁启超到孙中山，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社会改革。共产主义对社会改革的要求不同于以往之处只是它特别的形式，而不是这种要求本身。

然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不仅收到了越来越积极的响应，同时越来越多起源于社会本身了。尽管在开始阶段，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改革仍然相当孤立，但在真正意义上，他们不再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没有花多少时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很多中

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因而，国家机器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改革。现代中国里国家机器和社会的关系被根本逆转了。社会变成了改革的源泉和动力。这正是中国现在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

然而，我要与公民社会理论学者们争论的不是社会在现代中国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这远不是一个问题。这里面关键的是，中国社会如何从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改变成一个活力四射、不持成见的理性社会，而正是这个社会推动着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改革。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是我论文的主题。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我论证了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一场主要由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完成的革命，在这场革命里，国家机器的贡献并不比社会的作用小。思想意识形态被发现是一种独立的、不可缺少的动力，这种动力正是国家机器和社会双方都依赖，并以它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和完成他们的目的。

假如思想意识形态隶属于国家机器和社会，它将不会完全在共产主义中国里消失。社会的灵魂根植于思想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影响意味着它不仅仅通过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同时也由社会反馈到国家机器。由此，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显得特别重要，它产生了改革的动力。

在以上的讨论里，我将建议把思想意识形态放在公共领域意义上来理解，因而思想意识形态在很多公共问题方面已经超越了作为意识形态本身的限制了。思想意识形态是国家机器和社会相互交换观点主张的地方，其结果是，它变成了一个合理的临界，由那些愿意对公众问题提出讨论、但又没有身份和地位对问题的解决作决定的个人来进行辩论。这一特点可以从我前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阶级斗争理论的陈述里得到证实。

文化大革命的流产，使中国人民不但放弃了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探究，同时放弃了思想意识形态本身。而抛弃了思想意识形态，也就放弃了逻辑的论证及理性的思考。没有一个牢固的道德基础，中国人民只能从属于一种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的支配。为了寻找一种代用品，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发现新的思想源泉。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条道路是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我的研究正是其中的一个尝试。文化大革命发生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在一个人的一生里这是很长的一段旅途，但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这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过

渡，对这场革命做出失败的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假如是这样的话，现在应该是由我们来完成的时候了。

参考书目

Blecher, Marc.

Chi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conoclasm and Innovation in a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Country. London: Frances Printer, 1986.《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个人崇拜和改革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Bloodworth, Dennis.

The Messiah and the Madarins: Mao Tsetung and the Tronies of Power. New York: Atheneum, 1982.《救世主与官僚主义：毛泽东与反对势力》

Brugger, Bill.

China: 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42 - 1979. London: Croom Helm, 1981.《中国：解放和改革 1942年到1979年》

--------.

China :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 - 1979. London: Croom Helm, 1978.《中国：激进主义和修正主义1962年到1979年》

--------. Ed.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0.《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Butterfield, Fox.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中国：生活在苦海里》

Cassinelli, B. W.

Tot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rmany Under Hitler, The Soviet Union Under Stalin, and China Under Mao.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Books, 1976. 《彻底革命：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比较研究》

Cell, Charles P.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革命在运作：发生在中国的全面动员运动》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ed. Red Guard Publications. 20 vols.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Press, 1975. 《红卫兵出版物》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8 vols.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80. 《红卫兵出版物附录》

Chai, Winberg.

The Research for a New China: A capsule History, Ideology, and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 - 1974.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75. 《新中国研究：封闭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和思想意识形态，1921 年到1974年》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e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毛泽东的孩子：红卫兵一代的个性发展和政治行动主义》

Chan, Anita,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Sharpe Inc., 1985.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中国的法律制度——李一哲的大辩论》

Chang, Parris.

Radicals and Radical Ideology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Communist Affair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3.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和激进的思想意识形态》

Chen, Jack.

A Year in Upper Felicity: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3.《幸运的一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农村的生活》

Cheng, Nien.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6.《上海生死场》

大陆地下刊物汇编专案小组

《大陆地下刊物汇编》20 卷，台湾，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80-1984。

Daubier, Jea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Seaver. Preface by Han Suyin.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74.《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Dittmer, Lowell.

Liu Shao-Ch' 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University Press, 1971.《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和群众大批判》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The Cu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各省的文化大革命》

Falkenheim, Victor C., ed.

Citizens and Groups in the Policy Proces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程序里的公民和群众组织》

Goodman, David S. G., ed.

Group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rmonk, New York: Sharpe, 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下的群众组织和政治》

Goodstadt, Leo.

China' s Waterg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flicts, 1969 - 1977.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79.《中国的水门事件：政治和经济冲突。1969年到1977

年》

Harding, Harry.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 - 197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组织化的中国：官僚主义问题，1949年到1976年》

Harris, Nigel.

The Mandate of Heaven: Marx and Mao in Modern China.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8.《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现代中国》

Heng, Lia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83.《革命之子》

Hiniker, Paul J.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Chinese Reality - Dissonance Under Mao. Bev erly Hill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7.《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的现实——毛泽东时期的不协调》

Hinton, Harold C.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79: A Documentary Survey. Vol. IV. 1967-1970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lmington,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0.《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到1979年：文献纵观》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中国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篇文章》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

Hunter, Neale.

Shanghai Journal: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9. 《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ommunist Problems.

Important CCP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n.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The Shanghai Printing Press, 1979. 《中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

Israel, John,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造反派和官僚主义者：中国的民主》

Johnson, Chalmers,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Joseph, William A.

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1958 - 198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中国1958年到1981年对极左激进主义的批判》

Joseph, William,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文化大革命的新观察》

Karol, K. S.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Tran, Mervyn Jon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3.《第二次中国革命》

Kleinman, Arthur.

Social Origins of 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压力和疾病的社会原因：现代中国的忧郁、神经衰弱和痛苦》

Kraus, Richard.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冲突》

Lifton Robert Jay.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革命的永恒：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Link, Perry,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顽强的小草：文化大革命后有争议的流行文学作品》

Liu, Guokai. 刘国凯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7. 《文化大革命简析》

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道德和权力在中国一个村庄》

Maitan, Livio.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A 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Translated by Benton and Marie Collitti. London: NLB, 1976. 《中国的政党、军队和群众：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和他的后果》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

Marchant, Leslie Ronald.

The Turbulent Giant: Commu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 Sidney: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ook Co., 1975. 《动乱的巨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

Masi, Edoarda.

China Winter: Workers, Mandarins, and the Purge of the Gang of Four.

Tranlated by Adrienne Foulke. New York: Dutton, 1982.《中国的冬天：工人阶级、官僚主义者和四人帮的被清除》

Meisner, Maurice.

Mao' 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毛泽东和毛泽东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Moody, Peter R.

Chinese Politics After Mao: Development and Liberalization, 1976-1983. New York: Praeger, 1983.《毛泽东后的中国政治：自由化和发展 1976年到1983年》

--------.

Opposition and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7.《当代中国的不同政见和反对派》

Nee, Victor and David Mozingo,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现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

Pickowicz, Paul G.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and Chin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0.《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中国：概念上的框架》

Pint-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2 vols.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中国的遗产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危机》_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中国政治的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陨落的心理与文化因素的研究》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派性活动》

Rosenberg, William G., and Marilyn B. Young.

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中国和苏联的改革：二十世纪的革命的奋斗》

Scalapino, Robert A.

Elite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

Schram, Stuart.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毛泽东的思想》

--------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权威、参与和中国的文化变化》

Schram, Stuart R, ed.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1956-71.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4.《毛泽东非正式谈话和信件 1956年到1971》

Schram, S. R., ed.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Hong Kong: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

Schwartz, Benjamin I.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共产主义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变化》

The 70' s Magazine, ed.

The Revolut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 Reading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an Ultra-Left Perspective. Hong Kong: np., 1976.《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从极左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Seymour, James D., ed.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 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79. New York: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1980. 《第五次现代化：中国的人权运动1978年到1979年》

Shalom, Stephen Rosskamm.

Deaths in China Due to Communism: Propaganda Versus Reality. Temp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4. 《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死亡数字：宣传和事实的相异》

Shirk, Susan L.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竞争对手：中国学生的策略和职业动机》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国家和社会革命：法国、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

Solomon, Richard H.

A 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 A Feast of the Maois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5.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主义改革在中国的盛大节日》

--------.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Suyin, Han.

Wind in the Tower: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9 - 197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6. 《空穴来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1949 年到1975年》

Thaxton, Ralph A.

China Turned Right 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国右派抬头：现代世界里革命的合理性》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文化大革命和后毛泽东的改革：历史的分析》

Wakeman, Frederic.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 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历史与愿望：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中国工业里的劳动者与权威》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Ann Arbor, Michigan: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1990. "感召力的失败：武汉的文化大革命" 王绍光博士论文。

Watson, James L.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革命后的中国阶级与社会阶层的形成》

Wilson, Richard, Sidney L. Greenblatt, and Amy Auerbacher Wilxon, ed.

Moral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81. 《中国社会的道德行为》

White, Lynn T.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政策的混乱：中国文化大革命暴力的组织原因》

Womack, Brantly.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Hawaii: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1982.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Womack, Brantly,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国现代政治的历史分析》

Yuan, Gao.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自来红：文化大革命编年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三卷。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

译后记

我的已故丈夫林伟然临终前最大的心愿是把他的研究成果带回中国，为中国的思想建设出一点力。因为他赴美十年挚志追求的就是希望他所作的研究能引起中国人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给以足够的重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伟然与他那一时代的人一样，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觉得有义务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态意义公诸于世，至少让人们重新思考这场运动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实影响以及它的现实意义。1997年他去世之后，我知道把他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将是我的历史使命。

然而，这一工程浩大的、责任重大的、既劳心劳神又劳力的工作，六年前的我，却是无法胜任的。当时，我们唯一的女儿才十二岁。承受着丧夫的悲痛，我不仅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还要既为人母又为人父。生活在中西文化的边缘，我像很多在国内接受完正式教育才出国的家长一样，常常感到不能与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完全沟通。如何帮助孩子走出丧父的阴云，是我当时最大的难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要陪伴在孩子的床边，直到她沉沉入睡，以便她被噩梦惊醒时，身边还有摸得着的亲人可以给她安慰。此后的5年，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培养孩子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日复一日，我奔忙于我的电脑系统工程师的工作、女儿的钢琴课、女儿的网球比赛，还有她在美国学校里那些大量的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我不时感到心力交瘁，疲于奔命。2002年，女儿终于高中毕业上大学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长大成人，最令人欣慰的是，她不仅以全校第一的最好成绩毕业，而且还获得了美国总统青年学者奖，这一美国高中毕业生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恐怕这也是冥冥中伟然的在天之灵呵护着女儿的成长，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交了这份答卷之后，我又该开始准备另一份答卷了。

从2003年开始翻译伟然的书稿，我无时不是在重温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六年时光。记得他曾经让我看他的导师林毓生写给他的老师殷海光的信，他说："我跟他一样，内心的这种孤独，没有人可以理解，也没有办法与人说。"当时我并没有很在意，因为他天性开朗，随和，朋友很多，我们不能说完全的志同道合，但也不乏夫唱妇随，因此我

当时觉得他所说的孤独，只是文人的无病呻吟。直到我开始翻译他的博士论文，重温了他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我才慢慢真正体会到他所说的这种孤独。美国是一个高效率、重功利的社会。历史学一直都不是热门的学科，大部分美国学生都不愿意涉足历史学博士的崎岖长征路，对于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出于在这片陌生土地上求生存的本能，留在历史学领域里耕耘的人就更少了。本来愿意倾谈历史学术的人就很少，能够费心、费神、费力地去探讨和理解的人就更少，更何况在研究历史的学者当中，能够分享像他那样经历了文革，又能在西方自由地进行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可以想象，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确实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他分享其中的苦和乐。从1992年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到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四年时间里，除了最后一年病休与癌症作最后的抗争，他把每一分钟、每一份心力都用于他的研究。在这个每天都在变化，到处都充满了诱惑的社会里，他何尝不是一个孤独的夜行者呢?!

直到我的翻译工作接近过半，我才逐步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论文献给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一代。正如他在论文中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一代，不管后人或旁人如何论说，他和他们一样，都在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完美，一种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是否可以达到的境界。像伟然这样，放弃已经在国内搭就的通往象牙塔之路，在国外不选择立竿见影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专业，既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又要承受周围的亲朋好友、家庭成员的不理解，倘若没有一种非常专注、非常崇高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记得我作出放弃历史专业，改学计算机专业的决定时，伟然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他只说了一句“难为你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他内心的苦楚确实无以言说。一方面，他知道我们这个家需要我以改变专业来保证生活上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很不希望看着我像大多数人一样，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因为，他真诚地相信理想比现实更加真实。

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重新理解去世之人的所说与所为，这真是一个再生的过程。我们结婚十五年，其实我并不完全理解他，我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外在的他，对于他的精神世界，我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背着这个十字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力图从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论文的字里行间重新认识

一个真实的他。

与共和国同龄的他，一直把自己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中国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伟然生前一直希望毕业之后能重新返回中国的教坛，因为在他看来，文革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都应该在中国。时值他去世七年之后，他的论文能与读者见面，正如他生前所说，假如论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所付出的一切都在所不惜了。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的是我们大学的同窗好友——杨小辉、李公明和陈少明。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作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同学之谊，在他们不再需要任何东西来证明他们的功成名就的今天，力促这本书的面世，只能说他们追寻在大学时期曾经共同憧憬过的理想和完美仍然深植于他们的心中，而这——正是这一时代的人所共有的精髓。